

99/4

总第85期

# 炎黄春秋

■ 张爱萍：深切怀念胡耀邦

■ 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 叶笃义：『文革』秦城监狱坐牢记

■ 叶笃庄：我被逼诬陷徐冰是美特

■ 为毛主席烧制专用瓷器纪实

■ 斗士于右任

■ 『弓藏狗烹』探源



胡耀邦与张爱萍在一起



## 丹心耀日 矢志兴邦

——胡耀邦图片选



1 胡耀邦在 1978 年(刘全聚 摄)

2 1964 年 9 月,胡耀邦陪同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九大代表(舒野 摄)

3 1982 年,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共青团十一大主席台上(铁矛 摄)

4 1958 年,在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胡耀邦和朱德同志谈话(舒野 摄)

5 1980 年,在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和团中央委员在一起(铁矛 摄)

6 1982 年 10 月,胡耀邦和少先队员在一起(刘全聚 摄)

# 炎黄春秋

- 2 丹心耀日 矢志兴邦  
——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 ..... 张爱萍
- 5 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  
——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 荣天珺
- 12 周恩来与廖承志 ..... 蒙光励
- 
- 18 政治运动不能解决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前言
- 21 “文革”秦城监狱坐牢追记 ..... 叶笃义
- 34 我被逼诬陷徐冰是“美特” ..... 叶笃庄
- 42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的前前后后 ..... 刘世雄
- 
- 48 为毛主席烧制专用瓷器纪实 ..... 王立新
- 52 冼星海在延安 ..... 朱鸿召
- 
- 58 台湾国语运动发起人范寿康 ..... 徐明远
- 60 张自忠在天津当市长 ..... 梁占方
- 63 斗士于右任 ..... 王新元
- 
- 66 顾准二三事 ..... 楼肇明
- 69 谁向康生开第一“枪”的 ..... 林青山
- 70 冯玉祥的五个遗嘱 ..... 郑永彪
- 72 章太炎“七被追捕”考略 ..... 杨法宝
- 
- 74 “弓藏狗烹”探源 ..... 官伟勋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吴 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徐 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照排: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印刷: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 丹心耀日 矢志兴邦

## ——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

● 张爱萍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个春秋了。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我的心头。十年前当我突然得知他不幸病逝的噩耗时，悲痛万分，当即写了首“诉衷情”悼念他：

### 痛悼耀邦同志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

突闻噩耗梗咽喉，往事涌心头。  
少年战场携手，长征喜同俦。

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  
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我与耀邦同志1933年1月相识，青少年时代在江西瑞金。当时我任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一天，团中央书记顾作霖把我叫去，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这俩人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谭启龙。当时他们只有十六七岁。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AB”系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早在1930年8月，中央就作出了《肃反工作决议案》，当时的“肃反”就是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开始还是比较慎重的。后来，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使肃反工作简单化、扩

大化，错杀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对一些被怀疑的对象，随意拘捕，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惨遭杀害。领导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只凭口供，不作调查，以致许多同志含冤九泉。此前不久我也曾被怀疑成“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若不是顾作霖、任弼时同志的明察确保，我也难以幸免。

胡耀邦和谭启龙所在的湘赣省委“肃反”搞得晚一些，胡是省儿童团团团长，谭是少先队省队部部长。他们俩被列入“AB团”分子名单、递交省委讨论时，适逢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在该省巡视工作。因为他俩都是团中央领导下的干部，就由冯文彬带到团中央审查。

说心里话，我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很反感，况且自己又有了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觉，所以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甚至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两个娃娃会是“AB团”分子。既然组织把他俩交给我，我就分别找他们谈了次话。了解了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然后就分配他俩的工作。当时我兼任“拥苏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部长，就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这两个同志都无问题。胡耀邦聪颖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好打破沙锅问（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

我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这俩人绝不是“AB



团”成员，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顾作霖同意了意见，并接受了我的建议：把胡耀邦留在团中央儿童局主编油印报纸《时刻准备着》……

后来，担任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写给省委书记谭启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冤家 AB 双脱险”，就是指的这段历史。

自此，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在此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风云变幻中，我们的革命友谊经受住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前夕，在总政治部民运组工作的胡耀邦，被任命为我们十三团的总支书记，同我们一起在草地里跋涉。草地里布满沼泽，险象环生，天气变化无常，又缺吃少喝。一次适逢总政巡视员冯文彬来到我们团。他的马驮了一袋牛肉干。我同彭雪枫同志及耀邦就打他的“土豪”，饱餐了一顿。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那次吃多了牛肉干，肚子胀得厉害。到达草地边缘过墨曲河时，因他年龄小，就用我的马把他和小通讯员们一趟驮了过去。耀邦同干部战士的关系也很融洽。他常对指战员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草地里的月亮也比草地外的月亮大，不好好欣赏欣赏，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喽！他协助我这个政委做了不少细致而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建国后，50年代中叶，他到了团中央工作，我在总参工作。虽然军地有别，工作性质不同，但他经常拉我参加共青团的活动。有次，他光说请我参加一个活动，就是不讲清楚什么内容，问他几遍，他总是说：到了你就知道了。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个大会场，主席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青年人。他首先把我介绍给大家，并带头鼓掌，然后说：“请过草地时我的团政委给大家讲过草地的故事！”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

他常说，战争年代的事情要经常讲，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永远不忘记艰苦的岁月，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和干劲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仅1957年，我就先后讲了《小土狗子过草地》、《打老虎庄》、《三块铜板过中秋》、《闯三关》、《中央苏区的红孩子》等故事。据说，在他的建议下，北京青年报还专门为我的上述故事开辟了“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专栏。

可见他的心机之妙、目光之远。他珍重友情，更重国情。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关进了监狱，妻子和儿女也被扫地出门，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失了学。耀邦就让孩子们常到他家里去，给他们讲战争年代我们一起战斗的故事，讲自强不息、刻苦学习、战胜逆境的人生道理。耀邦长期以来，很爱学习，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我的两个孩子及许多青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教益。

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拨乱反正中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顶风破浪，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其无产阶级革命的远见卓识、英明果决及非凡胆魄，是有口皆碑的。对此，我深为钦敬，也深得其益。

在中央苏区就同我们一起工作的红小鬼赖大超同志，也一起参加了长征。由于种种原因，历经磨难。建国后，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他受到了一次次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又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罚。直到1978年，其冤案还未得以平反昭雪，其工作也一直没有个着落。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平反工作。我建议他尽快解决赖大超的问题。他亲自出面与广州市委及广东省委领导联系，几经努力，终于为赖大超同志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大超同志直至晚年，同千百万被平反昭雪的同志一样，由衷感念胡耀邦同志把党的政策落到了实处，感念耀邦这位党的领袖、人民的公仆。

耀邦同志为了人民不惜肝脑涂地，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呕心沥血。在他就任总书记的几年间，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工厂、农村、军营、学校，无不留下他的足迹。在80年代的自卫还击战中，他亲临老山前线，去慰问我们浴血奋战中的指战员，讲出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名言，这对全军将士和全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

多年来，他对我负责的国防科技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凡我请示的问题，他都及时答复；凡我请他出面的事情，他都积极参加。

1980年5月18日，我们进行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上午9时,时任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来到国防科委指挥大厅,通过宽大的银屏观看洲际导弹发射的情景。当运载火箭腾空而起,把导弹射入预定的南太平洋水域,已严阵以待的测量船冲入落区、测量数据、捞起弹头,宣告我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时,指挥大厅掌声雷动。当我从指挥室走来时,胡耀邦跨越面前的座椅,快步迎上,同我热烈拥抱,连说:祝贺成功!祝贺成功!!6月10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庆祝大会,耀邦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研制、生产、试验和航海的全体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及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致崇高敬意!他说,你们的光辉成就鼓舞和启发一切想为四个现代化出力的人们,使他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才能脚踏实地地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好的贡献!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振奋地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而团结前进。

他的讲话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所有参加试验的科学技术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他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重视,对我及一切重要工作的支持,是始终如一的。

1984年1月,时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的伍绍祖同志就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情况,给我写了一封很有见地又激情洋溢的信。我除了批“完全同意”、并批转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阅示外,还写了“要下定决心,不要犹豫、动荡。同心协力、

多鼓气,大力干,不必在钱上发愁”等一段话。耀邦同志看了我的批件后,当即作了一段批示:“我完全同意张部长(国防部)的指示。有些事关系到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紧牙关也得办。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处着眼,顾虑重重,犹犹豫豫,把时间耽误了。因此,齐心协力,加油干,这一条很重要。”字里行间,透出了矢志兴邦的领袖气魄,也透出了对老同志意见的尊重。

耀邦同志不是完人,也有失言之处。我不讳言地提醒过,他很乐意接受。他尊敬老同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也是有口皆碑、万人称道的。对此,我深为感动。我及许多老同志都深感欣慰。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国家要兴旺发达,执政党的民主作风至关重要,而执政党领导人的闻过则喜、乐于纳谏之作风起着决定的作用。

令人痛惜的是耀邦同志长辞而去得太突然也太早了。他身上的许多美德及优良作风,都是我们今天十分需要的。这也是人们时常怀念他的重要原因。美德不朽,风范长存。耀邦同志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他所钟爱的人民之丹心,及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还有他倾其一生为革命创造的宏伟大业,都将与日月同辉,都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奋进!

耀邦战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81年7月31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右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八一”建军节54周年招待会。中国共产党主席胡耀邦(左二)出席

孟昭瑞 摄影

# 新时期文艺振兴 的里程碑

## ——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 荣天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做出决策，并做了至为关键思想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会在1979年底胜利举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

### 拨乱反正： 把“管教所”办成“服务站”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并开始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

的筹备工作，也迟迟不能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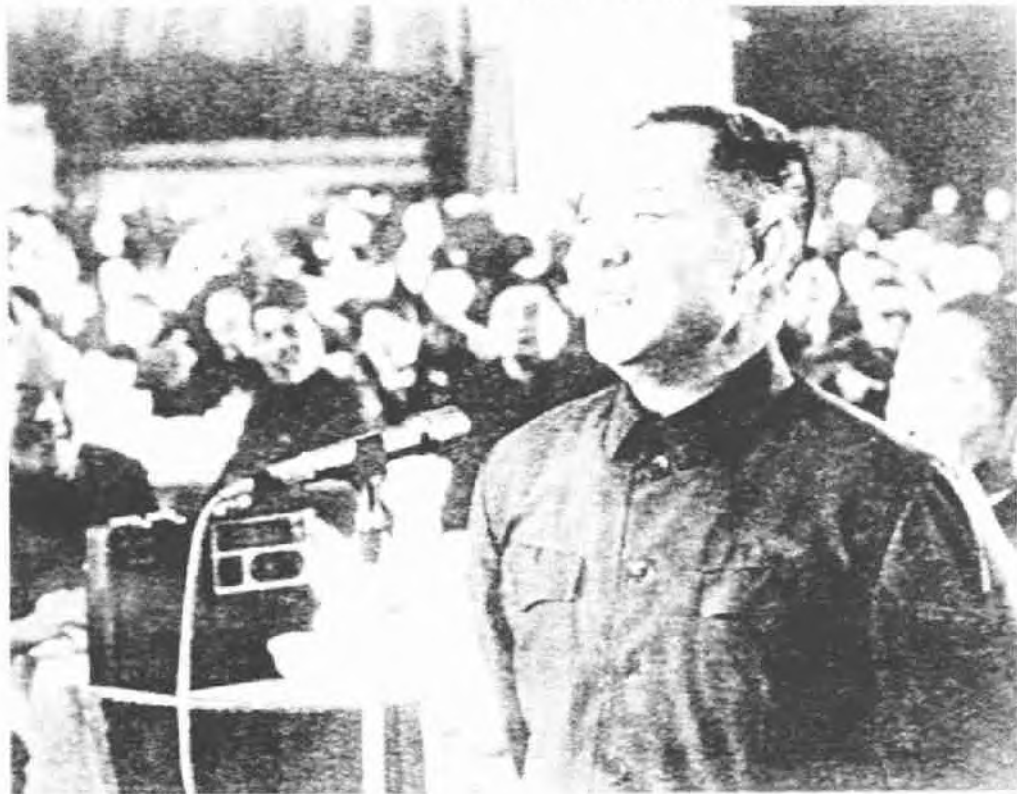
耀邦同志任中宣部长后，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将三中全会的精神洒到了中宣部。在1978年12月底的两次就职讲话中，耀邦同志就针对宣传部门如何管好文艺工作，明确提出：对待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的方针，有三种态度：一是等着干；二是推着干；三是抢着干。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抢着干。这是我们的工作风格，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的审查委员会。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或者总是坏的。“四人帮”藉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许多老同志，这种恶劣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

他说：《文艺报》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

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耀邦同志是一个思想敏锐、活跃，办事又雷厉风行的人。1979年1月2日，他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长才几天，便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与文艺界近三百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同志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

本来面目。接着，耀邦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富有风趣地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正常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



1979年11月16日晚，胡耀邦向文艺界祝贺第四次文代会召开



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使百花开得更鲜艳。

“文艺黑线”之冤宣告正式解除,与耀邦同志愿作文艺界服务站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热烈的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叙述了自己欢愉的心情。他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写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后来,周扬、傅钟、黄镇等同志都将耀邦同志这个观点加以阐释,要求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文联和各个协会都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爱护和保护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保障他们的正当权利,尊重和维护他们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注意积极引导他们,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后,耀邦同志多次与中宣部的同志说,要在文艺界广交朋友,要多为他们做事服务,和他们常来常往,不要把中宣部办得门可罗雀,要使中宣部门前车水马龙。

1979年1月,耀邦同志在召开了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部署了全年的宣传工作以后,便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这些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耀邦同志最后做结论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做一些调查,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参加的人约三千人左右,文联和各

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在另一次会上,他还谈到,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做得更好,他提出24个字,作为对文艺界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是:认真奋发图强;经常反映情况;善于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团结。

## 总结经验: 如何执行双百方针

耀邦同志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他亲自参与总结文艺战线三十年来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在听取了司徒慧同志汇报电影工作、周巍峙同志汇报艺术工作、林默涵同志汇报文学创作的情况后,就各地党委怎样领导文学艺术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总结三十年来我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三十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



第四次文代会主席台。前排左起：邓颖超、李先念、叶剑英、周扬、邓小平

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看，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八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我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和讨论。

耀邦同志是一位非常认真读书而且博览群书的人，他复出工作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人们经常看到他在读马恩全集的一些重要文章，并用红笔在值得注意之处画上道道。他在与文学艺术界的同志座谈时，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了这篇文章中一段诗一样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

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耀邦同志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究？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

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在京的《文艺报》和有关的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

周总理 1961 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 1979 年 3 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阳翰笙同志说，我们在文艺界做领导的同志，要很好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不搞形而上学，不搞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总理教导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作品和作者的实际出发。他决不拿一个固定的框子框你，总是根据你的创作实践，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或者鼓励你，或者批评你，使你感到非常温暖。蒋孔阳同志说，由于独创性是作家艺术家独有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在这里，按照文艺规律来办事，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是要像周总理所说的，要“各显所长，百花齐放”；对领导来说，则是“要干涉少些”。领导的责任是广开言路，创造艺术民主的气氛，让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有“各显所长”的机会和条件。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谈到耀邦同志提出的“文责自负”，认为这样做很好，是艺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有法可依，用法来保证文责自负的实施。文艺要立“法”，不能由哪一个人自作决定，文责自负就有了保证。作家、艺术家的信心和勇气，就有了用武之地。巴金同志用八个字来表达大家共同的心意：“文责自负，依法办事”。

## 落实政策： 加紧平反冤假错案

耀邦同志在 1978 年任中组部部长的时候，就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以

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著称。文艺界是遭受“四人帮”摧残，受害最严重的部门，加上“文革”前历次运动的牵连，可以说文艺界的冤假错案成堆。耀邦担任中宣部长以后，为了调动文艺界的积极性，他加紧为作家、艺术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79 年 3 月，茅盾同志写了一封信给文联筹备组的林默涵同志，说希望第四次文代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 21 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 70 岁到 80 岁的，最好应该来的一个都不遗漏。另外，他还建议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他举出浙江的老作家陈学昭至今还没有人管。这封信转到了耀邦同志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触地说，文艺界不知有多少为革命做过很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遭受了冤屈，还没有回到文艺战线上来。他说，邓颖超同志就叮嘱过他，过问一下阳翰笙同志工作的事。耀邦同志立即指示，要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文艺界团结、跃进的大会。

这次会议 3 月底在北京举行，参加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文联的负责同志和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共一百多人。会议产生了一个《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通知说，会议认为：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30 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等而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

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要坚决予以平反改正。另外，“文化大革命”前也批错了一些文艺作品，在给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作品被当作“毒草”批错了的，也都应该平反。

会议认为，落实政策不仅要在政治上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还要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和关心，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地给以解决。对于知名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

这次会议结束时，耀邦同志到会讲了话，他再次强调了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种人的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必须坚决把它办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次会议以后，茅盾的建议，都在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中得到落实，也为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文艺界团结奋进的大会做好了坚实的组织准备。

到了1979年9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扬的报告起草好了，耀邦同志看后，决定将报告初稿，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办法，发给大家讨论、修改，组织一、两百人参加，以文化界为主，宣传部门和理论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使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经验的大文章。耀邦同志还决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的领导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订好了框架。

10月29日，第四次文代会开幕的前夕，

耀邦同志出席了大会共产党员代表的预备会。他向党员代表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文代会要充分发扬民主，但共产党员的代表还要有党性、组织性。他向党员代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二，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三，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对文艺界历史旧帐和对当前某些作品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大会不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作结论；四，对地方党、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交中央有关部门，不在大会讨论；五，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中申诉，可向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和有关部门提出，或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

1979年10月30日，茅盾宣布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由于文代会与各协会的代表大会是套着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200名，其中有久经风雨、成绩卓著的文坛老将，有初露锋芒、朝气蓬勃的文苑新秀，有兄弟民族的作家、艺术家，也有台湾和港澳的进步的爱国文艺家，代表了全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茅盾说，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正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

## 邓小平的祝词：

### 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祝词，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



文艺工作方针,使这次大会更加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小平同志在祝词中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成果”。他还强调地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对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他说:“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听了小平同志的祝词,全体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致认为这个祝词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

周扬在会上做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他以艰巨的战斗历程为题,概述了建国30年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他说,有哪些主要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呢?主要是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

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也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

这次会,也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无论是在文联的大会上还是作协与其他协会的代表会上,周扬在讲话时,都对建国17年来,他作为文艺战线的指挥员,受“左”的思想影响,伤害过不少同志,坦诚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向这些同志致歉。一些老同志听了他的讲话,联想到大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都感慨万千,一些不必要的隔阂消除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气氛更浓了。

经过选举产生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新的领导机构。名誉主席茅盾,主席周扬,副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汗。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1979年11月16日胜利闭幕。16日晚上,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招待茶话会,耀邦同志充满豪情地向文艺界祝愿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的党从来认为,文艺事业是我们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大军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一支光荣的大军。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正在率领我国各族人民向一个更伟大的新的目标前进。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作出更加光辉的贡献。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强国,应该是经济上发达富强,政治上安定团结,文化上繁荣兴盛。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责任编辑 吴思)

# 周恩来

# 与

# 廖承志

## ● 蒙光励

周恩来和廖承志，都是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周恩来对廖承志兄长般的关怀和爱护，使廖承志终生难忘。而廖承志不负周恩来之所望，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得到周恩来的赏识。

### 周恩来对廖承志提出的正确意见总是高度重视，并给予支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廖承志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他的母亲何香凝）。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华侨工作究竟怎样搞，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任何“本本”作为依据，只能从实践中不断探索。

廖承志出身于华侨世家，

又到过日本、苏联、德国、荷兰、法国等众多国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与华侨有过广泛的接触，因此他深谙侨情。他认为：“解放以前，地主阶级和反动官僚勾结，对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侨眷在内，进行了长期的压迫和剥削，这就是广大侨眷长期贫困与破产的根源，也是广大华侨被迫离乡背井、抛妻儿、漂流国外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指出“侨眷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基于以上的正确分析，廖承志认为“所谓做好侨务工作，在国外就是：积极团结各阶层华侨，孤立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将广大华侨（包括华侨资产阶级在内）团结在祖国周围。在国内，就是动员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要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改造及爱护一天天向社会主义

发展的祖国。”廖承志对我国侨务工作总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和党中央的支持。

然而，要动员广大华侨、侨眷团结在祖国周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制订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才能唤起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炽热感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廖承志及他的战友们一道，勇于探索，敢与“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侨务政策。如：1951年侨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焦点是对华侨地主的房产是否没收？对此华侨看得很重，而对土地分配则意见不大。对此，周恩来曾经指出，华侨总的来说是好的，是爱国的，而我们的土地改革也是必须要进行的，这必然会触动华侨的利益。如果我们在房子问题上

能够解决得好，就能使华侨波澜不动。廖承志经过调查研究后也认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侨地主的房屋不能动，否则牵涉面太大。总的原则应该是缩小打击面，有利于团结国外更多的华侨。为此，他主持起草了《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呈报周恩来、毛泽东批准。这个文件公布后，得到华侨普遍的拥护。但是，下面执行的情况并不那么好。有不少地方，说是“为了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还是分了华侨的房产。消息传到国外，华侨通过社团组织，上告到了联合国。

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对下面这些“左”的偏差很有意见。于是，廖承志便主持召开了几次讨论会，最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写成《中侨委党组对广东目前土改问题的九条意见》，报政务院批准，并颁发下去。然而，中央“九条”的下达，还是制止不了下面没收华侨地主房屋的趋势。

这时，邓小平调到了党中央工作，廖承志便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出，在过去的土改中，就是贫下中农说了算，结果出了不少问题，现在决不能这样做。根据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指示，中侨委派两个工作组分别到广东和福建省了解执行情况。到广东的工作组由廖承志带领。他到广东后，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于1951年9月6日以

书面报告周恩来。同年12月20日，又将广东台山、开平等县逼死侨眷等种种“左”的偏差向廖鲁言并周恩来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九条建议。后来，党中央、政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较好地纠正了侨区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

周恩来对廖承志在侨务工作中提出的意见总是高度重视，并给予热情的支持。侨汇问题是华侨和侨眷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解放初期，我国有二百多万华侨全靠侨汇贍家养口，一百多万华侨半靠侨汇生活。廖承志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假如没有侨汇，这些人就得去讨饭了。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尚未得到有效的抑止，华侨从国外寄钱回来，货币贬值，已值不了多少钱。廖承志了解这些情况后，便找银行等部门商量：可否采取原币汇款，原币存款的方式，使侨汇保本保值。待侨汇用户来取款时，便根据这种外币当时的国际汇率来付款。他的这项建议，经周恩来批准并付诸执行，深受侨眷们的欢迎。其时，有一些干部由于受“左”的倾向影响，错误地认为侨眷接受侨汇是“不劳而获”，是“剥削”。廖承志便不断把华侨反映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一有机会，他便请周恩来接见华侨代表，让他亲自听到真实的情况。当听到接受侨汇是“剥削”的议论时，周恩来气愤地说：“假如你们认为这是

剥削，不允许侨眷收侨汇，那就让你们发钱给他们好了，发钱给他们吃饭，发钱给他们穿衣，行不行？二百多万侨眷，你们将从哪里出这份钱？！反正我周恩来这里是拿不出这个钱的！你们这些人真是幼稚得很！”为了保护侨汇，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身份于1955年2月13日发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同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廖承志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贯彻侨务政策，坚决保护侨汇》，这个命令的公布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国外侨胞及国内侨眷的亲切关怀，因而他们倍受鼓舞。

## 周恩来和廖承志配合默契，工作中体现了超前意识

解放初期，一些进步的华侨资产阶级，在当地无法生存下去了，有的想回到国内，这就关系到资产转移问题。是否允许这些华侨资本家回来办私人企业，或与国家合作办企业？这在当时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当时正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时期。廖承志认为，应该允许他们回来办企业。私人办或与国家合办均可。在他主持下，中侨委领导成员提出在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均可让华侨开发荒山荒地，种

植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这是适合华侨生产特点的，因为这些华侨在国外大多是从从事热带作物种植生产的。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了《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呈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并周恩来总理。这个条例于1955年8月6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后来以毛泽东的名义予以发布。

积极引进侨资，在国内建宾馆、办工厂等，是周恩来和廖承志的又一重大举措。还在1956年2月17日廖承志便与方方联名上书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准备成立全国性的华侨投资公司，统一募股，各地华侨投资公司即成为其分支机构。同时准备成立云南、广东、福建垦殖公司”，号召华侨回国投资，发展我国经济。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广州的华侨大厦、广东的普宁华侨大厦、开平的华侨大厦，都是当时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在广东和福建还由华侨投资创办了十多个糖厂，引进国外先进的制糖设备和技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了鼓励华侨投资，当时还制订了《华侨投资优待办法》，其中规定，华侨投资保证利率8厘，每年无论盈亏，都保证兑现。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正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却是要冒着戴上“右倾”和“投降派”帽子的危险的。这些规定的



1946年8月20日，为廖仲恺扫墓。右起邓颖超、周恩来、廖梦醒、廖承志，左一董必武，左二经普椿

形成和贯彻，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和廖承志远见卓绝的胆识，这种开放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

此外，经廖承志起草或由中侨委党组联合其它部门讨论、研究呈报周恩来批准的文件，还有1956年6月7日《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1956年8月18日国务院转发中侨委、内务部《关于选举中改变华侨户地主成分的意见》；1957年3月6日国务院转发中侨委《关于加强归国华侨职工、干部的团

结教育工作和适当照顾其生活的请示报告》，等等。这一系列的文件，体现了宪法规定的“保护华侨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的基本精神。对于归侨和侨眷的政策，当时曾总结出四句话，即“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党的侨务政策的制订，凝聚着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在与“海外关系论”、“华侨复杂论”等错误思潮作斗争中逐步确立的。



## 周恩来三次营救 廖承志

廖承志不仅是周恩来在侨务方面的得力助手，而且在外事、港澳台和对日本的工作等诸方面，周恩来都常常交代任务给他，廖承志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鼎力相助。

1958年3月，廖承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同年7月，兼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1963年10月，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1965年6月，连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从1952年起，一直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身份，从事港澳台工作。

廖承志通晓英、日、俄、法、德、荷兰和葡萄牙等国文字，因而具有外事工作的优势。他出生在日本东京，后来又有留学日本的经验，被很多日本人称为“日本通”，是主持对日工作的最佳人选。他的父母亲是国民党的著名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他在对台工作方面的地位是共产党内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周恩来知人善任，有许多事经常交代他去办。所以，从1958年起，廖承志白天基本上不在中侨委上班，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批阅侨务方面的文件。常常是凌晨时刻，周恩来一个电话来，廖承志便火急火燎地赶到中南海西花厅，接受周恩来布

置的任务。后来事情实在太多了，周恩来便指示成立“廖承志办事处”（简称“廖办”），以完成诸方面的任务。

周恩来对廖承志的了解和信赖，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早在1937年12月，周恩来就委派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同月，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嘱其组织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迅速撤离香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经过精心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使八百多名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安全从香港撤出。所以，后来周恩来对廖承志的信赖和倚重是理所当然的。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与人格魅力给廖承志很深的印象。他对周恩来的崇敬，毫不夸张地说，是无与伦比的。周恩来这个光辉名字，早已成为少年廖承志心中的偶像。他在回忆对周恩来第一印象时写道：“1924年，我已16岁，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穿着白帆布西装的人进来，同我父亲低声交谈了好一会。他炯炯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你还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廖承志对周恩来的

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廖承志对于共产党的感性认识，首先是从周恩来这位“大将”开始的，从对共产党员的良好印象，到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学习，指引着廖承志走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光辉道路。

周恩来对廖承志布置的任务，廖承志总是愉快地接受，并且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们是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之外，就是在漫长的革命旅程中，周恩来对廖承志有三次救命之恩。这种恩情重如山的关怀，使廖承志终生难忘。

1934年10月，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被张国焘加上“国民党侦探”的罪名而逮捕，带着镣铐参加了长征。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1936年2月，他和毛泽东联名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在批评其“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的同时，叮嘱对廖承志“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同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前往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11月初，在从海原通往豫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和廖承志突然相遇，处于逆境中的廖承志，正为是否上前和周恩来打招呼而踌躇，周恩来已走到他

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给他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当天晚上，廖承志被周恩来叫到司令部去，张国焘也在座。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得深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内心十分敬佩周恩来高超的斗争艺术，都一一做了回答。周恩来还留廖承志在司令部共进晚餐。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廖承志被解除了监禁，恢复了党籍。

第二次是在40年代。廖承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香港成功地完成了抢救文化人的任务后回到内地。1942年5月30日在广东乐昌县城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旋囚禁于江西省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此案一发生，周恩来就千方百计打听廖承志的下落，并设法营救。1944年，廖承志打通了监狱看守姚宝珊，托他带一封信和6幅狱中生活的自画像离开监狱，这封信和画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到周恩来的手里，他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渝胡公：我于5月30日被捕，现在泰和附近的所谓青年训练所中。其中一切，纸上难述。希望您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

了，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志9月28日。”周恩来读完这封信，又看漫画：一幅是画他躺在床上睡觉，一对硕大的老鼠同时在床上举行婚礼；另一幅是他从饭碗里捞出很多粗大的沙子。一共6幅画，都是控诉他在狱中所遭的非人待遇的。看完信和画，周恩来的眼睛湿润了。他立即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释放廖承志和一切政治犯。

这年12月，周恩来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提出在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上的四项具体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1946年1月，周恩来经过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并以中共释放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条件，同月22日，廖承志终于获释。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

周恩来第三次营救廖承志，是在“文革”中。1967年夏，江青刮起“火烧廖承志”、“油炸廖承志”的妖风，廖承志的处境十分困难。周恩来急忙以“写检举”为名，把他安排到中南海保护起来，以免遭红卫兵的揪斗。1970年冬，尚在“监护”中的廖承志心脏病发作，周恩来在百忙中仍详尽地关怀他的病情，安排他到北京医院住院治

疗。在得知他的病情恶化时，又亲自到医院看望，有时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便打电话到医院找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在询问廖的病情后，千叮万嘱：“给他喝豆浆吧，牛奶有胆固醇，可能对心脏病不利。”关怀细致，体贴入微。

1972年8月底的一天，在何香凝弥留之际，周恩来赶到医院探望。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尚处于“监护”之中的廖承志也来到慈母的床前。何香凝这时已说不出话来，她指指站在床尾的廖承志，又指指周恩来，嘴唇抖着。周恩来懂了她的意思，大声回答道：“承志是好同志，他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吧！”处于尚未宣布“解放”的廖承志，这时听了这番话，热泪不禁滚滚而流。不久，廖承志被宣布“解放”，同年底，任外交部顾问。次年8月，当选为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

正是周恩来这种刻骨铭心的关怀和爱护，使廖承志在革命征途中，几次化险为夷，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与廖承志的友谊，是周与廖家之间友谊的延续和发展。

周恩来与廖承志的友谊源于周恩来、邓颖超与廖承志的父母亲廖仲恺、何香凝的友谊。早在1924年，廖仲恺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时，便根据张申府的推荐，让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鉴于周恩来当

时经济状况不太好，廖仲恺还给在法国的周恩来汇去回国的差旅费。在黄埔军校期间，他们合作共事，亲密无间，他们共同为开拓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而殚精竭虑。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有时周恩来是在廖仲恺的住家“双清楼”共进早餐后才一起驱车前往黄埔的。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所指使的暴徒杀害。案发的当天，周恩来闻讯便赶到医院表示哀悼，并对何香凝及全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月，周恩来撰写《勿忘党仇》的悼念文章，痛斥反革命派的罪恶行径，高度评价廖仲恺的不朽功绩。

邓颖超于大革命时期，就

在国民党广东妇女部任秘书长，协助何香凝部长工作。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她们一道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作出杰出的贡献。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长期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在抗战期间的雾都重庆，作为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廖梦醒经常来回于他们之间，得到周恩来的呵护，廖梦醒因而昵称周恩来为“阿哥”。由此可见，他们两家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周与廖承志之间的友谊，毫无疑问，则是周与廖家之间友谊的延续和发展。

应当指出，周恩来对廖承志是十分赞赏的。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儿子，他不贪图荣华富贵，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怕白色

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并且不怕挫折，愈挫愈奋，这在周恩来看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诚如廖承志逝世后，邓颖超应中山大学之请，在题词中所写：“廖承志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经历过严峻的考验，他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斗志不衰，工作不懈，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的伟大的战士！”这是邓颖超对廖承志一生所作的评价，同时也代表了周恩来的心声。作为领导和兄长，周恩来对百折不挠的“小廖”倍加爱护，乃势在必然之事。

(责任编辑 致中)



1962年，周恩来、陈毅等在何香凝副委员长家里为她祝寿。左起经普椿、廖承志、李涓；右起陈毅、周恩来、何香凝

# 政治运动不能解决问题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前言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甚至，“文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财之道了，从“文革”像章、“文革”歌曲、“文革”中的样板戏，直到以“文革”为题材的书籍……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提出的，也是当年我们许许多多冥思苦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解决了吗？

“文革”是怎么发生的？直至今日，人们更多强调的仍旧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人看到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化官僚横行一方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他们往往会口出惊人之语：“真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幻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杜绝各种社会腐败现象，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次规模大些的运动吗？建国以来，这样的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

“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文革”搞了几年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了。只不过，他老人家的思想已成定式，钻进“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出不来了。无可奈何之余，他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泽东讲这话时，已是垂垂老矣。人老多健忘，从1952年到1957年，从1957年到1959年，从1959年到1963年，从1963年到1966年，他亲自发动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隔最短者不足两年，最长者也不过五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如何使得？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侯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辑录这些亲历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暴露所谓的“阴暗



面”。事实上,具体到某一个运动本身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言,人们今天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并且,即使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不少人也不否认毛泽东当初发动运动时具有良好的动机。问题是,靠运动,或者用“文革”这种令人发指的“打倒一切”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吗?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这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文革”过去了20多年,为什么仍然有人会赞赏“文革”,主张再搞运动呢?除了那些“文革”中的受益者和少数思想极端偏执者外,多数普通人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社会腐败现象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出解决的出路何在。

是不是真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出路呢?当然不是。几乎所有国家在走向经济富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社会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问题,但很多国家都度过了这样的难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很明确地讲,我们的有些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改革制度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如同朱镕基总理在本届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民怨沸腾”的局面,从而使许多人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怀疑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甚至产生了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糊涂观念。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不行了。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

编辑这部集子,也是希望读者能够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光明前景:不是没有办法。我们编辑这部集子,更是希望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了解:搞运动不是出路,中国决不能再搞运动。无论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搞运动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摒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避免重犯“文革”的错误在于此,恢复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在于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在于此。

(本文系《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的前言,题目为本刊编者所加。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封面

**编者按：**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被诬陷为“美国特务”，1972年3月被迫害致死。徐冰，原名邢西萍，河北省南官县人。1923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被捕，经营救出狱后，在北平、太原等地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937年任延安《解放周刊》编辑、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9年调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

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徐冰，谢世七年之后，始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我国社会知名人士、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叶笃义，以及其弟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原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叶笃庄，均因徐冰冤案遭株连而被捕入秦城监狱，备受折磨，“屈打成招”。徐冰冤案平反后，随之平反并恢复名誉。叶氏兄弟现均健在，他们分别撰写回忆录，披露这一段被逼供并打成“美特”的不幸经历。

“文革”期间，发生在秦城监狱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为狱中犯人及其家属所痛恨。1972年毛主席得知此事，曾严肃地批评此种法西斯审查方式，并要求立即废除。叶氏兄弟在耄耋之年写下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目的在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读了叶氏兄弟的两篇回忆录，更使我们深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并应为其真正实现而共同努力。

► 徐冰与他的  
妻子张晓梅

▼ 60年代的徐冰



# “文革”秦城监狱坐牢追记

● 叶笃义

1966年的8月24日，一批红卫兵闯到民盟中央，勒令在72小时之内解散民盟组织。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民盟中央召开批斗吴晗、章伯钧、千家驹、陈新桂大会，让他们四个人跪在院子中央，我们这些人则围列一旁陪斗。批斗会结束后，红卫兵当场宣布了一份《致民主党派最后通牒》。8月26日，民盟中央停止活动了，其它民主党派组织也照样停止活动，但我们这些人仍然要参加学习批斗会。我被打成右派后，调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此时，政协已被封门，因我是民盟的老人，所以仍留在民盟这边参加运动。

从这时开始，我就被无休止的拉来拉去参加别人的批斗会，或直接对我的批斗，不断地认罪、检讨、写材料、劳动改造、被机关造反派拘留。直至1968年4月26日由卫戍区派来解放军对我宣布正式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坐了四年三个月零二十天的牢，经历了八次三十九堂的审讯（其中还不包括在民盟被造反派拘留的三个星期和一次审讯）。直到1972年8月16日未经宣布任何审讯和判决结果，突然被释放回家，出狱自由了。从1965年算起，到1972年8月出狱，在这长达七年的无情折磨和反复审讯中，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我自己也不清楚。现在已是进入跨世纪的年代了，我自己也到了耄耋之年，对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经历，我应该有个交

代。因此，我把在秦城监狱坐牢的四年多中所受的种种折磨和我名为审讯，实为“逼供信”的经历如实写出来，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对这一段人生苦难经历的回忆与反思，对世纪交替的后来人说，也是帮助他们了解历史，明鉴历史，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不要再有我们这样的苦难遭遇。

## 序 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民主党派被勒令停止活动，我除了参加学习、陪斗、下乡劳动等等之外，关于我自己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提到批斗日程上来。直到1967年10月初，民盟燎原造反队的黄景钧通知我说，中央统战部造反派有人找我谈话。谈话的主要问题是会同司徒雷登的关系。此后，又谈过几次话，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交代和司徒雷登、张东荪、甚至和徐冰之间的特务关系。1968年4月4日，民盟燎原造反队的涂汉清通知我当天晚上到民盟去接受审问，审问一开始，就对我宣布：“你从现在起就被民盟革命群众拘留看管起来了。”接下去说我过去的交代都是翻案材料，没有一句真话。他们说：“司徒雷登是美国特务头子，你同美国特务头子是代理人的关系，那你同司徒雷登就是特务关系。”并且逼我

照他们的逻辑写成文字材料。

从4月4日晚上开始,对我进行了第一堂审问。紧接着在4月5日上午、下午、晚上,4月6日上午,夜以继日地对我进行了五堂审问,每堂平均都是三至四个小时。在那样定了性之后,他们要我重新交代特务活动。我说来说去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我以前写的那些材料的内容,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主审人见我交代不出新的东西来,便采取了“点”的办法。所谓“点”,这是审问上的一个术语,以后在审问中他们经常使用这个字眼。由审问人提出一两件所谓的具体事情,叫被告人按照他们点到的事做交代,写进材料里。这次审讯中他们点到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说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同司徒雷登发生了特务关系,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特务分子,而且是三个绰号叫作“龙、虎、狗”的首要特务分子当中的那个叫作“狗”的;

第二件事:说我1938年第一次同张东荪见面的地点是燕京大学校园里的桥头上,一同去的还有另一个人;

第三件事:说我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后到1946年3月我离开北平之前,曾在北平同司徒雷登见过面,并且事后曾洋洋得意地对另外一个人谈到见面的情况。

点出以上几件事之后,反复追问叫我交代下去。我越听越糊涂,什么也交代不出来。迫不得已,在4月6日上午我对审问人说:“你们点出来的事,距离实际情况十万八千里,我一里的距离也赶不上去。既然张东荪已经被逮捕,我情愿你们把我也逮捕起来,叫我同张东荪当面对质好了。”我这样一说,他们立刻说我犯下了如下罪行:

第一,拒绝交代,抗拒文化大革命。

第二,诬蔑说政府掌握的材料冤枉了我。

第三,为同伙掩护,替同伙翻案。

第四,为主子尽忠,情愿坐牢。

逼我写下犯了以上四项罪行的《认罪书》,并且说:“这是你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挑战。我

们接受你的挑战。想进监狱,这很容易。但是想再要出来,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好,你等着吧!”接着把我衣服上戴的毛主席像章摘了下来。整个审问就结束了。

## 正式逮捕进秦城监狱

从4月4日晚上开始我就在民盟被拘留看管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到了4月26日下午一点多钟,民盟燎原造反队的张宰邦突然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看样子你也不准备交代了,‘五一’快到了,我送你回家吧。”于是就由他和涂汉清两个人坐着民盟的汽车把我押送回家。到家后张宰邦还假装地问我送我回家你有什么想法。我当然说很高兴,回家后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看病了。正在说着,突然几个解放军走进我的家里,对我说:“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将你逮捕。”命令我在逮捕证上签名,时间是4月26日下午2点30分。随即这两个解放军把我押上一辆吉普车送到一所监狱,我被送进一间单人牢房。我跨进牢房之后,铁牢门砰的一声上了锁,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秦城监狱,从此我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多严格的监狱生活。

4月26日我入狱之后,度日如年地等了二十多天,直到5月22日晚上,看守人突然打开我的牢门,宣布提审。这是我被逮捕入狱之后的第一次审问。以后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对我进行了三次审问。在这三次审问中,审问人共六个人。其中的主审人就是1967年10月初在统战部造反团约我谈话那个人,四位陪审人中的三位都是参加过在民盟被造反派拘留期间审讯时的旧人。只有一位是这次参加的新人。此外还有一位解放军也参加了审问。

## 第一次审问

第一次审问是从5月22日晚上,直至5月24日上午,一共进行了五堂审问。审问一开始,主审人问的第一句话是:“你被捕入狱二十多天

来,你想的是什么,交代!”我说:“我正准备同张东荪当面对质。”我这样一说,主审人立刻用手在桌子上狠狠一拍,说:“你还在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你要明白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民法庭来对你进行审问的。”接下去就对我宣布了两条道路的选择。第一条是生路,那就是坦白从宽;第二条是死路,那就是抗拒从严。并且命令我从下次开始,在每一次审问的时候,进到屋里来首先要向墙上挂的毛主席像行一鞠躬礼,并在像的面前高声说:“我是一个美国特务,我犯下了严重的特务罪行,我向毛主席请罪。”

关于两条道路的选择问题,我对审问人说:“我要选择的当然是第一条路,绝没有自寻死路的理由。不过这里有一个主观愿望和客观事实的矛盾问题。我的问题都已交代完了,没有任何可以补充交代的了,无从坦白起。”我这样一说,主审人立刻说我是公开的抗拒,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行。逼我写下《认罪书》。写了《认罪书》之后又叫我从头交代,从学生时代同司徒雷登的特务关系交代起,直到要我承认我是那绰号“龙、虎、狗”的三个首要特务分子当中那个叫做“狗”的人。关于这一点,反复追问,我什么也交代不出来。第一次审问就这样结束了。

## 第二次审问

5月30日上午、下午、晚上,5月31日上午、下午,一共进行了第二次的五堂审问。这次审问的中心内容是叫我交代1938年我同张东荪一同去汉口之前同张东荪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也就是在民盟造反派拘留我期间审问我的第二件事。主审说我当时是坐着一辆小卧车到燕京大学,车子开到校内一个小桥边,遇见了张东荪,车停下来。同我一道去的另一个人是我的爱人。我把我的爱人向张东荪介绍以后,就带着爱人去见司徒雷登。两天以后才一个人到张东荪家正式拜访。他这样一说,我真莫名其妙起来。我说:“三十多年以前这样一些琐碎情节,我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而你们居然说得这样具体,这样详细。”不管他们讲得如何具体详细,没有的事情我当然承



1935年25岁时的叶笃义

认不下来。

主审人见我始终不承认,十分震怒地说:“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我们把全部情况都给你点出来了,你还顽抗到底不承认,你这真是自寻死路了。”那位解放军也接下去恶狠狠地说:“看起来,我们给你保留的自由还是太多了,你现在手脚还有点自由呢!”暗示要给我戴上手铐脚镣。

在种种高压威胁之下,我说来说去还是对不上他们的口径。他们最后说:“你只要按照我们给你点出来的交代,我们就认为是你主动交代的,还可以从宽考虑。”我当时心里想,反正这是一些无所谓的琐碎情节,不必同他们硬顶下去了,终于不得不把这一件莫须有的事情全部都承认下来。在结束审问的时候,主审人用相当温和的口吻说:“你看,你这样承认下来了,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二次审问就这样结束了。



## 第三次审问

第三次审问是在6月6日的下午和6月7日上午、下午、晚上，一共审问了四堂。这次审问的中心内容是叫我交代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到1946年3月我离开北平去重庆之前这一段“罪行”，这也就是在民盟被拘留审问当中所点出来的第三件事。我把这一短短时间内我所回想起来的大小事情交代来交代去，他们说交代的都是为掩护自己而披的外衣，真正的罪行没有交代出来。主审人说：“你的问题要仅仅是你写的书面材料里那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还逮捕你呢？”他又进一步明确地说：“这一段时间很短，可是你的特务罪行主要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做出来的。张东荪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交代和揭发。他今年八十多了，你还不到六十岁。你连张东荪都不如。”我想不管张东荪对我有什么揭发，我确实交代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

这时候已经到了7日的半夜了，我身体和精神都支持不下去。审问人之一问我说话为什么口齿不清楚，我对他们说：“我进监狱已经快两个月了，每天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关节炎又在发作，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下去了……”主审人大发雷霆地说：“你不要抱怨失眠和关节炎，我们对你实在过于客气了，还没有给你戴刑具呢！关于今天问你的事情，你要是不交代，你就还要坐二年、坐二十年的牢，无论如何你是滑不过去的。”他还别有所指地说：“过去有人一直包庇着你，你现在拒绝交代是在掩护他。”我当时听来莫名其妙，不知“他”是何所指。第三次审问就这样结束了。

## 狱中生活情况

6月7日晚间第三次审问结束之后，我十分狼狈地回到自己的牢房，当晚彻夜未眠。我在牢房里度日如年地等待着下一次的审问，足足等了十一个礼拜，也就是在8月24日才对我进行了再一次的审问。在这一段苦熬等待的漫长岁月

里我真正尝到了人间地狱的滋味。

我于1963年就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病，小汤山疗养院治疗后有好转。出院时，大夫嘱咐还要注意保护，否则还有反复的可能，甚至会发展到部分关节僵直。所以当4月26日我被捕入狱时还是穿着棉裤、棉袄、毛衣、毛袜去的。可是到了监狱进行登记时，登记人把我的棉裤、棉袄、毛衣、毛袜通通扒下来，只剩下随身穿的两件单衣就把我送进牢房。我向他请求给我保留一件毛衣以御寒，他给我的答复是：“你少啰嗦。”进到牢房之后，冻得无奈，只好把床上那条棉被整天裹在身上。有一天看守人通过牢门上的玻璃孔看到我裹着棉被，命令我不准再裹。我向他说明原因请求予以照顾，这位看守人大声斥责我说：“混蛋，这里是监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没有你说话的权利。”无可奈何，我只好放下棉被，采取在牢房里快速来回走动的办法，借以增加一点体温。这样苦苦熬了五个礼拜，到了5月底6月初天气转热了，我才逐渐适应下来。

牢房内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下面紧接着下水道，是供犯人每天洗脸洗手洗脚用的。但是又不发给毛巾或任何抹布（当年12月30日才发给我一块毛巾）。每天洗完后满脸满手凉水，得让它慢慢干掉，又增加了我这个关节病人的痛苦。

犯人床上那条棉被，一年四季就是这么一条。天气凉时盖着合适，到了7、8月间三伏天气，简直就热得无法沾身了。夜里睡觉，只得上身光着，下身穿一条短裤，衣服用来当枕头。后半夜凉风一吹，还得把身子缩到被子里去，片刻工夫大汗如雨，热得无奈又得把身子挪出来，就这样来回折腾，既睡不好觉又影响关节。

监狱里每天让犯人放风晒太阳，这本是好事，但是在我关进监狱的前三年半期间里，一个多月才放一次风。以后才增加到一个礼拜一次，最后增加到一个礼拜放风五次。放风，在春夏秋的季节，对犯人都是一件十分有益十分需要的事。但是冬季里，对我个人来说，那简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上下四壁没有一点缝隙可以通气。因为我们犯人住的牢房唯一的牢门整天上锁紧



闭,牢窗只是在春末、盛夏和秋初的大约六个月的期间打开。在这样一间密封似的牢房里,突然被带到一个露天小院里去站一个多小时。平时在牢房里穿多少衣服,出去还是那点衣服(当年10月3日才发给我一身棉衣),而且推的又是光头,不发给帽子,这样的温度差,对犯人的身体就是极大的考验了,何况我又是个多年患关节病的病人,更是承受不了。

以上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的关节越来越酸痛得厉害。我真怕应了大夫的话,落一个关节僵直,终身残废。

睡眠对我也是一关。我很久以来就患失眠症,平日多半服安眠药才能入睡。进监狱之后,监狱里对犯人实行整夜开灯睡觉的制度,而且犯人的脸必须朝着灯的方向睡,这是为了方便夜间值勤的看守人能够从玻璃孔看清犯人的脸。我有一次偶尔睡着了不自觉地把身子翻了过去,恰被在玻璃孔窥视的看守发现,他们就用力敲打牢门,把我喊转过来,我每晚能睡着的时间就更非常之少了。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疲乏,不由得把眼睛闭上。这时若被看守人看到,于是又敲打牢门,命令我不准闭眼。我不得不努力把眼睛睁开呆着。

除了牢狱生活中这些无尽止地痛苦和烦恼之外,狱中的环境气氛,也使正常人忍受不了。在我关进监狱的头两个月里,就遇到这样两件事:距我的牢房不远的牢房里,前后大概疯了两个在押犯人。第一个人是在5月间一个夜里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夜半哭声,平时听起来就有凄惨的感觉,何况一个人躺在单身牢房里听到这种声音,更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了。这个人连续闹了五六天后突然安静了,我估计是监狱里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接着在6月份的一个夜里,又一个牢房里的犯人大声喊叫起来。这个人是不哭,只听见在那里大声说话,好像是控诉说理似的。由于牢房内回音太大,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只听到他边说还边喊口号。其中听得清楚的是“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人连续闹了两三夜。最后一夜正在闹的时

候,我听见有几个看守人员跑去开牢门,于是马上传来发生搏斗的声音,继而传来上镣铐的声音。我估计是给这个人手脚上刑具了。但手脚上刑具,仍挡不住他嘴里更大声地叫喊,更大声呼口号。但不久之后,就听见由大声叫喊变为大声哼哼,又由大声哼哼逐渐逐渐变为小声哼哼,最后力竭声嘶,一点声音听不见了。第二天那间牢房里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我估计这个人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上述两件事对一个神经健康的人大概也算不了什么,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人来说,不由得引起我极大的恐惧。自此之后我就常常这样嘀咕:我要是也这样疯了,怎么办?叫我死,可也别叫我这样疯。越想越怕,越怕而又不由自主地总要往那上面想。

我就是在上述种种身心状态下,从6月7日起又苦熬了两个月零八十八天。直到8月24日上午看守人把牢门打开宣布提审,这是进狱以后的第四次审问。

## 第四次审问

8月24日的上午、下午,8月27日的上午、下午,8月28日上午,一共进行了五堂审问。这次每堂审问只有一位主审人和一位陪审人。审问一开始,主审人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叫你交代几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底。今天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你的问题的底了。你要是能老实交代,我们的审问就可以结束。否则我们就永远这样审下去。你愿意坐一辈子牢吗?”他交的这个“底”是什么呢?就是我同徐冰的关系。

主审人明确地说:“徐冰在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你在1946年离开北平。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短,可是你的特务活动主要就集中在这一段的时间。过去徐冰一直包庇着你,你现在拒绝交代是掩护他。你不要用抗拒交代来企图为徐冰翻案了,徐冰自己都已经交代出来了。”

自从1968年初统战部对我进行审问以来,

时间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审问来审问去，真使我晕头转向如坠五里雾中。直到这一天我才知道他们心目中我的问题的真正的“底”是徐冰。怪不得1月初他们在名为调查的时候就反复追问我去曾否同司徒雷登谈过徐冰；怪不得当年2月27日或28日他们在审问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我向司徒雷登提供过什么情报；二是我在解放前同徐冰的关系；怪不得他们多次说我拒不交代是为同伙掩护，替同伙翻案，是为主子尽忠，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所说的“主子”和“同伙”指的是司徒雷登和张东荪，至此，我才明白了他们所指的“同伙”、“主子”是徐冰，说我为徐冰掩护，替徐冰翻案。在他们的威胁和提示之下，我承认了我同徐冰之间的特务关系是张东荪介绍的；我承认了我把徐冰提供的情报转报给司徒雷登和张东荪；我承认了我、司徒雷登、张东荪、徐冰之间形成了一条特务线。主审人见我承认这些，马上转过口气来说：“今天你的态度比较老实了。”我听了真感到这是对我政治良心上的一大讽刺。

接下去追问的是，徐冰向我提供了什么情报。关于这一点，我可实在交代（应当写成捏造）不出来了。主审人见我交代不出来，便说：“关于这一点你不交代，也仍然滑不过去的。徐冰在自己的交代里说他向你提供了大量情报。必要时我们可以念一两条给你听。”他刚说到这里，陪审官立刻把一本按着手印的口供从中叠了几处送给主审人，看上去好像他们确实是有根据似的。但是主审人并没有念，而是勒令我自己交代，我怎么知道徐冰在他的“交代”中向我提供了什么情报呢？

主审人见我实在交代不出来，便主动地向我点了，他说：“我现在点给你听。你要是能老实交代，就是你主动交代的，还可以对你实行从宽的政策。”我这时反正已经横了心，他们点出什么来，我就承认什么，然后把它写在纸上作为我的交代。目的绝不是想借此得到什么从宽处理，而是按刚才主审人所宣布的，我要是能“老实”交代，审问就可以告一结束，否则他们就一直逼问下去，有可能势必把我逼到发疯的地步。

于是根据第一位主审人点，我边听边记下徐冰向我提供的大量军事情报：在东北战场方面，解放军撤出锦州之后，当时的战略方针是放弃一切大、中、小城市，撤出铁路沿线，集中全部力量在农村搞土改，然后积极反攻。第二位主审人点，徐冰向我提供在苏北、华北、东北战场方面，关于解放军的“军事力量、武器配备和军事部署”。主审人这样点，我就照记下来，写在纸上作为我自己的交代。

把上述默写方式的口供交给他们之后，他们在觉得文字不够确切的地方和不够充实的地方亲手加以修改，命令我按照他们改的再把原件重新抄过，写上名字，按上手印，作为正式的材料交给他。第二天上午的主审人又把我在头一天按照他先后点出来的交代材料再次拿回来，命令我在上面加上这样一句话（他口述，我照写）：“徐冰还提供了关于军调部三人小组的交涉情况以及中共的对策。”又发给我一张白纸，命令把上面那一句话加上的原件再重新写过，写上名字，按上手印，作为正式材料交给他。这两位主审人为了逼要我的口供，也真算是费尽心机了。

在这次审问临近结束的时候还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8月24日的审问中第一位主审人逼着我承认并且书面交代了我把徐冰提供的情报转给了司徒雷登和张东荪。实际上司徒雷登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从日本监狱释放出来，在北平呆了一段时期就回美国去了。而徐冰则是1946年1月才到北平的，我是1946年3月间离开北平。所以徐冰到北平的时候，司徒雷登并不在北平。8月28日上午，第三位主审人在审问这段情况时，突然脱口而出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司徒雷登在北平吗？”他的话刚说到这里，旁边坐着的陪审官立刻向他看了一眼，主审人觉得自己问的不对头了，于是急忙把话刹住。我上面已经提到，在这次审问当中，主审人先后分为两个，当第一位主审人逼着我承认把徐冰提供的情报转告给司徒雷登的时候，我就曾明白地对他说：“1940年我在北平见过司徒雷登之后，一直到1946年他到南京作大使之前，我根本

同司徒雷登未见过一面。你叫我这样交代,不是太冤屈了吗?”他回答:“你就得这样交代,你非这样交代不行。”在这样情况下,我终于不得不按照他所要的材料写出了那份口供。当时第二位主审人不在场,所以不清楚这段经过。而陪审的那位女同志是清楚的,就暗示了他一下。我不由得苦笑起来。陪审人见我笑了,大声叱斥说:“严肃一点,少嬉皮笑脸。”对着这样的场面我只好回答了一句:“那个时候司徒雷登想必是在北平吧。不然,我怎么能给他去送情报呢?”主审人对我这个不对味的回答不予理睬,接下来又问我徐冰是在什么场合向我提供那些情报,我又是怎样向司徒雷登介绍徐冰的,司徒雷登听了情报之后又是怎样表示的?我反正已经是一不做二不休了,无可奈何地只好顺竿爬,随便编造了一两句就又凑成了一个标题为《我是怎样在司徒雷登和徐冰之间搭线的》这样一个书面材料。这个口供写出之后,我忍不住对审问人说了这样两句话:

“自从今年年初你们就参加审问我了,你们十分清楚我的口供是怎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他文不对题地回答了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第四次审问就如此这般地结束了。

中国有一句谚语叫作“饮鸩止渴”。鸩是一种毒药,喝了是会死人的。但是一个正在渴得要死的人,明知它是一种毒药,也要喝一口以苟延残喘。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作了如上所述的假供,应付了第四次审问。

第四次审问结束之后,我回到自己的牢房,这时心倒定了下来。因为他们给了我两个“底”。第一个“底”是同徐冰的所谓特务关系;第二个“底”是我承认了同徐冰的关系以后,审问就可以告一结束了。我就不像以前那样苦熬等待审问,时间好像比过去快了许多,9、10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从11月份开始,监狱里对犯人的待遇也有了一些改进,可以看报了。我从报纸上得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公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两个月以后,我又从中央两报一刊1969年元旦社论上,读到了毛主席的“清理阶

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最新指示。以后又陆续公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等等最新指示。读了之后,好像一个患重病的人服了一服清凉剂似的,心情逐渐逐渐开朗起来。

相信我们的问题会得到正确的解决。但同时也产生了对我所做的那些假供的负罪心情。

## 第五次审问

1969年10月8日下午,看守人打开牢门又宣布提审,第五次审问开始了。

10月8日下午,10月9日上午、下午、晚上直到10月10日上午、下午,一共进行了六堂审问,参加的共有四位审问人。其中的主审人是1968年1月初到民盟找到我调查材料的统战部那个人。

10月8日下午第一堂审问开始,主审人的第一句话是“一年多没有提审你了,你心里想了些什么,交代!”我说,我正等候着你们客观地调查公平处理。主审人说:“你现在还不是如何处理的问题,而是要继续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只有根据你交代的彻底不彻底和态度的好坏,处理才有所不同。”之后,那位解放军从皮包里取出我四个子女给我写的一封信连同我外孙女的一张像片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他们要同我划清界线,叫我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看完了信之后,就让我回牢房反省,准备第二天交代。

第二天上午,第二堂审问开始,我首先对审问人作了如下声明:“我坦白交代,我在第四次审问上所做的那些交代是不老实的。其所以不老实,并不是我有什么东西隐瞒起来没有交代,而是我所交代出来的东西完全都是假的。我不准备在这里分析检讨我做那些假供的主观原因。无论如何,做假供总是一个犯罪行为。我现在端正态度,老实交代出来。”主审人一听我的话立刻发怒地说:“你不交代新的,而且还要推翻旧的。你过去的交代也不是你一句话所能推翻得掉的。你

同徐冰之间的特务关系,那只是你的罪行的一部分,你还有其它的罪行没有交代出来呢。”这样一说,我的问题在他们眼里不但没有完,而且又升级了,看来上次说交我一个“底”,还不是真正的“底”啊!真令我不知何指,手足无措。接着命令我回到牢房反省,准备下午交代。

下午,第三堂审问一开始,主审人命令我交代新的“罪行”。我说:“我实在反省不出来,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在审问人反复追问之下,我还是交代不出来。主审人随即又采取点的办法了。他首先点出一个名字叫“卢广声”的人。我说:“这个人我认识。他过去是民社党的党员,后来到香港去了,自称去做进出口生意。1949年我由香港到天津的船票是托他代买的,这件事我早已交代过了。”主审人接下去说,卢广声是国民党中统的少将特务,说我在卢的领导下活动也是中统特务。我给中统写过许多情报,还拿过许多奖励金,我给中统的许多情报在国民党的档案中已经抄出来了。听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全部的百分之百的是假的,连一分的真实性都没有。”接着他们又点出一个名字叫“方东”的人来。我说,这个人我也认识,他是老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解放前在国民党财政部工作,他同我的一个亲戚同时在国民党财政部工作的名字叫“姚曾虞”的人相熟,我是在姚的家里同方东认识的,我同方东没有什么个人来往。他接下去说,方东是一个美国特务,我同方东也有特务关系。我说:“这同样地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才听到的一个新闻,连一分的真实性也没有。”主审人不听我辩解,说只是点出这两个人的名字来帮助我反省。这次审问主要内容还是彻底清算我同司徒雷登的关系。

当天晚上,第四堂审问接着开始,主审人拿纸和笔交给我命令我写出同司徒雷登的“特务关系”材料。我就我过去同司徒雷登的接触中找出几条可以上得了“特务关系”的纲的事写了出来。这些事都是在我以前写的书面材料中反复交代过不知多少遍的了。主审人匆匆看了一下,说:“你写的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增加新的,反比

你已经交代过的又大大退了一步。”我说:“我在第四次审问上的交代,那完全是一个假供。徐冰究竟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发生过什么特务关系,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至于说我同徐冰的所谓特务关系,完全没有那么一回事。我在上次审问上把水搅浑,欺骗了党,欺骗了法庭。我这负罪的包袱背了一年多。我不愿继续背这个负罪的包袱了。”陪审的那位解放军说:“你这个包袱想卸也卸不掉,你这个罪想赖也赖不掉。”当晚的堂审就结束了。

10日上午,第五堂审问开始,主审人把我头天晚上写出来的材料拿出来,说我写的东西没有把我的“特务面貌勾画出来”。随即拿出纸和笔来命令我重新改写。我说:“我写的全部是实事求是的交代,我不知道如何改法。”四位审问人于是坐在我面前,根据我头天晚上写的,以及以前写过的许多书面材料,动嘴指点出来。有的勾掉前半句,有的勾掉后半句,截头去尾,断章取义来烘托“特务性质”的气氛,又字斟句酌地修改词句来勾画“特务面貌”。他们怎么说,我就得怎么写,拒绝不写那就是“公开抗拒”。就在这样地强制下,最后写出一份材料,他们收了回去,审问就结束了。

下午,第六堂审问开始,主审人把我当天上午根据四位审问人的嘴,通过我的手写出来的交代拿出来。只见上面又有许多他们亲自动笔修改的地方,稿面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他把这个最后定稿的东西交给了我,命令我按照他的定稿在另外的纸上抄写清楚。抄写完了之后,又命令我在上面加一个标题:《我同司徒雷登的特务关系》。然后把这份抄写出来的口供放在审问桌的一边,又继续审问。

他们问我过去拿过多少司徒雷登的津贴,拿过多少特务钱,我说一文都没有拿过。他们说:“你拿过张东荪的钱没有?”我说:“我拿过,早已交代过的了。”(事实是这样的:上述我的亲戚姚曾虞和方东两个人在1947到1948年之间曾经每月汇寄一百五十万法币赠送给张东荪。当时我在外面做民盟的工作,没有收入。我爱人带孩子

住在北平，生活很艰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张东荪又把这笔钱转送给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拿了大约六个月，因法币加速贬值，我爱人也就放弃不要了。)主审人说：“你少说这些废话，反正你家里拿了一个月，也算是你拿的。”接下又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方东又是美国特务。你这不是拿了美国特务的钱吗？”随即指着我才写好的他暂时放在审问桌一边的《我同司徒雷登的特务关系》，命令我再接着写下去。他口述，我照写：

“美国特务方东在1947年每月由上海汇寄一百五十万法币给美国特务张东荪，张东荪把这笔钱转送给我的家庭。我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了美国特务的钱。”写到这里他让“另起一行”，写了这样几个字：

“我低头认罪。”

第五次审问随即结束。

## 第六次审问

第五次审问结束之后，仅隔了三天，14日下午，15日上午、下午，16日上午、下午，10月17日上午，四天里，又进行了第六次共六堂的审问。审问人还是第五次审问那四位。

14日下午，第一堂审问开始。主审人命令补充交代新的罪行。我说，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四位审问人于是协作得很好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追问起来。他们所问的都是陷人于罪的问题。他们一人问一句，我就得回答许多句。问来问去，问得我口干舌燥，头晕脑胀，简直无法应付了。主审人最后从我许许多多句混乱的回答中，抽出两句来，说那两句话是不能同时并立的，是不合逻辑的，因而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不老实的，逼着我又写下一个简短的《认罪书》，照例写上名字，按上手印。不过这次突然加了一个花样，命令我在名字前面加上“美特”两个字。

15日上午，第二堂审问一开始，主审人还是照例的开场白叫我补充交代新的罪行。无论他说什么，反复追问，我还是交代不出。这时候那

位陪审的解放军从他皮包里拿出一摞被拍成照片的我在第四次审问时被迫写的那些假供，一张一张摊在桌上，指着说：“你这些罪行铁证如山，你能抵赖得掉吗？”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要我交代的罪行，还是指的第四次审问时的那些内容。

下午，第三堂审问一开始，我说：“关于我在第四次审问时所做的那些交代，那完全是一个假供，连一个字真的都没有。”主审人立刻发怒地说：“连一个字真都没有！你是不是张东荪介绍给徐冰的？”我说：“这倒是事实。当时民盟几个人在一个地方开会，徐冰走了进去。张东荪把所有的人都介绍给徐冰，并不是单独介绍我一个人。”主审人说：“我不问当时的背景，也不问张东荪当时还介绍了别人没有，反正你是张东荪介绍给徐冰的就行了。这你怎么能说上次的口供一个字真的都没有呢？”接下去问：“张东荪介绍你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徐冰说的？”我说他说我是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主审人说：“你上次口供里不是说张东荪把你的政治身份介绍给徐冰了吗，这你又怎么能说上次口供一个字真的也没有呢？”接着又问：“介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说：“介绍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呗。”“认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说：“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再见面就彼此认识了。”他说：“认识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你这不是交代问题，而是在捣乱！”我连忙改口说：“认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联系。”紧接着问：“联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这样连珠炮似的追问，把我追逼得神经都快爆炸了。我说：“照这样追问法，我实在回答不出来了。”紧接着那位陪审的解放军大声威胁说：“你是需要我再给你升一升级吗？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是一个美国特务。”

主审人随即拿出笔和纸来，命令我按照他刚才提出的问题写出内容来。我写一句，他们改一句，不按照他们那样改，就是“公开抗拒”。最后改出如下的一个材料：

“1946年初，张东荪把我的政治身份介绍给徐冰，说我能代表他，叫我同徐冰联系。从此我就

和徐冰经常联系。有时他找我,有时我找他。徐冰在同我的接触中向我提供了当时国内形势的情报。我把它汇报给张东荪。张东荪再把它汇报给司徒雷登。我、徐冰、司徒雷登和张东荪就这样构成了一条特务线,是特务关系。”

这样一来,我就把我第四次审问时被迫喝进去,第五次审问时又主动吐出来的那个“鸩”,不得不被迫再吞回肚子里去。不同的只是,我在第四次审问时被迫供的是我把徐冰提供的情报直接汇报给司徒雷登,这次改为汇报给张东荪,再由张东荪汇报给司徒雷登,如此而已。

上述材料改写完毕之后,他们命令我再在另一张纸上抄写清楚。抄写清楚之后,命令我加上一个标题,定名为《我同徐冰的特务关系》,然后写上名字,按上手印。他们收了回去,随即结束。

16日上午,第四堂审问一开始,主审人说:“你昨天交代说徐冰向你提供了关于国内形势的情报。这样说法太笼统、太抽象了,你得把具体内容交代出来。”还说:“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想包庇徐冰啊!”无论他说什么,我还是说不出来。主审人见实在逼不出我的交代,便开始点了。等他点完了,最后非常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就是不老实交代,像挤牙膏似的。对你点出一点,你就承认一点。你真是口是心非不老实的人。”

下午,第五堂审问开始,主审人拿出纸和笔交给我,说:“把你今天上午主动交代出来的具体内容写出来。”真奇怪,明明上午结束的时候,他还说我手录下来的这些材料完全是他点的,而下午却改口变成我“主动”交代出来的了。但我也无法分辩,只好照样如法炮制成这样一份材料。

“关于政治方面,徐冰向我提供了在旧政协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和中共方面的态度。关于军事方面,徐冰向我提供了蒋介石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在东北、华北和华东战场上对中共作小规模进攻和中共反击的情况。徐冰还说蒋介石要作大规模进攻的话,中共就采取保存实力而不争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和对个别民主人士的看法。关于军调部方面,徐冰向我提供了中共对国民党和对美国不同的方针,对国民党针锋相对,

对美国则是一方面揭露,一方面留有余地。”

上述材料写成之后,主审人从皮包里把我昨天下午写出的《我同徐冰的特务关系》拿出来,命令我在另外一张纸上把上段内容加在昨天口供的“徐冰在同我接触中向我提供了关于国内形势的情报”的后面,标题仍然是《我同徐冰的特务关系》。最后才让写上名字,按上手印,收了回去。

17日上午,第六堂审问一开始,主审人把我头天下午写的《我同徐冰的特务关系》,和我在第五次审问第六堂上写的《我同司徒雷登的特务关系》拿出来,又拿出纸和笔来交给我,命令我把这两个口供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一的口供在另外纸上写出来。这两个口供如前所述已经是经过四位审问人精雕细刻搞出来的成品了。

这份新口供的第一段是由这几句话开头的:“我是一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美国特务。我同张东荪和徐冰勾结在一起,充当美国特务,向司徒雷登提供了如下的情报……”这样一来徐冰就不仅仅只是搭上了特务线,而他本人早已就是一个美国特务了。最末一段仍然写的是我的爱人接受张东荪一百五十万法币那件事,不过在最后的地方更改了两个字。把我在《我同司徒雷登的特务关系》的口供里,写的“我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了美国特务的钱”,这次他们把“的钱”两个字用铅笔勾掉,改为“经费”两个字。二字之差,我这个“特务”身份于是更职业化了。可是他们有没有想到,当年这一百五十万法币的价值还不抵现在十块人民币的购买力。既然我这个“美国特务”为他们提供了那么多重要的“情报”,而后面却替我编造了这么廉价的“美国特务经费”,我真不知道他们事后总结他们逼供信的成绩时,是不是会发现有点太不相称了呢?

这个新的、总的口供标题定名为《我是司徒雷登的特务》。最后写上名字,按上手印。他们收了回去,第六次审问就此结束。主审人做了如下的结束语:

“这只是你的罪行的一部分。永远也不能说对你审问完结。你在这两次审问中进行了捣乱,企图搞翻案。经过较量之后,你才不得不再低头



认罪。你应当吸取这次的教训。林彪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上指示的非常清楚：敌人再兴风作浪搞翻案怎么办，那就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斗倒就是了。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 第七次审问

1970年7月14日上午、下午，7月15日上午、下午，开始第七次审问。这次审问过了四堂。

这次审问，无论从审问内容上或从审问方式上同以往审问都大不相同。14日上午看守人打开牢门宣布提审的时候，先交给我写在纸上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抗战时期在北平同我联系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但在审问中却一句话也没有涉及到他们。以往审问都是以我的问题为中心，而这次则集中审问罗隆基的问题。

这次四堂审问围绕着三个方面审问了罗隆基的事情：一，关于罗隆基同国民党，特别是同雷震的关系。二，关于罗隆基同美国，特别是同司徒雷登的关系。三，关于罗隆基同中共，特别是同统战部领导人的关系。通过审问人的启发和提示，这样依次审问下来的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战部领导人徐冰包庇纵容了罗隆基这样一个既同国民党又同美国有勾结的坏人。这个结论得出之后，审问随即结束，主审人命令我三天之内写出材料。

1970年7月15日第七次审问结束之后，我又形影相吊地在牢狱里挨过了两年，直到1972年7月12日才对我进行了又一次审问。

## 第八次审问

第八次审问一共拖了将近一个月分四堂审讯才告结束。审问一开始即命令我再写出关于我、徐冰、司徒雷登、张东荪这条特务线的书面材料，两天之内写好交出，审讯即告结束。

回到牢房，经过反复思索和严肃考虑之后，我在14日写出如下的材料：

“经过反复思索和严肃考虑之后，我不得不大着胆子坦白交代：我曾经作出了假供，我招认了我过去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徐冰。至于我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的关系，我在1960年就分别写过材料，此后1967年10月，1968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民盟的造反派让我写过这方面的材料，所有这些材料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的。我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的关系的基本事实就是那么一些内容，没有任何可以补充和应当补充的了。

至于我同徐冰之间的所谓特务关系，那完全是一个假供。徐冰究竟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发生过什么特务关系，我不知道，不能乱说。至于说徐冰如何通过我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发生了什么特务联系，完全没有那么一回事。我在审问过程中把水搅浑，制造了混乱，欺骗了党，欺骗了法庭。我现在端正态度，老实交代出来，我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

这份材料交上去以后，7月17日上午、下午接连两堂审问。审问人大发脾气，把我写出的材料往桌上一扔，生气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坦白交代，自己承认犯了做假供的罪行，一是继续做假供，继续犯罪。我想来想去我只应当走第一条路，而不应当走第二条路。”审问人随即命令我分别把我同徐冰、司徒雷登和张东荪的关系全部系统地再做一次交代。他们提出问题我回答，从上午一直到下午，把我问得筋疲力尽，命令我回到牢房反省，发给我纸和铅笔并写出要点要我再做交代。

28日上午，第三堂提审。我首先把用铅笔写在纸上的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的接触中所有上得了纲上得了线的又重新交代了一遍之后，按照1968年4月4日晚上统战部审问人在审讯我时所使用的逻辑：既然同司徒雷登和张东荪发生过那么多关系，司徒雷登是美国特务头子，张东荪是美国特务，因此我也是一个美国特务。我这样一交代，审问人说我的认识进了一大步。然后叫我交代我同徐冰的特务关系。我说：“我同司徒雷

登和张东荪发生过那么多关系，因此我可以梳出那么一条辫子来。而我同徐冰的关系好像一个和尚秃头，没有一根头发，我实在梳不出任何辫子来。”我这样一说，审问人非常生气地说我是“窥测方向，借机翻案。”他们说：“你完全知道这是你的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一落空，其它一切都无所谓了。徐冰没有向你提供那些情报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今天司徒雷登虽然老早已经死在美国了，但是徐冰还没有死，张东荪虽然老了，也还在活着。他们的口供俱在。我们有人证、物证，还有旁证。你就是一个字不交代，我们一样可以定你的罪。”接下去他又用较温和的口气说：“我们今天审问你的目的是拉你出水，而不是推你下水的。你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来为徐冰翻案了。”他向我宣布上述政策之后，命令我回牢房反省，下午写出书面材料来，其中必须加上同徐冰的特务关系。必须写出徐冰向我提供了什么情报。

我回到牢房之后反复思考，把过去被迫交代过的东西照猫画虎的再写过一遍。交上去后审问人认为文字冗长，不能把本质的东西突出来，命令我回牢房重写。

8月4日上午，第四堂审问开始。两位审问人坐在审问桌前面，桌子上有纸和笔，叫我写材料，还给了我一个水杯可以随意喝水。为了避免多走弯路，他们让我写一段交给他们看一段，然后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我再按他们的修改意见改写。从文字内容到标题，他们不厌其烦地在有的地方改了三、四遍。这样写了一整天，产生出如下的成品：

“我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伙同徐冰、司徒雷登、张东荪做了许多特务罪行。现将主要罪行坦白交代如下：

1938年我同张东荪一道去汉口，阴谋向蒋介石建议割让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同日本媾和。

张东荪同汉奸王克敏早有勾结，而我在1943年却代表他到解放区同当时十八集团军领导人签了所谓‘七七协定’，对党进行欺骗。

1946年初徐冰来到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张东荪把我介绍给徐冰，叫我同他联系。在此期间徐冰向我提供了中共关于和谈和关于军事调处的情报，关于和谈，徐冰说中共和国民党对旧政府决议的态度大有不同。中共愿意彻底执行这些决议而国民党则是蓄意反对它。关于军事调处，徐冰说中共对国民党和美国有所不同，对国民党采取针锋相对，对美国则是一方面揭露一方面留有余地，我把这些报告给张东荪，随后又报告给司徒雷登。

1948年8月间当解放军大举反攻的时候，我伙同张东荪介绍了一个名叫‘彭泽湘’的人给司徒雷登，阴谋搞所谓‘二李（李济深、李宗仁）合作’的和平运动，妄图阻挠解放军的攻势。

1947到1948年的六个月期间，张东荪每月给一百五十万法币供应我在北平的家庭生活。

1949年7、8月间，张东荪和罗隆基两个人在北平秘密地曾同行将回国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见过面。1951年初张东荪同司徒雷登的干儿子傅泾波到北平，和准备接傅泾波老婆去美国的一个姓陶的人见过面。我对他们这两件里通外国的勾当虽然知道，却替他们隐瞒着未予揭发。

司徒雷登对民盟的态度始终是非常注意的。19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压力之下，民盟拟好了一个解散民盟总部，民盟盟员停止活动的公告稿子。为了让司徒雷登及时了解情况，我把这个还未经民盟讨论通过的公告事前抄了一份给司徒雷登。

民盟总部宣布解散之后，在香港成立了临时总部，当时的领导人是沈钧儒和章伯钧。为了摸清民盟领导人的底，司徒雷登曾问过我沈钧儒和章伯钧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据我所知如实地告诉了他，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情报。

1949年3月间我由上海到南京去见司徒雷登，告诉他我将要返回当时已经解放了的北平。他对我诬蔑说，共产党是没有祖国观念的，他们的祖国是苏联。不要忘记我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对他说，‘我不会盲从苏联

的。我将为是你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就是这样以司徒雷登代理人的身份而混进了人民队伍。

我前后充当司徒雷登和张东荪的代理人，做了如上所述那么多危害人民利益的勾当。司徒雷登是美国特务头子，张东荪是美国特务。我在人民面前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特务罪犯。我低头认罪，争取脱胎换骨的改造，重新做人。”

上述材料写好之后，命令我在上面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对我在历史上所犯的特务罪行的反省》。写上名字，按上手印，他们收了回去。

## 宣布释放

8月16日上午，看守人又打开牢门押送我到审问室。审问桌后坐的除了那两位解放军外，还有民盟的黄景钧。一位解放军以立正的姿势郑重地向我宣布：“叶笃义，你在历史上犯有特务罪行。按革命群众的要求，于1968年4月间将你逮捕。在此期间，通过党的教育和你自己的学习，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表示悔改。根据党的给出路政策将你释放回原单位。”

宣读完了以后，转过身来问黄景钧有什么说的，黄摇头表示没有。最后由这两个解放军和黄景钧坐汽车把我押送到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交给当时军代表孙组长。我的女儿也在那里等候着我，她带了新的衣服给我略为打扮了一下，就送我回家了。

从1968年4月4日开始在民盟接受三个礼拜的拘留看管，4月26日被解放军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坐了四年三个月零二十天的牢，就这样戏剧性地被突然释放，获得了人身自由。

我一回到家，上述“秦城监狱坐牢经过追记”的腹稿就已形成了。这个腹稿是我在这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中将审问的经过以及生活琐事桩桩件件牢记在心，日积月累而形成的。虽然我的手表在进监狱的当天就被摘掉，但我推算日期却能丝毫不差。无论哪一天发生过什么事，我都能镂

刻于心，牢记不忘。

一回到家，我的兄弟们就去看我，我把我的案情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们力戒我无论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及此事。我说我想把我的腹稿写出来，我的儿女们说，“你想演‘二进宫’吗？”可是我完全有信心，相信我的冤案迟早会得到彻底平反，还我以清白的名声。但是如果我不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日久天长，腹稿会一天一天地忘掉，将来一旦平反，我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会死不瞑目的。我于是将这个腹稿逐字逐句在心里默念，每天最少默念一次。这样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才把这个腹稿写成文字。

1977年1月，我通过民盟李文宜同志转给中央统战部写信要求平反。以后在1977年及1978两年之间，又先后给乌兰夫统战部长、叶剑英副主席、胡耀邦组织部长、齐燕铭政协秘书长以及李贵统战部副部长上书申诉平反。

1978年底我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了。1979年元月我把“文化大革命中秦城监狱坐牢经过追记”写好，交由民盟王健同志转给统战部郭彤同志。1984年9月8日中央统战部写给民盟中央办公厅关于我在“文革”中的审查结论，全文如下：

你厅8月13日来函，要求将叶笃义同志在‘文革’的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

1968年4月至1972年8月对叶笃义同志的拘留审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是他们迫害徐冰同志而株连于叶笃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党对叶笃义同志是了解的，并认为，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与我党长期合作，经受了考验的老同志，对于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否定，特复。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

(本文摘自作者《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全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摘编者方隍)

# 我被逼诬陷 徐冰是美特

◎ 叶笃庄

徐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人耿直坦率，待人诚恳，“文化大革命”中被捕，1972年3月，受迫害致死。其妻张晓梅也是一位女中英豪，曾任北京市妇联主任，“文革”受到株连，也死于非命。

## （一）

1939年山西“晋西事变”，我被迫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开始和徐冰相识，但来往不多。1946年徐冰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来北平，任该团政治顾问，代表团负责人是叶剑英。这时我和徐冰的来往才逐渐密切起来。听从他的嘱咐，我为党做了一些事。例如1946年夏，解放后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冯文彬，拿着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龚澎的介绍信由上海秘密来北平，首先找到我，叫我给他安排住处，并和徐冰联系。此后他和徐冰见面，都是通过我来约会；徐冰要见他，也是通过我，见面的地点都在我家（东单洋溢胡同）。又如1946年春，当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秘书的吴炎（现名吴景略）从解放区来，找民盟派一代表去刚成立的“民主建国军”——高树勋的起义部队联系，并说可以捐给民盟一笔钱。当时民盟派我去，于是我找到徐冰，问他可以不

可以去。他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告诉我应该注意时时和那里的党组织联系。还说，你走之前，我会用电报通知那里的。他还叫我在高部谈完后，去邯郸找中共负责人汇报。由高树勋部陪我去邯郸的是党派到高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张力之。到邯郸后邓小平同志亲自去招待所看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晚间邓和刘伯承二人亲自设宴招待。诸如此类我和徐冰的来往，不胜枚举。

当然我和徐冰也有吃吃喝喝的来往，但为数不多。他喜欢喝酒，而且能喝，我当时也喜欢喝酒，但喝不过他。我记的有一次在东四“大酒缸”，他足足喝了半斤多老白干酒。

我们的公私交情，还比较密切。他比我年长，地位也高，但我和他交往，并没有感到有半点不自然。可是解放以后，他做高官，我依然是一介书生。解放前，我有不少这样在解放后身居高位的朋友，但是我没有主动找过其中任何一个人，对徐冰亦复如此。所以当让我交待“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时，我一下子就懵了！

## （二）

1957年9月30日，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被打成“右派”，1958年9月我又被诬陷为“美国特

务”被捕入狱,判刑10年。前后在狱中和劳改农场18年!1978年彻底平反,还我历史本来面目,定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红军待遇。

1966年冬天,我正在安徽第一劳改总队服刑(对外称“白湖”农场),这时从北京来了二个人找我“外调”徐冰的情况。听口音,其中一个东北人,一个是南方人。“文化大革命”后,向我“外调”的次数日渐增多,一般说来,外调人员还算客气,最厉害的不过拍拍桌子,说声“不老实”而已。可是这次“外调”徐冰材料的二位,就不客气了。一开始就叫我站在那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猛拍一下桌子,怒吼“把头低下!”然后厉声叫我交待“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没有反革命的关系!”

这时老一套来了,向我交待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呀,“老实交代不会给你加刑呀”等等,这些话,我不知听过多少遍,耳朵都起茧了。他们看我不为所动,坚持不承认和徐冰有什么反革命的关系。于是那个东北人从身上掏出一个硬皮的小笔记本说:“徐冰都交待啦,他已经完啦,你还给他打什么掩护!我给你念一点他交待的材料吧!”然后打开小本念,徐冰说:“在北平时,我和叶笃庄来往密切!”跟着问:“是吗?”我回答:“也可以这样说吧。”他又把那个小本翻开说,徐冰交待:“在叶笃庄结婚前,我常去他家谈事;他结婚后有所不便,我们经常在小饭馆碰头”。我一听,立刻就意识到他们是在诱供,引我上钩。其目的就在于把徐冰拉上美国人的关系,因为我结婚前和我在景山东大街一所四合院内同住的是一位美国作家裴克(Graham Peck),那时徐冰只来过景山东大街我的住处一次,还是应酬。徐冰刚到北平时,我和我的三哥叶笃义联名请他在我家吃夜饭,他们来了三个人,除徐冰外,还有几位民盟的人士作陪,如张东荪、许宝骙等。而且事前我就通知裴克,那一天晚上我要用这个房子请客,叫他回避一下,所以裴克不在。除这次之外,徐冰从来没有到景山东大街我的住

处来过,更没有在那里和裴克见过面。我结婚前他如果找我有事,就叫人送个信来,让我去后门慈慧殿他哥哥的住处见面。慈慧殿和我住的景山东大街很近,不过那时他常住北京饭店,有时我也到那里找过他,但次数极少,因为那里满布特务。结婚后,我由景山东大街搬到东单洋溢胡同,那时徐冰倒常常来我家,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你这里成了我办公处啦”。这时,我已看穿了那两个“外调”来人的把戏,便说:“徐冰正好把事情弄颠倒了,大概老头子被斗昏了!”这句话引起了他们大怒,一齐站起来要向我动手,并高喊,“谁叫你胡编啦!”幸好有一位农场管理员坐在那里陪着他们,给拦住了,因为劳改队里不许打人。

接着那个东北人又问我:“徐冰给别人写证明材料都不留底,为什么给你写证明材料他留底呢?”我说:“这个问题,我可无法答复,这是徐冰的事呀!”“1946年你去解放区,徐冰事先打去了电报,你知道吗?”我说:“那次去解放区前,我问过徐冰是否可以去,他作了肯定的答复,还告诉我,他会打电报通知解放区的。但我没有看到过这份电报”。就这样诱、骗、吓都没有成功,我仍然坚持我们没有任何反革命关系。在白湖劳改农场纠缠了三天之后,他们叫我具结,我说:“这好办,”便干净利索地在一张纸上写下:“我所说的和徐冰的关系,完全属实,倘有不实之处,甘受极刑,此具。”签上名,打上手印后,那个东北人冷笑着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在这里不说,有地方有办法叫你说!”说完猛地把老羊皮军大衣往身上一披,吼道:“你等着瞧吧!”

### (三)

1967年春,我在白湖农场挑土筑坝。有一天在工地吃完午饭后,干了一上午活疲劳已极躺在地上休息,沐浴着春风,晒着太阳,真比睡在沙发床上还要美。

#### (四)

我正在半睡半醒的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在那样宁静的美妙环境中，其声真如“一声传，如狼嚎”。那个人走到我跟前说，“你叫叶笃庄吗？起来！赶快去大队部，有要紧的事！”我想大概又有人来外调了。来到大队部后，那个人走在前面，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叶笃庄带到了！”只听到屋内的人回答：“进来！”我跟着那个人进屋之后，大队干部问我：“你叫叶笃庄吗？”然后指着两个穿警察服装的干部说：“他们带你去北京，路上老实点！”

这时我心里高兴极啦，心想搞了一段“文化大革命”，我的问题终于搞清楚了，“便下襄阳向洛阳”喽！说老实话，我在关于我的这个问题上，一直存有幻想，总以为抓我不会判我，吓唬吓唬，关几天就算了；判了之后，又以为关不了多久就会放的。因为我的思想上决没有想到共产党会真的把我当作敌人治；即使我有错误，对我总会有“姑念”之情吧。

这两个警察很客气，上了停在大队部门口的吉普车后，一直开往中队部取我的行李。他们说：“不要带被子啦，越简单越好。把你的自来水笔带着，到那里是要写材料的”。但我还是把我的那件“滩羊”皮大衣带上了。这时我更觉得要放我啦，满心欢喜。不料从中队部出来上吉普车时，一个警察突然从身上掏出一付手铐，客气地对我说：“这是规矩。”这是我1958年被捕以后第一次带手铐，于是我恍然大悟，这是把我押到北京去再次受审。

天亮时，到达北京。走出车站后，寻觅公安部派来接我们的汽车，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决定坐三轮走。那时北京的三轮都是单座的，他们和三轮车夫商量，能不能坐两个人？那位车夫坚决地回答说：“不行！”他突然看到我手上的铐子，大声说：“‘差事’啊！上车！”于是我坐在一个警察的身上，由三轮车拉我们到公安部。北京人过去把押解犯人的事，叫作“差事”或“差使”，杀犯人叫作“出红差”。

到了公安部大门，那两个押送我的人叫我蹲在大门口的东墙下，手上还戴着铐子。奇怪的是，门口站岗的卫兵不拿枪，而是右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端端正正地捧在胸前。当时我心里想：“有了‘红宝书’，能刀枪不入吗？这岂不是义和团的变种吗？”我戴着铐子蹲在那里，倒没有引起过往行人围观，他们都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我琢磨，是不是当时在北京带铐的人多了，因而大家就不奇怪了。那两个押解我的警察从公安部大门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位军人，我被交给他们。于是我跟着那两位军人坐上汽车，出北京，当我在公路上看到“秦城”的路标后，才知道是去秦城监狱。

北京附近的监狱和看守所差不多我都住过了，诸如：“草岚子”、“功德林”、“自新路”、“良乡”、“延庆”等等，唯独没有去过“秦城监狱”。我在良乡监狱，有一位新疆的哈萨克人倪华德和我挨着睡。他告诉我，他住过“秦城”，“那里的伙食可好啦！管饱，每星期还吃两三次包子或饺子呢。还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借书。”于是我想起他的话，这下子可好啦，管饱！在监狱或看守所，最难熬的是，饿！

进了“秦城监狱”大门后，被领到一间小屋登记，然后交待监规，换上黑色囚服，不准用裤带，防止犯人自杀，等等。最后，给我一个号码，好像是67××，已记不清了，从此，我就没有姓名了，我的名字就是那个号吗。

把我领进监房之后，看到狱室内还有三个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约六十岁，他的铺位紧靠里边挨着墙；其次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儿，看样子也就是五十岁上下；还有一个挨着我的铺位的，约四十岁左右。等我安定下来之后，我轻声问他们：“听说这里伙食管饱，吃白面馍，还给牛奶喝，是真的吗？”挨着我的铺位的那个人说：“哪里有那样美事，要是那样，大家都来坐牢



了！”紧接着又补上一句，“每顿饭黄金塔，两个！”北京人俗称窝头为黄金塔。紧靠里面那位老者说：“以前确是那样，过春节时还给过四菜一汤，有一盘海参呢！”“文化大革命”前的伙食，大概是那样好的。

我进这个监号不久几天，管理员叫那个紧靠墙的老者“收拾行李”，这就是转移监号的意思。前一两天就听到楼上有来回来去的脚步声，老者说：“战犯们转移了”。他走后，另外两个人向我说：“那个老头儿不简单，抗战时担任过傅作义的游击司令，解放后是青海省政府委员。”他自己说过，自从进秦城后，没有审问过，没有判过刑，硬是在那里面呆了一二十年。

那四个人的监号据说原本不是关押犯人的，而是犯人医院的一间房子，因为“客满”，暂时把我们押在那里。那个老头儿走后不久，我们被移到正式监号。那间房子有二十多平米，放三个单人床，富富裕裕的；室内有卫生设备。后来我又般进了十平米左右的单人监号，靠门口左角围出一小块地方，其中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固定的陶瓷洗脸盆。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距地面两米多高，从窗户里绝对看不到外边。牢门为双层，外面为铁门，里面是一层木门。门的上方有一个供监视用的窥孔，一天24小时不断有卫兵对监号里的犯人监视。门的下方为一个四方活动小门，用以把水和饭从这个小门递进去。监号里有一张距地面一尺高的木板矮床。被褥极薄，不给枕头，我只好把发给擦屁股用的草纸节省着用，积存起来当枕头。我搬到单人监号以前，在白天还可以坐在褥子上，后来就不准坐了，只许坐在光板上，管理员明确告诉我，“这是为了触及灵魂”！犯人每天早上七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就寝。睡觉时脸部必须对着窥孔，双手不准放在被子里，否则就会听到卫兵用脚踢门，把犯人叫醒，有时还要遭到训斥。

秦城监狱和我住过的其他监狱或看守所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



1977年在安徽怀远荆山湖渔场任二级渔工时的叶笃庄

围起来的无顶放风圈，每个放风圈很小，估计不会超过10平方米。朝向门的一边有一道高墙，卫兵在这道高墙上来回巡视，可以一览无遗地观察每个犯人在放风圈内的活动。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放入放风圈内。两个圈内的犯人由于高墙阻隔，谁也看不到谁。我住集体监号时没有放过一次风，住单人监号时放过几次风，次数也不多，大约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放一次风，放风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秦城监狱的伙食，在1967—68年我囚在那里的阶段，和普通监狱差不多，不管饱。不过不够吃时，可以向管理员要，回答总是“等着！”无论你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回答总是“等着”。过一回儿，有时也许给一个窝头，有时也许给点窝头碎渣，有时则空等一场。

## (五)

我被押解到秦城当天，午饭已过，只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从合肥到北京折腾了一天一夜，已疲惫不堪，睡眠的哨声一响，我纳头便睡。正在睡得香甜的半夜，管理员打开牢门，喊道，“××××号，提审！”我便由管理员带着去审讯室，我在前，他在后。到审讯室后，没有给我座位，我站着回答问题。在我的对面，有拼起来的二三张长桌，桌上铺着白布。坐在桌前的四个人，一个穿军装的，一个穿便服的五十岁左右，有点寿星头那样的秃前额，东北口音，最外两边坐着一个女纪录员和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个东北人，均穿便服。他们的后面站满了解放军，记得有三层，总有30—40人，这些人倒没有喊口号或打人等。问话的只有坐在中间的那个东北人，那位军人偶尔插几句交待政策的话，态度还和缓，没有拍桌子。

中间的那个东北人，先问姓名，然后接着问：“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押到北京来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这次叫你来，是要你交待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交待，不会给你加刑。说吧，你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

我说：“我在白湖农场已经说过，我和徐冰没有任何反革命关系，而且具了生死结，如果有任何反革命关系，我甘愿受极刑！”

他说：“你不要再顽固下去了，这样顽固下去，对你没好处。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在军调部时期，我和徐冰在北平确实来往密切，但绝没有任何反革命关系。”当时我心里想，我和徐冰只有“革命”关系，但不敢说出口；如果这样说，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接着我说：“如果我和徐冰有反革命关系，他在台上时，能不提拔我吗？解放后，我一次也没有找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他当他的高官，我坐

我的冷板凳。我被捕时，他正在台上，他并没有保我，如果当时他说一句话，我的事情也不至如此。另外，从常理看，他的政治地位、年龄、阅历都比我高的多，我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使他搞反革命，恐怕也不会找到我；我要是搞反革命，更不敢找他。”说到这里，主审人就把我拦住了：

“住嘴！不要狡辩！回去好好想想！”

头场官司问得好，没有给我体罚。站在后面的解放军，好像是观众，没有一个吭声的。主审人的态度比较起来，还算客气。他说的话主要是交待政策，关于我和徐冰究竟有什么“反革命”关系，并没有给我“点出来”。其实在白湖农场的那次外调中，我已经猜出来，他们要给徐冰拉上“美国特务”关系，因为我已被打成“美特”，再由这个“美特”咬他一口，岂不顺水推舟。

又过了一两天，第二次提审。这次审讯室的墙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呀；“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呀，等等。审讯台的后面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一进门，首先要向毛主席像鞠躬，同时低着头高声说“向毛主席请罪”。然后读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直到听见一声“坐下”，我才坐在距审讯台不远处那个专供犯人坐的凳子上。

这次审讯台上只坐着三个人，其中的一个四十多岁，东北口音，是主审人，从来没有露过面。一边坐着那个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个南方人，穿便服。另一边坐着一个穿便服的妇女，是纪录员。第一次审讯好像仅是一次交待政策并显示威严的过场，从那次以后，那个主审人就一直没有露面。逼供的就是现在那个三人班子。这次审讯一开始，就听到主审人的吼叫：“低头！”我没有听到“坐下”的命令，只得站在那里低头。室内异常寂静，又过好几分钟，才听到主审人蛮横的开门见山说：“你要好好交待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你不交待，我‘点’给你吧，就是你们和美国人的关系！”所谓“点”，是个术语，意思就是给你起个头，

叫你顺竿爬,这是逼供和诱供的开始。

“我绝对不知道徐冰和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好!那么先交待你和美国特务的关系吧!”

“我熟悉的美国人有两个,一个叫 Graham Peck(裴克),二次大战时是美国新闻处的职员,1943年在重庆经过孟用潜(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社长)的介绍才认识的。当时裴克还没有参加美新处,正在赋闲,是一位作家和画家。他写过两本关于中国的书:30年代出版的那本,叫作《Through the Great Wall(穿越长城)》;第二本为《Two Kinds of Time》(《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爱泼斯坦作序说,这本书是揭穿二战时国民党黑幕的“经典著作”)。1946年1月至9月,我和裴克在北平景山东大街合租一个四合院同住,我曾给他提供一些材料作为他写的书的内容。另一个美国人叫 James Burke(布雅各),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后来是美国《生活》(Life)画报的记者。裴克有一些中共方面的朋友,如龚澎、乔冠华都到过我和裴克的住所作客。布雅各也有中共方面的朋友,如田价人

(解放后改名赵范,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唯独我没有看到、一次也没有看到徐冰和他们有什么来往。”

“你知道这两个美国人是美特吗?”

“我不知道!和他们认识的中共方面的朋友那时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招呼,说他们是美特。”

“徐冰给过你什么材料,叫你转给他们吗?”

“没有!绝对没有!”

“那么,徐冰通过你给过布雅各什么材料?这份材料就在我们手里。你要老实交代,不但不给你加刑,只要你表现得好,还可能把你押回北平服刑,这样你就可以和你的孩子见面了。难道你不想她们吗?”

“我是想和我的孩子们见面,非常想,但我不能因此胡编!”

这场审问,是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独自问话,非常凶,拍桌子、打板凳、骂人、侮辱人格贯穿了整个审问进程。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没有走下审讯台打我。可是那个南方人却是“全武行”,什么按我的头坐喷气式呀,什么用脚踢我的腿呀,当我说“我不能胡编时”,他立即走下台



叶笃庄  
(右三)80年代初,在甘肃定西地区黄土高原连续四年考察。著有《黄土高原种草种树与控制人口的问题》

来，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声吼叫：“谁叫你‘胡编’！”有一次90°弯腰站在那里，时间长了，我挺不住啦，倒在地上，那个南方人，先揪我的耳朵，然后用脚踢我，吼道：“你不老实，还有厉害的在后头呢！”

等我起来站好之后，坐在中间的那个东北人严厉而凶狠地吼道：“再不老实，就给你戴上‘背铐’”。所谓“背铐”，就是把双手弄到背后铐上，吃饭时由犯人组长把窝头和菜汤放在坑沿上，带背铐的犯人跪在地上去吃。

最后，坐在中间的那个东北人又发言了：

“下去你好好想想吧！老实交待，我保证不会给你加刑；不老实交待，那就走着瞧吧，反正证据在我们手里，不怕你不交待。滚！”我回到监房内，好不懊丧。我想，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像我这个“美特”，恐怕早就做了枪下的屈死鬼了，这倒也干脆痛快。现在是慢功，一点一点地折磨，一直至死。对敌人这样处理，确是合乎辩证法的高招，但对自己的人也使用这一套，就未免敌我不分，干了敌人无法办的事，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又一次提审，又一次诱供、逼供，……每次都和第二次审讯时大同小异。每次审问完之后，我回到监号内，就十分懊丧、十分痛苦。我想，当初如果我走去美国读书深造那条路，何至于沦落至此，“屈身稽颡，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乎？当时我已经很清楚，这是共产党自己整自己，现在又把我这个非党员拉上陪绑，天理何在？这一念之差，使我犯下了终身难忘的“落井下石”之罪。

再一次提审时，审讯员又厉声吼道：“你和徐冰一齐干的反革命勾当，想好了没有？”

无论肉体上和精神上，我受尽了折磨，更怕他们真的给我戴上背铐。破罐破摔吧，便脱口而出：“我和徐冰是一伙！”

“那么，你们的领导是谁呢”

“是美国特务裴克”！

“这就对了，老实交待，不会给你加刑的！”紧接着又用和缓的口气对我说：“你回去写一个材料吧！”

我回到监号之后，管理员给我送来几页纸，一支蘸墨水的钢笔，还有大半瓶墨水。我只承认，“我和徐冰是一伙，我们的领导是裴克”，其中并没有写具体事实。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之后不久，就把我转移到单身监号去了。从此一连好几个月没有提审，我想大概可以“过关”了吧！

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哗啦啦铁门响了，喊一声“提审！”我按照管理员的指示，走进一间好像是会议室的地方，室内中央放着几个拼在一起的长桌，盖着白布。审讯人员就是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两个人，一个东北人，一个南方人。我和他们隔桌对坐。这次主要是那个南方人主审，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写的那份材料不行，里面没有‘干货’，叫你再写，也不会写出什么来了。这样吧，给你一张纸，照着我念的写！”于是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写好的单页纸，照着纸上写好的词句，一字一句地慢慢地念，等我写好，叫我重念一遍，他再接着念下面的。如此他念一句，我写一句，念到徐冰曾叫我把新四军五师在中原军区突围的材料交给美国特务裴克时，我拒绝写下去。

这件事确实有，来源是当时《观察》杂志上刊登的“军事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其内容足以证明是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而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是共产党破坏和平，打国民党。这篇东西是我主动给布雅各的，并非给裴克的。那时地下党员田价人有时也叫我通过布雅各发出一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消息，例如1947年秋北平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破获后，余心清（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长）被捕，田价人找我告诉布雅各，余心清被捕是由于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余心清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和共产党没有关系。等等。

当我拒绝把这件事拉到徐冰身上时,那个南方人又来“全武行”了。我想,既然把这样的供词已经写在一张纸上,而是由他念一句,我写一句,所以这决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集体创作”。给徐冰戴上什么帽子,他们早已捏构好了,以后的工作就是玩弄胡适的那套把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胡适求的还是真证,这批审讯人员搞的却是制造伪证。

事已至此,我只好照着他念的写了!如上所述,我是把这个材料给布雅各的,他们却说给裴克的。这时真的我“狡猾”了,顺着他们的竿爬,把布雅各写成裴克,以便将来有机会作为翻案的证据。我对此作了相应的说明。但是,审讯的人绝不容许你解释,只要你一解释,他们就制止说:“狡辩!谁听你这一套!”我写完之后,泪如雨下,然后交给那个南方人,突然我听到那个南方人发出一声尖锐的吼叫:“滚回去!”

## (六)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又来提审,这次是一个穿军装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很爽快地说,“你还得写一份材料,我念,你写!”于是拿出一张纸来,叫我按着他念的写,其内容是:过去因为怕加刑,所以没有老实交待和徐冰的反革命的关系。现在我交待的全是事实,决不翻案,等等。这就在我的伪证上再牢牢地钉上一根大铁钉子!此后不久,1968年9—10月间,又把我押回安徽白湖农场劳改去了。

我写完这两份口述笔录的伪证之后,默默地问自己:“这两个人是共产党吗?”

“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凶的时候,我正在安徽白湖农场(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劳改。在劳改农场里,虽然劳动强度大,吃不饱,但那里好似一个避风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整人的残酷方法,还很少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



1997年叶笃庄在寓所,手持他译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达尔文著)

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时我才知道刘少奇、彭德怀等开国大功臣是怎样被折磨死的。徐冰恐怕也不例外,究竟给他戴的什么帽子,定的什么罪,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根据逼我给徐冰作伪证这件事看来,“美特”这顶帽子,恐怕他是无法逃脱的,而我被逼写的伪证,对诬陷徐冰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来,每思及此,我就感到自悔、自咎、自责,而无地自容。即使在被逼之下,实际上我还是做了帮凶。为了保护自己而诬陷朋友,这是人类最不齿的卑鄙行为,如此,有何面目复见故人于九泉之下,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责任编辑 方徨)

#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的前前后后

● 刘世雄

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十年动乱”中我本人的一段经历，那就是1968年，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之命，担任了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并由后来那位“你办事我放心”的领导同志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其过程颇具传奇色彩。

## 王洪文强行调千人 周总理当面断“官司”

我担任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司前身）军管会主任职务后，参与主持六机部工作达六年之久。

1969年，一份电报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是六机部驻上海市直属工厂——江南造船厂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上海市革委（当时张春桥任主任，王洪文任副主任）以“工交组”名义，指令该厂

挑选1000名技术工人，调到上海新组建的迫击炮车厂去，电报还说，王洪文已打电话给该厂“造反派”组织，令他们务必给予支援，完成调千名工人任务。该厂感到十分为难而请示如何处理。

看完这份电报后，我很不平静，心想：江南造船厂是六机部直属工厂，与上海市革委从来没有过隶属关系，也从来有过人事关系，他们怎么能擅自向该厂发出这样的命令呢？而且事先也不跟六机部协商，这种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是不能同意的。但是考虑到当时上海市革委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一月革命”以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国内正处于红得发紫的地位，这是他领导的“工交组”下达的指令和电话命令，这件事情应谨慎处理，不能直接抵制。

我连夜召开了军管会的扩大会议进行研究。会议从傍晚开到凌晨，大家一遍遍地将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讨论十分认真。我根据多数同志的发言意见，做了三条决定：第一，立即以军管会的名义将这一事件上报国务院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周总理，副组长是李先念副总理，成员有华国锋等几位同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栗裕同志），抄报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李作鹏，副组长是周希汉同



志)。这些上报手续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也是符合程序的。其主要内容是上海市革委在没有和六机部协商的情况下，下令调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千名技术工人去组建新厂，而六机部肩负着生产军、地两用船只的繁重任务，实在难以照办，请求领导干预。能免最好，不能免则请求减缓；第二，由我和边疆副部长立即赴上海，与王洪文直接协商，争取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第三，起草答复江南造船厂的电报，要他们等待上级批示后再行动。这些手续均于当天办完。

翌日，我们即飞赴上海。上海市革委马天水副主任接见了我们，他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一见面即不由分说地表态说：“上海市给江南造船厂发的调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上海市革委打破旧的领导体制，冲击‘条条专政’的一步棋。洪文同志指示我，向你们说明，调令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调的人一个也不能减少，希望你们给予支持。”

马天水态度强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我非常反感，马上发言说：“马天水同志，我对你刚才的话感到惊讶。你作为上海市一位老的领导干部，奉命接待国务院两位部级领导同志，没有听客人说明来意，就下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你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请问马天水同志，你们上海市与江南造船厂过去有过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吗？怎么能直接给我们的船厂下命令呢？”见马天水只是冷笑而不回答，我又接着说：“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都是老党员了，应该懂得这些起码的组织工作原则。这是个简单的常识，与打破旧体制和‘条条专政’没有任何关系。何况你们的调令，一经下达即丝毫不能更改，也和我们党的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相背离。请你转告王洪文同志，他这种作法和他口口声声‘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言论太不符合了！”谈话一时陷入僵局。

此时边疆副部长插话了，他说：“上海市组建新厂，六机部给予支援本无可非议，但是调人的

手续是不完备的。为尊重你们，我们才来两个领导与你们当面协商。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做些让步，由六机部从驻上海的‘求新’‘江南’‘沪东’三个工厂各调 200 名工人支援上海行不行？”

“不行！绝对不行！”马天水有些恼怒地大声回答。就这样，这场会面不欢而散。

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边疆同志人还未回北京，上海市革委的一封电报已发到了国务院，抄报了六机部，内容有三条：第一，原调令收回；第二，取消上海市与江南造船厂的科研协作关系；第三，凡驻上海市六机部下属工厂的一切关系，包括供应关系均由六机部直接负责。这简直是一份最后通牒！当我和边疆副部长向李先念副总理等几位领导汇报上海之行的结局时，先念副总理说：“看来这个问题势必要请总理出面解决了。”他还对我们说：“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你们要顾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大局，姿态要高，不要针锋相对。”

我和边疆同志回到部机关，连夜准备材料，迎接这场“风暴”。军管会起草了向周总理陈述意见的《我们和上海市发生争论的由来》的报告。

一天，我的“红机子”铃声响了，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位秘书通知我，周总理决定接见上海市和六机部的三人小组，并说上海三人组由王洪文、马天水、黄涛组成，六机部由我、边疆和郑明同志组成。

没几天，大概是这年的“五·一”前后的一个凌晨，我们接到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的通知。当我们赶到大会堂北京厅时，正看见姚文元在和总理说着什么，他见我们进去后就起身退出。当时我想，姚文元恐怕也介入此事了。周总理让我们和上海三人组分头坐在他左、右前方的沙发上，我们和王洪文等人仅互相关头示意，谁也没有像过去开会碰面时一样起立寒暄。

周总理开始讲话了，他说：“最近国际国内有些事情要处理，很忙，所以没有及早地关心你们之间的争论，使事情变成僵局。作为国务院总理，

我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周总理转向我微笑着说：“刘世雄同志，这件事情我首先要批评你，你身为国务院一个部的一把手，应该宽容大度嘛，可以平心静气地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进行协商嘛。如果一下子调不出那么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尽力支援上海组建新厂。世雄同志，你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呀？”我立即起身回答说：“我姿态不高，我检讨”。周总理接着说：“中央部和地方市发生分歧时，应该以大局为重，高姿态一些，不要针锋相对，更不能得理不让人哪！”周总理又转向边疆同志说：“边疆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了，你是六机部的老同志了，年龄也比世雄同志大，应该协助他处理好和上海发生的分歧，不要火上浇油嘛，总之这次你也有责任就是了。”

说到这里，周总理又微笑着转向王洪文说：“洪文同志，你们的那个电报怎能那样提法呢？怎能和国务院的一个部断绝关系呢？这份电报你可能没有过问，那种提法是错误的嘛。”王洪文此时很尴尬，他起身说：“我接受总理的批评。”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双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办错了事要勇于承认，勇于改正，不要坚持错误，也不要得理不让人。”总理又一次用了“得理不让人”这个词，我感到周总理认为“理”是在我们这一方，故而与边疆同志会心地对视了一下。

总理接着用征询意见的语气对我们双方说：“我看这件事情这么解决行不行？六机部从驻上海的几个大厂抽调500名技术工人支援上海建新厂，你们有意见没有？”我和边疆同志相视一笑：这完全是当初我们和马天水谈的“减缓方案”，我们马上起身回答：“没有意见。”王洪文、马天水出于无奈，也只得回答同意。一贯办事慎密的周总理，这时又拿出了六机部几个造船厂的当年生产计划，一条船一条船地和马天水落实上海市的协作任务，直到马天水明确表示，一定按原计划与六机部友好协作之后，周总理才结束了这次召见。我为敬爱的周总理的斗争策略所深深折服。

一九六二年时的刘世雄



回到部机关，我们立即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总理接见时的指示。当我宣读总理的调人决定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深深地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心情——长期与王洪文之流打交道始终受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了平衡。

## 欲翻案，报主席“同意”再复议 想当然，“接班人”否定原结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林彪的军内代理人黄、吴、李、邱相继被隔离审查，1972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初，张春桥等人认为“报仇”的时机已到，要“抓林彪死党李作鹏在造船工业部的黑手”，写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请求对六机部与上海的分歧进行复议。据说毛主席批示“同意”，决定政治局领导接见六机部批林整风会议代表，并参加六机部整风。于是部机关四十多位处以上干部住进了京西宾馆，并在人大大会堂受到了政治局几位领导的接见。接见中我和边疆同志被点了名，同时宣布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六机部整风，力求彻底解决当年和上海“打官司”的思想问题。

接见结束后，我和边疆同志接到通知：新成立的整风领导小组我和边疆不再担任职务，集中精力检讨自己的错误。

会议采取集中封闭管理，我们不准给家里打电话或写信，等于被“软禁”了。经过几天的学习文件，大会发言开始了。不出我所料，果然发言内容全是批判我和边疆同志，对当年我们“打官司”的事情上纲上线。但发言中揭发的“问题”，几乎全是鸡毛蒜皮，不疼不痒的事。

会议组织者见大家发言不得要领，便体会再次组织动员。等复会后，便开始对我和边疆同志进行“大批判”了。他们说我是林彪死党李作鹏派到六机部的黑手，来六机部是为了破坏造船工业。有人还揭发我说，我在上海搜集了张春桥的材料，散布对上海市领导的不满等等。起初我不予理会，静观事态发展，但当我看到那位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有意地用插话、微笑等引导会议向“路线斗争”的方向发展时，我不能沉默了，开始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我说我是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来军管的，不是林彪和李作鹏的派遣；我来六机部主要是使六机部的“文化大革命”有序地进行。众人有目共睹：六机部两派群众大联合在国务院机关部委中是最早的，部领导被“解放”并结合进入领导班子也是最早、最多的，军管会制止了“武斗”和围攻中南海，用“抓革命促生产”坚持造船工业不停顿，根本不是破坏造船工业，而是振兴造船工业等等。对于我无法辩驳的发言，没有人可以继续批判，只得再次体会，将我和边疆同志分开来进行小组批判。

几天后，大会再次复会时，边疆同志做了违心的“检讨”，不久就“过关”了。但不管是大会还是小组“批判、帮助”，我都坚持不检讨。为了攻我这个“顽固堡垒”，大会从京西宾馆搬到前门饭店，从前门饭店又搬回京西宾馆，一开就是几十天，“批判”，“帮助”，大会，小会，轮番轰炸。终于那位领导同志不耐烦了，他在大会上说：“刘世雄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

一个敢于干扰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人，你竟然公开攻击上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这是九大以后，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反党集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又说：“你现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检举揭发林彪死党，这还能保留住你的党籍；一条是你继续顽抗，坚持错误立场，那就会把自己抛向无底的深渊。”他是政治局领导成员，他的话不是一言九鼎，也是很有份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思想压力很大，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寝。

一天深夜，我的房门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是边疆同志，他竟然冒着和我“串通一气”的风险到我的房间来了？我正在惊讶，只见他朝我摆摆手，说“世雄同志请相信我！”放下一张纸条就出去了。我急忙打开纸条，只见几行熟悉的字体：“世雄同志，不能再坚持了！检讨吧！越沉重越好！时间不等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请相信我！相信我！”纸条不长，但充份显示了他对我关心的程度。我趴在桌上想了许多：边疆同志早在1950年组建海军政治部时就是我的上级，1956年我担任航三师师长时，他又是我的上级，我长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八〇年受审时的王洪文



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彼此关系很好。我奉命来六机部军管时，他作为六机部的副部长，十分支持我的工作。我对他一向是敬佩有加的。这次批林整风会议中他违心地做检讨，我也是理解的。“时间不等人”，如果我坚持不检讨，真按那位领导同志所说被开除党籍，受损失的不仅是我，还有我那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妻子和几个人伍在部队要求进步的子女。我心一横：检讨就检讨！不就是给自己扣几顶大帽子，臭骂自己一顿吗？我奋笔疾书写了一份发言，沉痛“检讨”了自己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所以一遇政治风浪，屁股就不自觉地坐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立面；我与张春桥、王洪文“打官司”，虽没有秉承林彪死党李作鹏的旨意，但却扮演了“黑干将”的角色，客观上起了林彪死党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第二天上午，当我被大会主持人宣布要上台检讨时，我边走，边想：我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刀，面对国民党的枪林弹雨，没有低过头；面对艰深的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我也未曾服过输。怎么现在为了老婆孩子的安全，为了自己能过关，竟违心地向谬误低头认罪呢？难道坚持真理的人就应该落得这样的下场吗？虽说毛主席批示“同意”复议我们和上海“打官司”的事，他老人家知道事情的真相吗？周总理知道他断的“官司”被翻案了吗？他所说我们“得理不让人”的话，这个理又在哪儿呢？我越想越伤心，没能走到台前，泪珠已像断线的珠子般流了下来。在我开始念“检讨书”时，更是抽泣不已，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在台上如泣如诉，代表们在台下鸦雀无声。我满肚子委屈在此时的倾泻，竟被听者误认为是我知错后的心情“沉痛”。连那位领导同志竟也有了笑容，他说：“刘世雄同志查到了错误的根源，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虽然不十分深刻，也没揭发林彪死党，但已经有了一点儿进步，希望能继续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林彪死党彻底决裂。”

可是有谁知道，我“沉痛”检讨完毕后，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我觉得自己那时那样虚

伪，那样下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次检讨是我人生的败笔。

我的检讨真的“过关”了。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整风会议终于结束了。会议组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疆同志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过检讨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刘世雄同志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谈到我时，当然离不开“恶毒攻击春桥同志”、“矛头指向洪文同志”等字样。

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会是什么下场，但我已无力与他们抗衡了，近三个月的折腾使我心身交瘁，因此大会后报告让我签名时，我毫无犹豫就签上了名字。

## 巧用词，李先念副总理改定性 讲真理，胡耀邦总书记予平反

整风会议后，我和边疆同志回到六机部，继续接受六机部下属工厂所派代表来京组织的批判大会，说是为了“肃清（我）来六机部主持工作以来的流毒”。我又做了一次检讨，但再也没有伤心流泪。正在此时，党中央批复了六机部整风会议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亲笔批示，原文为：“刘世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但只要检讨了就是好同志。……考虑到刘世雄同志的处境已不适合继续在六机部工作，建议回海军另行分配工作”。叶帅批示“同意”，毛主席和其它政治局领导一一圈阅。

我从心底里感激先念副总理，自从到六机部工作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近六年，他对我的基本看法始终没有改变。他巧用一句“刘世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代替了原报告将我推向林彪死党的那一段话，将敌我矛盾顷刻间化为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变，就使我和我的全家幸免于难了。离开六机部那天，尽管大多数人不敢公然来送我，但不少同志与我握手道别，那一双双眼神

饱含安慰、鼓励之情，这无声的语言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回到海军后，我并未如先念同志批示的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继续被组织批判。但是海军的同志均与我共同工作数十年，对我的为人一贯了解，对六机部的所谓“错误”根本闻所未闻，所以批判就只是走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但是我被取消了一切政治待遇，就连营、团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也不能参加，传达文件也不让我听，这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和游行仍不让我参加。于是我背着水壶挎包，步行到西单，参加到北京市民的游行队伍中去，和人民群众一起振臂高呼口号，游行庆祝。别人喊“打倒四人帮”时我则指名道姓地高喊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心情之畅快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曾想“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位领导同志，当初制造了这一桩冤案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在“四人帮”的高压之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抗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民点燃庆祝胜利的鞭炮

得住的。如今“四人帮”垮台了，为我平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我多次向海军党委、六机部党组和那位领导同志写申诉材料，请求为我平反，恢复我的工作。但几十份申诉材料均如石沉大海。我并未丧气，又复写了几十份申诉材料，每周寄出一份，但仍然杳无回音。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精神处于极度痛苦和焦虑之中，1979年，我心身交瘁而患脑中风，成为了半身不遂的终身残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彻底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我看到了一线曙光。邓小平同志在党内重要地位的确立及坚持“两个凡是”那位领导同志的被取代，更为我的平反吹来了一缕春风。1980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的指示以及胡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的进程，大批在十年浩劫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被纷纷解放，这一切都深深地鼓励了我。我又开始锲而不舍地向胡耀邦同志和中组部写申诉材料。

1982年，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我的申诉报告终于有了回音，我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要我去一趟。到了那里，中组部的同志拿出了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原文：“请中组部会同海军，船舶工业总公司对刘世雄同志的报告进行复查，并将复查和处理结果告我。”耀邦同志的这段指示可贵在他不仅布置了这项调查，还要求落实及有回音，这就加强了为我平反这项工作的力度。1982年底，我终于平反了！在平反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原结论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刘世雄同志对王洪文等人进行过抵制和斗争……”等等，看到这里，我长出了一口气，压着我十年之久的大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责任编辑 吴思）



# 为毛主席烧制专用瓷器纪实

● 王立新

“红色收藏热”已经席卷全国，一对毛主席生活用瓷碗拍卖出 178 万元人民币的“天价”，89 件毛主席专用瓷（简称“主席瓷”）卖到了 1143 万元。

1998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美术馆隆重展出了 1998 年上海春季古董珍玩拍卖会的主席瓷拍品，上百双眼睛盯住正待拍卖的 8 只首次面世“瓷碗”。这是 8 只极漂亮的“梅花饭碗”——釉下五彩瓷，双面彩绘的画面清晰可见，奇美无比；瓷质洁白无瑕，莹润光洁，更衬托出釉下五彩的纯正与古艳，清雅和富丽。这是 8 只“瓷中精品”，估价已达 128 万人民币。这是 8 只毛主席生活用瓷！

“中国第一瓷”是怎样研制出来的？1974 年最后一次为毛主席烧制瓷器时，又是谁设计了富有象征意义和政治色彩双面五彩“月月红”碗？主席用瓷历经了几十个春秋而今又保存怎样？流传于世的又有多少呢？传说纷纭。

## 醴陵瓷业的发展

湖南醴陵瓷器的生产历史悠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人杰地灵的人文优势，首创了独具一格的釉下五彩名瓷。

宣统元年至民国 4 年（1909—1915）釉下五彩瓷器先后获武汉劝业会一等金质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

博览会金牌奖。从此，醴陵瓷业蜚声中外。当时的盛况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尤以首创的釉下五彩瓷器为景德镇所不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醴陵瓷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如果把醴陵细瓷业在清末民初间的成就确认是第一个光辉的时期，那么建国后的 30 多年就可以说是一个最辉煌灿烂的历程。1959 年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城楼第一次用上了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尔后，醴陵瓷被选为首都十大建筑——中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工人体育馆用瓷，首都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也是醴陵烧制的。1964 年国庆 15 周年，醴陵又成批精制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国宴餐具和国家礼品瓷。毛主席的专用餐具、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用瓷都指定由醴陵生产。

毛主席曾讲过“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这句话给醴陵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醴陵成为了中国第一“官窑”。翌年 3 月，中央轻工业部派出改窑小组到醴陵开展改窑试点工作，并在醴陵召开全国改窑工作现场会，推广醴陵经验，为后来试制毛主席用瓷作好了关键性的改进工程。1958 年国家投资技术改造基建费 800 万元，在醴陵组建了专门从事釉下彩生产的艺术瓷厂（原群力瓷厂）。

## “胜利杯”的诞生

1958年4月11日,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盖杯),来人带来一个延安使用过的上下一般大的桶形茶具,这个茶杯无花、无盖,瓷质粗糙、颜色灰白。湖南省委要求在样杯的基础上改矮、扩大、加盖,并要求用最快速的时间试制出样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陶瓷研究所的彩绘工程师们连续试制了六种造型设计,先后四次送长沙鉴定。6月20日,当时担任醴陵瓷器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的王林卿接长沙电话,说毛主席对醴陵试制的茶杯很满意,这时才知道是专门为毛主席制作茶杯,湖南省委当即指示尽快赶制40个,白的20个,花的20个,并要求7月5日前送省委。茶杯做好了,要给杯子取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幸福杯、跃进杯、解放杯、胜利杯……。最后确定一个有双关意义的名字:“胜利杯”。它象征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也寓意这次试制工作的胜利。这种釉下彩绘的蝴蝶花胜利杯,是彩绘艺人唐汉初首创设计,后来经过陶瓷研究所彩绘高级工程师林家湖根据北京审定意见修改设计而成,杯底特制了有“湖南醴陵”篆书字样加一个和平鸽标志的釉上西赤红底印。从此,毛主席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制生产的胜利杯。

## 毛主席喜爱“梅花碗”

毛主席不让摆花又很爱花,他在诗词中多处提到花,如《采桑子·重阳》中就有“战地黄花分外香”,《卜算子·咏梅》则全首词是在歌颂梅花。梅花最可贵的品格是傲霜斗雪,风姿昂扬,它寄托着人类向困难,向逆境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醴陵设计的梅花碗造型是取样于明代永乐年制龙纹碗官窑器物造型为样本,将碗口内敛收缩改小,碗壁修薄,口径尺寸为12.5cm,碗高6cm。由于选用的是最优质的高岭土、石英、长石等作泥料配方,故胎质坚韧、透明洁白、釉面光滑、典雅轻巧、手感舒适,碗的外边饰以三组红艳的腊梅花、衬缀一枝青竹,红绿相映,特别醒目。1966年夏天毛主席回湖南在韶山滴水洞一号楼住了11天,使用的就是醴陵特制的梅花碗和139号兰色牡丹纹国宴瓷中的方肩型烟灰缸,绘有梅竹图案的瓷质插笔筒。

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醴陵艺术瓷厂生产的联合国用瓷,其选用的图案也是毛主席最喜爱的称为“国花”的梅花,中国瓷器又一次蜚声国际。

同年9月2日,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同志来到醴陵陶瓷研究所,下达了省委书记万达关于为毛主席试制釉下彩餐具和烟缸的指示,陶研所的党

委立即组织了工程技术人员作了认真的研究,由湖南省陶瓷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制瓷专家梁六奎主持全面的器型设计创作。湖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大师熊声贵、王德和、余华等人,精心地设计两套不同风格的写实和变形的梅花图案的浅型三大碗和带盖加大鱼盘,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亦是最擅长画各种梅花的高手,精通釉下彩绘技法。所画雪中红梅充分利用釉下彩的特殊颜料将冰雪纷飞中的红梅画得风姿昂扬、花枝怒放。其所作红梅花薄胎莲子壶茶具和红梅四号胜利杯构思巧妙,画工精良,堪称大师风范的经典之作。

第二年的7月5日,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携带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信件到醴陵艺术瓷厂订制了一千二百一十件大小碗和各种盘类产品,全部釉下彩绘梅花图案装饰,不论盘碗,一律带盖。这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接待处专门为毛主席特制的双面梅花餐具十分精美,无论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都可称上乘之作,毛主席见到这一批瓷器时高兴异常。千余件的釉下双面五彩精品瓷,除派专人护送到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住处专供主席使用外,一部分送往韶山滴水洞主席住所,另留下一小部分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待毛主席回故乡湖南时使用。



## 政治色彩浓厚的 “月月红”双面五彩碗

在毛主席生活用瓷中，最具神秘色彩的莫过于“月月红”双面五彩碗。

1974年10月13日，毛主席最后一次回到湖南，在长沙共生活了114天，这是解放以后毛主席在家乡时间最长的一次。11月4日，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布置省工交办给醴陵群力瓷厂下达为毛主席赶制40件薄胎碗的任务，要求内外均有釉下彩花卉装饰，花面的设计强调“特制瓷”的特殊意义，既要体现出最高的工艺制作水平，又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醴陵市志》彩页刊登介绍的毛主席生前用瓷之一，就是这40件薄胎碗中的主要代表作，同时也是一件最具政治色彩的瓷碗。花面的设计是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著名陶瓷美术家李人中精心创制。

谈到“月月红”碗的创作和试制，李人中先生激动万分，釉下双面五彩四季花卉纹碗就是李人中、王顺娇夫妇在“文革”时期的杰作。

李人中先生在亲笔手稿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974年夏初一天上午，快下班的时候，老书记艺术瓷厂试制工场的主任刘金晓从厂部开会回来，走到我桌旁严肃地对我讲，下午上班到他办公室，说完就走了，神秘兮兮地让我很不安。上班铃一响我就到办公室，

一看党支部的几个领导都在，会议一开始刘主任先讲了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伟大贡献，接着又谈要如何突出政治，最后讲到我们要如何忠于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然后话锋一转说，上午省委接待处刘处长和瓷业总公司领导奉命下达一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最最光荣的使命，就是要为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设计制作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要求特别高，要烧制出中国最好的瓷器，忠不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了。彩绘总设计任务由李人中同志担任并负责各道工艺程序的技术攻关，省委领导要求12公分碗要内外都绘花，要有主次之分，胜利杯（盖水杯）的正背面和盖都要画上花纹，但没有规定具体画什么样的图案，主要是要突出政治，又要有全国代表性，色彩要以红色为主，艺术性要高，不能画得太简单……。要求全部试制过程要绝对保密，以防破坏。

李人中说，一接到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我全身所有的神经都绷紧了，内心忧喜交集。喜的是能亲手为敬爱的毛主席设计制作瓷器，忧的是怕设计不出理想的画面而完不成任务。回到家里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总是想着这项特殊的设计任务，脑海里反复地构思、酝酿着。选什么题材呢？很多花都可以画得很漂亮，但要突出政治，选什么花卉好呢？几天的时间飞快地流逝了，却

毫无结果，看到我焦虑万分的老伴此时也着急了，突然讲，月季花可不可以入画呢？月季又名月月红，四季开花、生命力强，不需要特殊的养料和培育，能在杂草丛中顽强地开放，我国长江南北都可以种植。对！就选画月季花为主花，用红色月季代表春天，象征顽强茁壮的生命。我脑中闪过一道灵感的闪电：全国各行各业春节过后都要搞“开门红”；五月份被人称为“红五月”；过了六月每年大战七八九，实现全年生产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月季花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的内涵。于是我很快就勾画出红月季花卉纹碗的图稿，通过多次反复的釉下彩绘配色试制，鉴定最后确定碗内绘三组花，碗外配三组副花，反衬出碗内的一组大小月季花卉图案，以写实的表现手法采用釉下彩绘颜色线勾勒出主花花瓣，花叶的筋脉则用留白线的传统釉下彩工艺，用油墨黑线勾勒、六朵副花填色汾水以桃红为主，碗内主花则采用晕色、覆色、衬色、罩色四法，在花心深处饰以果绿，边沿受光处用粉白表现光感，这样内深外浅，自然、真实而生动，再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方式将花心苞瓣，罩上一层浅浅的桃红，花的周围饰以黄色小花点缀左右，红绿相映更显古艳、富丽，又不失雅致，用笔灵巧生动多变，色彩亮丽又不失庄重，送呈湖南省委经有关领导审查，鉴定通过

后,即正式开始生产制作。

谈到这里,年过花甲的李人中先生清瘦、儒雅的脸上仍掩不住激动,眼中闪现出一种特别的神情。

后来这套“月月红”碗得到许多中央领导的赞誉。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抵达长沙,一是向主席汇报工作,二是向主席祝寿。毛主席82岁生日时在长沙省委接待处与周总理一起用餐时就是使用的这种薄胎双面彩饭碗。

为确保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所有特制的釉下五彩主席用瓷均要经过1360℃高温三次入窑烧制而成,这样烧制的瓷器无铅毒,不含镉,耐酸、耐碱、耐磨损永不褪色,由于有釉层的覆盖作用,不存在铅毒和其他毒性物对人体的危害。

醴陵所制主席瓷,均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中央警卫局吴连登和湖南省委共同监督烧制以保证万无一失。从瓷泥的选料配方到入窑烧成,都用特殊的方法研制。毛主席用瓷的泥料均采用湖南境内衡阳界牌高岭土和长石加本地原料组成,还在洪江等处专门运来优

质上等泥料,全部手工精选。主席瓷的烧成也颇为讲究,为适应特级高等细瓷的烧成,醴陵窑参照日本式串窑和景德镇式窑(蛋形窑)来改进串窑结构,将窑室的平底改为阶梯形,将半圆形拱改为箴箕形拱,此种改良阶梯窑,亦称“醴陵窑”。烧成在陶瓷生产是最关键的,故有“生在泥上,死在窑上”之说,主席瓷的烧成是用“火中之中”之法将瓷器装放在窑的中心部位,利用瓷窑中的最佳火位烧出最理想的釉下五彩,还原焰烧成能使瓷器釉面白里泛青,柔和滋润,釉下色彩就愈显得清雅有水分感,达到了“艳而不俗,淡而有神”的艺术效果。

醴陵窑在1974年最后一次为毛主席烧制釉下五彩瓷以后,就再也没有生产制作主席瓷了。因为特制主席专用瓷是只追求品质标准和完美,不计成本的。

## 现代主席用瓷 明日稀世珍宝

在韶山,毛主席遗物珍品

馆唯一陈列展出的“主席用瓷”餐具,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接待处在1971年到醴陵订制的。这批被称为“瓷中之王”的釉下五彩名瓷是毛主席生前最喜爱的饭碗。

“现代官窑”醴陵在1958年至1974年期间,据有关资料记载为毛主席烧制专用瓷器有1555件,其中包括有烟缸、胜利杯、笔筒、饭碗、鱼盘、品锅、汤匙、菜碟、牙盒、卫生盖碗等等。时隔40多年,市面上极为罕见。

醴陵窑制“主席用瓷”烧制工艺非常精湛,独特的釉下彩绘艺术更是无与伦比的精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誉称为“20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国之瑰宝”。现代官窑醴陵烧制的“主席用瓷”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无法估量。

199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北京中南海保存的毛泽东遗物清理了数千件移交韶山故里供收藏和展览,毛主席生前用过的瓷器均全部编号入库封存。

(责任编辑 吴思)



毛主席最喜欢用的梅花碗。1974年醴陵制



韶山展出的毛泽东遗物——醴陵制主席瓷

# 冼星海在延安

## ● 朱鸿召

延安是座歌的城，是座诗的城。延安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歌咏活动和朗诵诗运动，唤醒民众，激发起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信心，并抒发自己融身黄土地上这片战时共产主义理想国的无限感怀。

冼星海(1905 - 1945)出生于澳门一个渔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星海谋生南洋，抚孤不易，以博大的情怀和顽强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冼星海的人生和艺术。中学时代冼星海便时或半工半读，1926年进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改进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一次学潮中，星海被迫退学。1930年初，冼星海到巴黎求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找到了职业时，学习的时间却又太少，在此时期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boy)，做过看守

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失业时，“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勤奋苦学，成绩优异。按其成绩和资格是应得政府公费的，他几番请求都没答应，至1935年夏便毅然回国。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深入社会，创作救亡歌曲，组织民众歌咏。1937年8月，上海戏剧界组织救亡演剧队，分赴内地宣传抗战。冼星海泪别老母，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队第二队。从珍藏至今的图片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青年们愤恨已极，亢奋已极。酷热的夏天，他们坐在行进的小船上，戴草帽，背水壶，穿着短裤，吹着口琴，眉间有忧戚，眼中有怒火，隐忍着旅途的辛苦，燃烧起救亡的热情。10月到武汉，冼星海参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几年见识，他认识到，“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他给恋人的信中说：“我想到不久要到陕北的时候，那边给我们多么伟大的前途和希望！……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再这样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是这样满怀着热情和希望，1938年11月，冼星海偕同未婚妻钱韵玲乘上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从武汉经西安，在西安拒绝友人的高薪相聘，执意到了延安。

冼星海到延安后，积极投身集体歌咏活动，创作并指挥《黄河大合唱》等充分表现时代情绪和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使延安集体歌咏达到高潮。

冼星海贫苦的家庭出身和

半工半读的早年经历，养成他朴实的情感作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而天生聪颖的秉赋给予他敏锐的艺术感悟。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有过人的识见：“伟大的思想应该有的，同时要有伟大的实行。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而要实行。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法国留学期间，在巴黎看到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群众游行，他惊叹于合唱歌曲所激发起的集体狂热，促使他在音乐创作上勇于走一条与“学院派”相叛逆的道路。他说：“我把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没想到这类作品当时就受到欢迎，获得了成功。这样，他由生活上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走向艺术生命的倾向民众，关怀社会。

回国后，他与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及文艺界进步人士交往，将聂耳的“新兴音乐”作为自己倾向民众关怀社会的音乐创作的方向与知己。

对聂耳开创的“新兴音乐”的理论认同，加强了他在艺术实践中的自信。处身民族危亡

国难当头的时代，他充满着政治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歌咏运动中。他坚信：“我们的民族既是伟大的民族，我们毫不犹疑，她是急需那种伟大的救亡歌声来挽救的。只有民族性的壮气，才能启发整个民族的兴奋。歌声愈激昂悲壮，民族的前途就可以肯定是愈有光明。”他随救亡演出队从上海往苏州、南京，北上徐州，到开封，到洛阳，到武汉，组织成立全国歌咏协会，亲自到石灰窑、黄石港、大冶钢铁厂，深入农村、兵营教唱救亡歌曲，指挥群众歌咏。这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他热情澎湃地走过烽火硝烟的中原大地，扩展了艺术情怀，以一颗敏于感受的心贴近民众，体验着民族的苦难和忧患，呼唤着亿万同胞的觉醒和抗争，期盼着祖国母亲的新生与振兴。

冼星海到延安后如鱼得水，他很活跃，到处去教唱歌，指挥合唱，“他的活动与作风就和这种空气很和谐。”（何其芳《记冼星海同志》）。1939年延安欢度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近万名青年聚集在城北门外西山脚下的坪坝上，煤气灯下，毛泽东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后，冼星海指挥《生产大合唱》。据当时的参加者回忆：

冼星海同志指挥得那样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有感情。随着指挥棒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

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番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吴伯箫《歌声》）

在这样的社会群体里，他找到了艺术的知音，得到了心灵的共振，激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在延安时期，是星海的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乐思如泉涌，有时饭吃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乐想，立刻放下碗，写下这段旋律。甚至有一次睡在床上，听到风声，脑海里浮出一段旋律，赶快起来记下。”（钱韵玲《深情无限忆星海》）生活安定，感于时代，忧乎民族，追求“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更善于抒发壮丽强烈的情感。1939年春，创作《生产大合唱》，是他在延安第一次尝试民族形式、进步技巧的作品。接着，在一个星期时间里便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组曲。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描绘黄河形象，塑造黄河性格，正可以艺术地表达作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对民族命运的强烈忧患情感。延安文人胸襟开阔，情绪激昂，让黄河从心中流过，延安的歌咏更是如浪如涛，壮丽辉煌。

千里黄河迂回曲折，沉重地流过了黄土地，终于爆发出

积蓄已久的力量，冲断吕梁山脉，纵身跃下黄土高原，在山西吉县留下了千古奇观——壶口瀑布。当地老乡至今都用最纯朴的感情，最纯朴的语言世代地惊叹着：

黄河，你像条蛇(sha)，  
曲里拐弯到这搭(里)。  
白儿黑夜都流不完(wa)  
妈呀，哪来这么些(xa)呀！

这里，黄河被山峡断为明显的上下两截。两三里宽的河水被挤压在几丈宽的峡口里，沉默已久的黄河愤怒了。它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奔狂泻，泥浆翻腾，激起数丈巨澜，震天动地地吼叫着。靠近峡口，顿然间你会听觉麻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直到离开峡口，走出五六里地后，听觉才能逐渐恢复正常。1938年秋，25岁的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武汉到晋

西一带的吕梁游击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途径壶口瀑布。啊，这是一派何等壮丽的景象！年青的诗人被黄河的气魄惊呆了，从心底里发出慨叹。雄伟的气魄，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震慑古今的风采，这才是黄河的形象，母亲的性格，中华民族的精神。艺术的灵感在诗人的心里孕育诞生着。

1939年1月，诗人行军中不幸坠马，左臂骨折，被担架一村一岭地转送延安诊治。途中，诗人在永和关又有幸观光黄河，河上船夫与恶浪搏斗的情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情感不断地被升华，意象不断地被提炼，心中黄河的艺术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在延安，当初在三厅同事并一起合作过《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拓荒歌》等十几首歌曲的合作者冼星海到医院看望诗人，并提议再来一次合

作。与诗人同到延安的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的同志们，也急切需要新的节目汇报演出。诗人的心不能平静了。他利用住院治疗的空闲，构思着刻划表现心中黄河的艺术形象。

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  
拼着性命和  
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  
那么你请听吧——

一首好诗，一部名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了。词作者光未然回忆说：“3月间，我便把1938、39年两次渡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一些感受，原来打算要写一首题为《黄河吟》的长诗的，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当时，他左臂肿胀，行动不灵，躺在病床上。是用五天的时间，口授给三队的



1939年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曲谱



冼星海(1905—1945)

胡志涛笔录的。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在西北旅社的一间窑洞里，请来了冼星海，开个小小的朗诵会。光未然把歌词念给大家听，还谈了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冼星海听着听着就入迷了。他忽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在手上，当仁不让地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从窑洞里传出来。

此后的六天六夜时间里，冼星海在桥儿沟东山鲁艺教师宿舍的窑洞里，写下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据张光年回忆：

他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的泉源，刷刷地迸流出来，就使他经常处在一种兴奋的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中。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他要我买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冼星海完全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极度兴奋之中。他捕捉到了词作者描绘的黄河形象，点燃了自己多年来南奔北走，患难追求的民族情感，用心灵之乐汇突出刻划黄河的形象，表现出气势磅礴的时代精神。写黄河的形象，就是写民族的灵魂。

为了尽快演出，演剧三队

每天早上派田冲、邬析零去小心地探问前一天的成果，他俩从不空手而归。全部组曲的八个部分，除了《黄河怨》、《黄河颂》写过二稿、三稿，其他全部写得得心应手。据当时担任独唱的田冲回忆冼星海修改《黄河颂》的情况，冼星海说：一提到“颂”，很容易使人想到赞美诗，我是在国外学西洋乐的，我不能把黄河颂谱成教堂里的赞美诗。所以，我曾经想从昆曲中找到一些适合民族风格的旋律，但又行不通，古老的曲调不能把黄河的气魄和词作者的意图表达出来。我想，这首歌是诗人对黄河感受到的第一个印象，你们对我说过，光未然在壶口大声地喊着：啊，黄河！那就是词作者在歌颂它，诗人心目中的黄河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它既是母亲，又是一个巨人……。冼星海指导田冲演唱时又说：你的第一句不要唱得太高昂，要把黄河之水从高处引出来，然后，经过几个迂回宛转，再一步步高昂到“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这样唱也许就不平板了。要不然，一开口像一个英雄摆着架子唱“我站在高山之巅”，那黄河之水就像在你的脚下，那就不是歌颂黄河，而是高山颂，或者是自我颂了。艺术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审美表现。《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他们都是用心灵在塑造着黄河的形象，表达着崇高的民族情感，唱出了一个时

代的心声。

1939年4月13日，抗敌演剧三队在鲁艺音乐系和抗大文艺工作团的协助下，于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音乐会，第一次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当天日记载：“今天晚上是空前的音乐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生产大合唱》博得全场的欢迎！《黄河》（即《黄河大合唱》，引者注）因第三队女声独唱走音，给观众不好印象。整个曲子，他们觉得很雄伟！文艺工作团最差，人数只有8人。鲁艺动员50人的合唱，可谓空前。”5月10日，鲁艺隆重举行周年纪念（因突击开荒，改原4月10日为5月10日）活动，次日晚为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经过认真准备，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声势浩大，相当成功。冼星海日记载：

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

此后，冼星海在延安还指挥过有五百人左右参加演唱的《黄河大合唱》，波澜壮阔，气势



磅礴。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期间，观看演出之后，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茅盾在延安听到过三百人左右的演出，感受颇深：“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洗星海以一曲《黄河大合唱》走进了民族心灵的深处，激发起革命英雄的时代精神。有人批评《黄河大合唱》是喊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是歇斯底理的。殊不知即使是歇斯底理的，是喊出来的，也正是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候所发出的怒吼的心声。时代选择了他，时代宠爱着他；他激荡着时代，他升华了自己。

洗星海是个有着强烈个性的人。聪慧让他自信，履历给他经验，苦难给他意志，艺术又使他敏感。中学时代的他质朴、热情、开朗，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个刚毅木讷的人。青年的星海，身材颇高，皮肤微黑，眼睛深沉而富有神采。穿的多是布料的西装，他爱敞开领子——领带是不常结的，使人望之而想起那些常常看到的雪莱或贝多芬的肖像。他说不好普通话，但待人对事，有气魄，有粗野的力，有诚恳的真情。他对何其芳说，他作曲已经写坏了

好几支派克笔。何其芳惊叹这“不仅说明他的创作的丰富，还可以想象到他创作时的情绪的饱满与奔放，仿佛五线谱成了他的键盘，钢笔尖成了他的手指，他完全忘却它是容易磨损的金属了”。艺术创作是全部身心的投入，是生命的顶峰体验与疯狂状态，是对平常人生的偏离。他“由于极度地使用他的脑子而常常头痛”（李焕之《热情·饱满·坚定》）。这种人难免怪异，个性犷厉，但绝无恶意，甚至没有防范，本质上只是生命的一派天真可爱。洗星海尊重集体，尊重进步，尊重自己向上的意志。1939年6月，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他带着鲜明的个性入了党。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中，“他和张曙兄的火气都相当大，有时为了一些细小的事也难免争得面红耳赤”（林路《忆星海》）。在延安鲁艺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他的小提琴节目排在另一教授的小提琴节目后，以为安排节目的人与该教授串通一气，有意欺侮他。到他演奏时，他一连拉断了几根E弦，想借口没弦不能拉。但实际还是拉了。后来，他常常“把隔壁教授那里过来的小鸡打得满房乱飞”。“许多人都感到星海异常倔强，而且有点好胜，英雄主义的气质异常

浓厚。在那时候，其间也还夹杂着一些个人主义成份，对于这种人，有什么不遂心愿，他会爆发到可怕的地步。”（李波《星海在延安》）有性格的人生都是有缺陷的人生，但只有承认并容许性格、个性，才会有生命的活力，艺术的生机，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据说此时有所谓“延安四大怪人”。塞克长发披肩；萧军独来独往，狂放不羁；王实味暴躁尖刻，激烈犯上；洗星海半是玩笑半是真地宣言：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来。此说至今尚为孤证，不足以为信。但聊备一说，是可以帮助想象延安文人于此时在政治与道德完全走向一元化之前的心灵空间与社会空间。当年红颜伴美髯的柯仲平之美妻王琳女士回忆，“各人都拄一根用枣木或其他木料自制的手杖——这是延安文化人的特点——把两条腿变成三条腿，翻山趟水，东跑西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辛勤垦荒”。不一定每个延安文人都拄手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上前排就座者是有携带此物的。备此尤物，延安文人似乎多少可以保存几份悠然的心境，在烽火硝烟，兵营帐下，黄土窑洞之间，为民族救亡歌之诗之，传习成风，也便成了身份的标志。

洗星海的个性成就了洗星海。他个性的自然发展使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让



他继续发展着自己的个性。共产党是他民族救亡的理想归宿，是他个人生命追求的价值实现。他在致党组织的信中说：“关于本人的音乐创作，因明了马列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党员们的互相勉励，更可以鼓励自己的作品能够深入到民族心灵的最深处，使作品能真正地创作出民族的呼声，能代替群众在怒吼，反映现实”。加入共产党组织，对于他的艺术创作是明了——而非强迫接受、执行——一种艺术理论，明了同志们的勉励，更可以深入到民族心灵的最深处，真是幸莫大焉。他认为：

音乐是从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我们也需要到劳动大众中去学习，并且交还给他们，教育组织他们，使音乐的作用能

配合现阶段战争的需要，会具有彻底的斗争性、政治性、教育性、现实性。我们中国音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享乐性、感伤性等等倾向中彻底改造过来，建立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代表进步的人民；雄亮有生气的作风，代表着全民族的工农的朴实、耐劳、刻苦的强大集体力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是具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

他学习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主张深入民间，强调作品的现实战斗性，这与整风运动后的理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生命主体的有无。有之，则艺术创作的审美品性未伤，从艺术的本性立场去参与生活，艺术存焉。

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在所

有延安文人的艺术创作中，冼星海与稍后的赵树理、孙犁三人当属异数。赵树理作品在《解放日报》发表，本人并未到延安。孙犁是1944年春随华北联大学员自冀西山区长途跋涉一个月到延安鲁艺，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便返回冀中。冼星海1940年接受任务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不料竟一去不返，客死他乡。他们都没有直接参加整风运动。

冼星海走后，虽然不断地有其他大合唱组曲及歌曲产生，但延安开始了一个歌声消歇的时期。待歌声又起时，已是歌舞并作的新秧歌了。

(责任编辑 吴思)

## 本刊邮购启事

(一) 凡延误订阅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4.80元。补购单期、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二) 1998年合订本装订完毕，精装每套56元，简装每套51元，本刊上期所刊售价有误，以此为准

现尚有1997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4元，简装每套49元；1996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2元，简装每套49元。

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三)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

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四) 本刊自1994年——1998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至5期均有存书，每册包括邮费9元，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刊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1

联系人：谷世章

# 台湾国语运动

## 发起人范寿康



● 徐明远

1982年4月18日的深夜，一架从美国飞来的中国民航飞机已经飞临北京地区上空。在飞机的头等舱里，有一位老年乘客。这位老人，就是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厅)长、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范寿康先生。他已经88岁高龄，去国离乡已经37年。

1913年，范先生年方18岁，便东渡日本求学，专攻一年日语之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医学专业。这里是那时日本帝国大学的预科，郭沫若、郁达夫、夏禹鼎等人都是他的同学。1919年，范先生从这里升入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教育与哲学，并于1921年写出论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表在当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从此，他就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奠定了他的哲学思想基础。1923年，他在帝国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范先生学成回国后，即被友人聘为商务编译所的编辑，负责哲学与教育方面的编译工作。他回国的当年就由商务编译所出版了他的著作《教育哲学大纲》。此后，他又先后出版了《美学概论》(1927年)、《哲学及其根本问题》(1930年)、《教育概论》、《伦理学》(1931年)及其他诸多著作。1933年他正式出版了他的专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范先生众多著作锦上添花，大放异彩。1936年范先生又出版了备受哲学与史学界重视的《中国哲学史通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范先生虽为学者，但他深受其祖先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影响。他毅然辞去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职务，投入抗日的行列。经郭沫若介绍，参加了由国民党代表陈诚为部长，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工作。他被任命为第三厅副厅长，郭沫若为厅长。留日时两人为同学，抗日战争又使他两人成为同事。这是范先生平生首次踏入仕途。后来又曾任政治部的设计委员。

1945年抗战胜利，范先生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邀，赴台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在那里，他以强烈的中华民族感情，从小学、中学入手，直到大学和社会，极尽全力，消除日本帝国主义亡我的奴化教育影响，并把它列为教育厅的首要任务。他深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50年，奴化教育，根深蒂固，铲除其流毒，绝非易事。5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实行所谓皇民化的教育，强行将日语当作“国语”。在台湾，无处不泛滥着日文的报刊和书籍。日人还强迫台湾人民从小学开始就必须读日文书，讲日本话，还委派清一色的日本人充当小学校的教师。不仅如此，日人还规定所谓的帝国大学(收复后改名为台湾大学)的学生，只可学农、学医和理工，不准学法学文科。更有甚

者，在台湾同胞的家庭中，搞所谓的国语家庭。即便在家中，也不准使用华语对话，并且强迫台湾人民改为日本姓名。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的奴化之用心，可谓恶毒之极。

这种严重的局面，使范先生忠贞纯洁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损伤，从而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情感，决心针锋相对，予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尊。他提出“中国化”的口号和号召，制订了多项措施。他组织教育系统的各级官员，在全台湾推行国语（普通话）。为此，组成了国语推行委员会。在教育领域里，从小学开始，经中学到大学，都要推行国语教育。通过国语，培养学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观念，弘扬祖国文化传统。为了解决师资短缺，他创建了台湾师范学院，培训国语师资。在社会上，他组织宣传血统一致，不忘祖先，推行中国话，看中文报，读中文书。范先生围绕着“中国化”的宗旨，极尽全力，奋勇推行。由于范先生提出的“中国化”在台湾广泛传播，推行国语雷厉风行，短短一年的时间，台湾同胞从言谈到出版物，从思想到观念，皆焕然一新，局面大为改观。

到了1946年夏秋之交，国共关系破裂，祖国大陆上内战再次爆发，这对范先生平生第二次为官，是一个大的打击。于是，他决心辞去官职，于1947年到台湾大学继续他的教育生涯，担任台大文学院哲学教授，直到1970年功成身退。

在离开大陆37年之后，1982年4月，范寿康教授以88岁高龄，不辞辛劳，费尽周折，由台湾转辗回到祖国大陆并在北京定居。他这种“爱国应忘老”的举动，在当时的海峡两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海峡那边，尽管台湾当局严密封锁大陆的消息，但是祖国大陆广播传媒的声音，却是难以封锁得住的。范先生返回祖国，定居北京的消息，对台湾广大爱国的军政人员、青年人，尤其是对遍及台湾全岛的范先生的门生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在祖国大陆，范寿康教授受到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安排。他在当年，就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并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了同期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胡愈之和杨静仁的接见与宴请。范老先生对新闻界表示，“国家、政府和人民这么看得起我，使我非常感激，同时我也感到责任的重大。我将竭尽绵薄，报效人民和国家。”他又说：“我已经88岁了，回到了父母之邦，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但毕竟精神有限，能力也有限了。但是，报答国家之心，仍然是有增无已的。”

在1982年底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宪法。范老先生曾列席会议，参与对宪法的讨论。他对新宪法第31条中“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认为特别重要。尤其对台湾这个特区，实行高度的自治，这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范老先生认为，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一样，都爱祖国，都以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为荣。即使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花费了50年时间，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台湾推行“皇民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台湾人民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强烈的热爱祖国之心。范老先生坚信，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具有这样共同的坚实爱国意志和心灵联系，祖国的统一，亲人的团聚是大有希望的。

不幸的是，范寿康教授返回祖国大陆不到一年，于1983年2月27日因心力衰竭去世。

范寿康教授在台湾推行的“中国化”，可谓功绩卓著，影响深远。他为了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50年奴化教育的影响，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在全台湾推行国语。他辞去教育处长职务，在台湾执教20余年，仍然无时不对国语推行的关注，以致几十年以来，台湾民众讲用国语十分普及，尤其在青年一代中，国语讲的很是标准。台湾同祖国大陆在语言文字上的统一，其意义不仅仅是便于双方的沟通和交流，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一。这对统一祖国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这不能不说是范寿康教授生平一大功绩，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吴思）

# 张自忠

## 在天津当市长



张自忠

### ● 梁占方

在天津的历史上，军人出身的市长有很多，张自忠系其中之一。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省临清人，是冯玉祥手下虎将之一，以治军严厉而闻名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为二十九军，张自忠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曾率军参加长城抗战，是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的总指挥。抗日战争开始后，先后任五十九军军长、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参加了不少有名的战役，以其战功卓著而闻名全国，令许多日本高级将领闻风丧胆。他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1936年6月，张自忠受宋哲元重托担任天津市长一职，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止，在位恰好一年时间，时间虽短，却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前任市长萧振瀛给张自忠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市财政亏欠50万元，市府官职员纪律涣散，市区治安也相当混乱。张自忠到任后，以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作风，进行了全面的治理整顿。

在吏治整顿上，张自忠带头勤政廉政。到任不久，即进入暑期。1936年7月13日，张自忠下

令变革作息时间，规定上午6时上班，11时下班，并强调按时作息，不得迟到早退。如查迟到一次者记过，二次者记大过，减薪10元，减薪后仍有违犯，即予停职。此令一出，成效斐然。实行一周后，经查无一人迟到早退，工作时间虽然缩短，行政效率却大为提高，官员面貌焕然一新。北平、上海、汉口等市闻讯，纷纷仿而效之。

张自忠刚任天津市长，一承包商转托张自忠的部将张宗衡出面，要求承包天津税务，表示愿出65万元，签订合同时，可写30万元或40万元。这样一来，张自忠个人至少可得回扣25万元。素来廉洁的张自忠不为金钱所动，他对张宗衡说：“西北军的干部失业很多，财政局长傅正舜办税务有办法，可以借此多安排一些失业人员，比包给人家有好处。”

1936年年关前夕，天津市政府给市府机关和三十八师官兵们发了一点过节钱。过惯了苦日子的三十八师官兵们得了钱，无不欢欣鼓舞，大家齐聚于市府大楼向张市长叩谢。张自忠正色而言：“这是国家和人民养了你们，我们必须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地办事才对。大家说是不是呢？”

张自忠历来严明执法，不徇私情，担任天津

市长后，对自己要求更严。上任之后，有不少亲友、故交前来求职，张自忠一律公事公办，量才录用，合乎标准则用，否则坚决不予照顾。张自忠对待贪官污吏更是恨之人骨，处理那些敢于以身试法者毫不留情。张自忠上任后，特派暗探查访各区，发现警察多有借“三节两寿”向商号、居民勒索馈赠之事。这些胆大之徒通常按商号大小和居民富裕程度，收取二三角至五六角不等，对方慑于警威，一般不敢悖违。为避免直接勒索而暴露目标，他们从不直接收受钱物，而是委托更夫代收转交，然后按官阶大小私下分肥。此风相沿日久，已成惯例。正在调查之际，张自忠突然接到商民举发控告，说公安局侦察队第二队队长李志民，到任仅两个多月，滥捕商民，擅自罚款后开释，共得脏款一万多元。张自忠闻讯震怒，当即命公安局：“把这个黑了心的家伙捕送到市府来！”岂料，此人居然耳目灵通，事先潜逃。张自忠岂肯善罢甘休，严令张网搜捕，终于8月27日在北平车站将李犯捕获。经审讯，发现李案与贩毒有关，张自忠遂命将李犯交禁毒审查处训办。最后判处李志民有期徒刑8年，由冀察绥靖公署批准后执行。这件事使张自忠倍感警风问题之严重，整顿警风之决心更加坚定。8月29日，张自忠在向公安局发布的训令中严肃指出：“查各分局巡警长官仍有借‘三节两寿’名义向居民商号勒索馈赠，不啻有玷警誉，真是目无警纪。此风不革，则一切政令等于赘文。现值中秋节将届，特再重申前令，仰该局长通飭所属，严切申儆，无论何人倘再违犯情事，一经举发，除将原索钱物退还外，定即依法从严惩办，决不稍事宽贷。”公安局长程希贤奉命后，即着手整顿警风，并进一步申明：“有故违者决予严惩，直接长官同时撤职。”

此后，对于以身试法者，张自忠均从严查处，毫不留情。1937年3月，市警察局（同年2月公安局改称警察局）第六分局局长韩青芳及该区第二分驻所冯某因渎职被人告发，经查属实，张自

忠即将二人撤职，由段长贵继任第六分局局长。在这同时，五河水上警察局第一分驻所第二号船一等警士张国卿、船长王趾亭、警长王义仁等，收受贿赂，张自忠下令将三人撤职，并押送市保安司令部依法惩处。

应该说，张自忠担任天津市长后，勤政廉政之举，对天津吏治管理，确有明显积极作用，尽管由于大环境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旧官府的弊端，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旧天津政府机构风气的好转，这在三十年代的旧中国，能做到这一步，已是难能可贵了。

在经济治理上，张自忠的功绩也是显而易见的。

天津当时虽然是中国北方工商业中心，却面临诸多难题，加上长期以来军阀混战以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的影响，天津经济发展很不景气，财政方面入不敷出的问题相当严重。作为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虽然此前一直过着戎马生涯，对经济管理工作相当陌生，但上任后，又不得不把经济工作当成重头戏，这是他担任天津市长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因此，在张自忠上任后的一年里，为天津经济投入相当大的精力，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天津前任市长给张自忠留下了一副相当棘手的烂摊子。天津经济萧条混乱的局面已持续了十年，这对于不谙经济的张自忠无疑是一个难题，为了治理天津经济，张自忠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善于有效使用专门人才。

天津商业委员会是代表天津全市商民利益的民间团体，同时也是官方协商管理商业的中介机构，具有亦官亦民的双重性质，在天津商民中颇具影响力。对工商业不内行的张自忠非常想借其一臂之力。但是，天津商业委员会内部一直矛盾重重，纷争不断，在张自忠上任前已陷于瘫痪局面。张自忠上任后，立即对其进行彻底整顿改

组,将奸商、无耻买办一律摒弃,从根本上解决了其内部矛盾,成为张自忠搞好天津经济的好帮手。

1936年下半年,天津市面出现铜元短缺,一批奸商乘机贩运囤积铜元,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张自忠令公安局制止铜元外运和囤积,严厉打击奸商,取缔操纵;同时责成市民银行迅速发行铜元票,暂补短板,后又经冀察政委会批准,将河北省铜元引入天津市场,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铜元紧缺问题,维护了广大市民利益和天津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货在华北地区大规模走私,对天津市及华北地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也是让张自忠颇为头疼的难题之一。

日货走私,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已波及华北地区。《塘沽协定》的签订,华北地区门户顿开,走私之风愈演愈烈,《何梅协定》的达成及冀东伪政权的出现,更为日货走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从此,大批日本商人在日本驻军的庇护下,以冀东为据点,进行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公开大规模走私。加上国民党政府缉私不力,华北地区日货以“若决江河”之势蔓延开来,“畅达地由天津而遍及全国”。仅从1935年初到1936年5月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日货走私额就达3亿元之多,仅此一项,华北地区一年即损失关税1亿多,占全国的1/3。由于天津地处华北走私的枢纽,日货走私对天津经济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是相当严重的。

为了剪除天津经济发展的毒瘤,保持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经济稳定,张自忠下决心加大缉私力度。当时天津的缉私工作,是由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天津海关和津浦铁路局承担。为了有效地配合缉私部门的工作,彻底截断日货的走私通道,张自忠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大力协助工作,同时利用他的三十八师师长之职,指示三十八师一部也加入缉私行列,在大沽成立军警缉查处,截

断不法日商由大沽南运私货的通道。在张自忠的支持下,天津缉私工作大有起色,一时间,天津“检获私货甚多”,“走私者几无立足之地”,“私货报税者激增”,有力地促进了天津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经过一年的努力,天津经济又一次出现繁荣景象。1936年7月至12月,全市新开商号1146家,1937年1月至7月,天津商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又新增商号464家。天津工商业经营形势看好,营业额与赢利额呈明显增长势头,这表明:天津经济已经结束长达10年的萧条局面,开始复苏。

天津经济好转还表现在,同一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发展形势非常喜人。据天津市商品检验局统计,1936年天津出口商品总值约计国币1.2亿元,比上年多出口3715万元,出口增加近31%。其中天津向美国出口商品总值8194万元(合2424万美元)。1936年天津进口额约为300万元,较上年减少298万元,减少额近50%。1937年,天津对外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仅天津对美国出口贸易,上半年即达到1821万美元,比1936年下半年增长40%以上。

当时的天津人无不为天津经济的可喜变化欢欣鼓舞,天津市1937年的元旦正是在这种众人欢乐的氛围中度过的。正如一位工商业评论家在谈及1936年天津商业状况的评述:“回顾去岁,颇有使人眷恋者,则为去年商业之繁荣气象,为近10年所罕见。”(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5日)

可以想象,若不是1937年7月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天津的经济肯定又会有相当的长进。张自忠上任短短的一年时间,天津经济能有如此的变化,毋庸置疑,他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 吴思)



# 斗士于右任



● 王新元

## 半哭半笑 忧国忧民

1879年3月20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不满两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又出外做事，成为孤儿的于右任只好由伯母房氏抚养。

房氏通情达理，视侄为子，为了把于右任培养成才，在于右任9岁那年，变卖家产，将其送到当时关中最有名的塾师毛班香门下。毛班香涉猎甚广，喜好诗文，性情诙谐，自称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毛先生时常勉励于右任将来要超过他们。于右任牢记在心，勤奋刻苦，学识一天天大增，随后，又求学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

书读得多了，阅历渐广了，道理也懂得多了。于右任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晚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只知道一味地割地赔款，搜刮民资，整个三秦大地民不聊生的现状，“满清不亡，是无天理”在于右任脑子里日益深化，要求革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思想逐渐增强。他开始写诗，抨击时政，言人之所不敢言，咏人之所不敢咏。

1900年，于右任在陕西中学堂求学，正值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奔，狼狈逃到西安。当时陕西巡抚岑春煊，要求学堂师生衣冠整齐地跪在道旁迎接“圣驾”。于右任愤恨至极，他准备上书岑春煊，要他趁此机会杀了西太后，但为同学所劝阻。此间，于右任写了许多忧国忧民，谴责清廷的诗篇，其中大多

都是锋芒毕露，指名道姓地讥骂，毫不隐讳，痛快淋漓。不久，他将这些诗汇集册取名《半哭半笑楼诗集》，在诗集的扉页上，印有于右任的照片，他披头散发，脱去上衣，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刀，作奋力拼杀之状，照片左右还有自题的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的激烈言行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忌恨与恐慌。清政府下令通缉，并附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的批示。当时于右任正好到开封参加会试，于的亲友探知消息，即遣人昼夜兼程，赶往开封。于右任得知情况后，急忙逃往上海，途径南京时，半夜入城遥拜明孝陵，一伸多年蕴积的民族悲愤。他百感交集，赋《孝陵》诗一首以表达自己反对满清暴政，光复中华的决心：虎口余生料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 为民办报 百折不挠

1906年8月，于右任从上海前往日本，在东京拜见了神交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十分赞赏于右任的才华与学识，委任他为长江大都督，要他负责中国中部的革命重任，在上海相机行事，以推动革命的成功。

1907年3月份，于右任回到上海。当时正好是《苏报》被封不久，清廷官吏与租界当局相互勾结，合力取缔革命书报，残酷迫害革命志士。于右任为了伸张正义，同时也为了打破上海舆论界长期沉寂的局面，遂创办了《神州日报》，以期再造

神州，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主笔者大都是当时上海一流的学者和社会进步人士。不出几日，《神州日报》便在知识界、文化界引起注意。清政府对此十分恐慌，派人焚烧了报社。

于右任并未因此而退缩，不久他又开办了《民呼报》，意为“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新办的《民呼报》无论是内容还是宗旨，都比《神州日报》更为激烈，连篇累牍地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扬民主革命。尤其是于右任的如椽大笔，更是桀骜不驯，天矫不群，不出三个月《民呼报》的销路已雄踞上海各报之首。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罗织罪名，于1909年8月2日拘捕了于右任，制造了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在狱中，于右任要求报社同志“宁死不能停报”。但《民呼报》的同仁知道，如果报社一天不关门，于右任就一天得不到释放。他们只好违背了于右任的意愿，发表了“辞世之言”宣布停刊，租界当局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纷纷指责与抗议下，于当日释放了于右任。

《民呼报》停刊还没有一个月，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报》，主要“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含有幽默的意味。”于右任认为“民不能言，则唯有吁耳”。就在这个时候，乌云笼罩着东亚上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更为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民吁报》除继续关注民生疾苦外，乃将其评论重点，逐步转移到国际问题上来，奋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对《民吁报》的宣传，大为愤慨，暗地待机谋害于右任。1909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了侵略头子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时，上海各大小报刊，都不敢发此消息。只有《民吁报》在头条刊发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并把伊藤博文称做“土匪流氓头子”、“大洋蛋”、“可怜儿”，认为他死有余辜。日本领事立即向租界当局提出严重抗议。租界当局以“有损中日邦交”为名，再次拘捕了于右任，并查封了《民吁报》。

第二次出狱的于右任，并没有被反动势力的淫威所吓倒，而是在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创办了第四张报纸《民立报》。《民立报》将革命与建设并举，一方面揭露清政府罪恶，唤起民众起来斗争，另一方面则积极研讨社会实际问题，提出许多可贵的建议，它是辛亥革命前，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革命喉舌和行动的组织者。于右

任在编辑《民立报》时，要求做到“大众化、革命化、时代化”。《民立报》除了为辛亥革命作思想准备外，还为革命政府储备了一批干部。后来南京临时政府的九个部中，就有四个部的次长来自《民立报》。此外，司法局长宋教仁，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也都是《民立报》成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11月6日，孙中山在海外为创立民国经历了十六年的艰苦斗争后回到了上海，首先到《民立报》社看望于右任，送其“旌义”两字，并以一枚炮弹壳赠之，勉励其象炮弹一样勇往直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于右任被孙中山亲任为交通部次长，按照“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于右任属于实权派。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于右任随即也卸去了交通次长之职，仍专心致志办《民立报》。

## 书生司令 出生入死

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竖起陕西靖国军大旗，反抗依附北洋军阀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同年8月，于右任应邀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并在三原誓师，讨伐陈树藩。但没过多久靖国军由于内部的分裂及敌人的诱降而宣告失败，但它给北洋军阀地方势力的打击是沉重的。

1925年10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二军在华北惨败。第一军虽退南口坚守察绥两省，但奉军大兵压境，冯玉祥只好宣布下野。不久，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寻求军事上的援助。但直奉军阀并没有因冯的下野而停止进攻，相反变本加厉，围攻西安，国外形势更加恶化。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特请于右任，专程前去苏联敦促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回国，重整旗鼓，收拾残局，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于右任当时因与国民军的关系而成为奉军重点通缉的对象。奉军进入北京后，他只好匿居在皇城根的一座小寺院内，深居简出。当接到李大钊的请求后，欣然答应。他与靖国军时的部下孙殿英（孙此时已投奉军）取得联系，化名原春

雨,秘密前往天津,后又到上海,从上海乘苏联轮船经日本赴海参崴。1926年6月中旬于右任到达苏联的海参崴。7月下旬,到达莫斯科见到冯玉祥,经过耐心的说服,冯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决定立即回国。1926年9月两人抵达内蒙古的五原镇。在五原誓师后,两人分别就任国民联军正、副总司令。10月中旬,于右任在乾州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孙良诚、吉鸿昌、邓宝珊等,会上对进攻西安的军事部署进行细密的调整。

乾州军事会议后,在于右任的亲自指挥下国民联军于5月28日解放了西安。西安被围八月,城内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大街成了一片瓦砾场,满目疮痍,白骨累累,生者嗷嗷待哺,死者暴尸待掩。一些反对分子煽风点火,蒙蔽市民,煽动群众闹事。于右任命令部队秋毫无犯,还组织人员发放救济物资,同时采取措施稳定市面,安定人心。

## 眷恋大陆 抱恨而终

日历翻到历史大决战的1948年。

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胜利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灭亡已成定局。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一片责怨声中,把一个烂摊子交给李宗仁,宣告下野。李宗仁深感目前的危局,认识到只有和谈才是唯一的出路,并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张治中则认为于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后的协定,于右任遂未北上。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当局强迫于右任去上海,他以身体不适为辞加以拒绝,但执行命令的军官不等他穿好衣服,就胁迫他上车驶往机场。到上海后,于右任本打算经广州去香港,然后待机奔赴北平,留在大陆,但未能如愿。1949年11月29日,71岁高龄的于右任,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开始了他孤苦伶仃的飘零生涯。

在台湾的日子里,于右任十分眷恋祖国大陆,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尤其是到了暮年,于右任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十分关心。1962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昨夜梦中中原路,马首祥

云照庶民”。老人多么希望能回到大陆,亲眼看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面貌。但一水相隔,千古遗憾!于右任也是多么希望破碎的山河早日重归统一,他曾作诗云:“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发表后盛传海内外。1961年,在他逝世前三年,他还书赠蒋经国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可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顽固反共政策,于右任直到辞世前,也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1964年11月10日,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斗士于右任先生在台湾带着无穷的遗恨与世长辞了,为了寻找他的遗嘱,人们在他的箱子里面发现了他临死前写的两张纸条,其中一张上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万分伤感的哀歌,表明于右任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责任编辑 吴思)

角 寒 青 莫  
刻 看 櫻 煙  
憑 盡 已 小 身 在 一 轉  
閣 裡 小 橋 西 花  
于右任  
于右任

# 顾准二三事

● 楼肇明

1971年初春至1972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大队人马是在河南明港的一座军营里度过的。现在回过头来揣摩那样做的目的，我想一则是为了统一办学习班，清查“五·一六”分子；二则也实在是为了便于管理。其时，我所在的文学所和经济所合在一个食堂吃饭，因为年轻力不薄，更因为在整人和被整的格斗场上都派不上用场，我就在炊事班充任了“火头军”。社会科学院，素称知识精英荟萃之地，用当时的话说，叫“藏龙卧虎，牛鬼蛇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经济所拥有全国经济学界的名流，更有从第一线撤下来的巨公闻人，我得以瞻仰他们的面影，也就是在我作为一名炊事员给他们打菜卖饭的窗口上。一日三餐照面三次，匆匆一瞥，一一将名字和面貌联系起来。但从道听途说的意义上熟悉他们，却得益于我在经济所的同乡，曾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于八、九十年代出任经济所副秘长的陈瑞铭先生。瑞铭乡兄是因为

“文革”前受到前经济所所长孙冶方的赏识，追随他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路线”，作为“黑苗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批斗过，可以说一脑门子的“反动思想”。陈兄为人豪爽，好酒善谈，人长得又黑又壮，骤然一见，决不会认为眼前的这条壮汉是位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他在文学所和经济所合在一起的食堂里充任采购员，供应近五百名学员以及管教他们的军人的蔬菜瓜果、鸡鸭鱼肉。其时，明港地区的甲鱼、黑鱼，十分地价廉物美，这位博士用他的经济学头脑，更借助他强健的四肢，每天用自行车驮，架子车拉，从十里地以外的明港镇上将它们弄到军营。在闲下来的间隙里，我与陈兄海阔天空地神聊，私下交流各自埋藏很深的“反动思想”，言语间自然也会涉及到各自所里那些名流闻人的趣闻轶事。在此之前，我常常见到一位先生（那时还不知道他是顾准），他的身材鹤立鸡群，长得像堂·吉诃德骑士一样伶仃瘦长，在大家唯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

破衣烂衫充作“运动服”为时尚保护色时，他却是身着我国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再加上那一副玳瑁眼镜，一副爱理不理人的神态，来窗口打饭，总是姗姗来迟，高视阔步，眉宇间显然有些威容，虽不是因戒备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仍给人以视对方为无物之感。在与瑞铭兄的闲聊中，我问他“此公乃何许人也？”从瑞铭兄给我绘声绘色的描绘叙说中，我得知顾准先生原来是位罕有其匹的才智之士，他通过刻苦自学，十九岁那年就出版过一本会计学方面的著作，二十多岁即身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管财务的官员。他的狂傲狷介，不完全是少年得志所致，而是素性如此。五十年代调京，他顶撞上司，不给面子，似是家常便饭，在其时颇为吃香的苏联专家面前，他决无低三下四之媚态。他那一次次的据理力争，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要挫一挫那些自以为是，指手划脚者的傲气，不如说，他生来就有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人生来平等的意志，和付诸实践的勇气和秉性。在当时，上级有过不无蛮横的谕示，“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和口角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中方无理要打一扁担，有理也要打一扁担”。顾准将这些谕示，充耳不闻，置之脑后，其结果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瑞铭兄告诉我，顾准虽不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但他却是摘帽之后，重新又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少数中的最少数。其强项，顽固坚持“右派立场”也就可见一斑了。

耳食之言不尽管可靠，面影终究无法深入命运。我和顾准先

生相识交往，却是从“干校”回京以后的1972年至1973年间的一年多时间。说是相识，也是十分惭愧，无非是在一起下下围棋，聊聊天，借借书而已。我根本说不上是他的忘年交，他留给我的印象，也仅仅是几幅并不令人愉快的面影的记忆。

我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大约是他原有的寓所被不相干的造反派之类的人们占据了。顾准先生从干校回京后的一段时间里，住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大院来了。他和同所同事李云先生和他的小女儿一屋而居。这间房子位于当时的七号楼拐角处，旁边就是一间公厕。他和李云父女共同拥有约25平方米的空间，书架权作隔栅，搬不开书架，都是一家人。我和他渐渐相熟起来，或者说我心里多少对他有些好感，也许是与对比自己更为弱小者的同情有关。这中间的媒介就是李云先生的小女儿平雅。

与许多传奇故事中的情形相似，老父孤女，平雅那会儿刚上小学，李老先生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顾、李是同龄人。不同的是，李云早年就去了延安，顾准则是上海的地下党。我在干校期间学会了挑选西瓜的绝招，“望、闻、问、切”，一挑一个准，我与平雅的友谊，连同与李云老先生的友谊，就是从我给平雅挑选西瓜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顾准不苟言笑，唯一的例外，就是经常与平雅开开玩笑（现在想来，这些玩笑其实包含着与磨难孤女的意志品格相关，理解人生存的艰难，应该从童年就开始）。可以这么说吧，顾准唯有与平雅面对时，他那平时紧

锁的眉头，才偶一舒展。

我去拜访李云，多半是下围棋。李云是位棋迷，棋艺不差，棋德也高，不论对方水平如何，来者不拒。与友人手谈，以遣永昼。顾准的棋艺就差得多了，他多半偶而为之。李云下他的棋，他埋头看书译书，我记得不错的话，他那时好像在翻译当时看起来并无希望出版的凯恩斯的著作。顾准也偶而与我对弈一二局，不过他的棋艺棋德，我实在不敢恭维。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海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在他凌厉的指斥声中，我不说什么，心里窝火，不久也就释然了。瑞铭兄曾告诉过我，他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斗争，监督劳动改造的那会儿，从来不买监管人员的账，任什么凶神恶煞般的监管人员，在他面前也只得退避三分，凶焰会有所收敛。因为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

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是先天的本性呢，还是后天的命运和遭遇使然？可以说这是顾准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也是性格和命运留给我的最大悬疑了。

与顾准对弈，他不是好的棋友。一般的交往中，顾准先生也与众不同。我跟他借过一回《圣经》，他答应只许借阅两个星期。应该说，圣经是世界上印量最大的书籍了，但当时的中国大陆却非常罕见，他宝贝自己的书也无可非议，结果还没有到应该归还的日期，他就一再催还，我一气之下，不到十天就完璧归赵了事。

较之下棋借书所引起的不愉快，乃至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向他请教某些疑难，就愉快得多，他堪称是一位和盘托出，决不藏着掖着的良师和诤友。现在我能够记得只有两条了，而且都是与一位与他一样同是“右”字号的著名人物的言论有关。（这另一位著名的右派人士，是知名度远远高于顾准的徐懋庸先生。徐先生过世比顾准略早，为了免去不必要的



顾准一家，摄于50年代

麻烦,我本来想隐去这位前辈,拟另作文以志纪念。在此文写作途中,我见到我的老上司,曾任文学所图书馆主任,徐老先生的夫人王韦女士,她说徐、顾生前就是知交,确切说该是患难兄弟吧,如此,我闪烁其辞就属多余。)徐、顾两人成名甚早,性格中狷介和狂傲,可谓旗鼓相当,在伯仲之间。也许正因为此,我用激将的办法替代向他讨教。我转述了徐氏在私下讲的一些言论,问顾准的看法。我说徐懋庸说,电影歌舞史诗《东方红》不像是歌舞片,用的是“人海战术”。谁知顾准眉开眼笑地表示赞同,这颇出我的意料。不过,他爱抬杠的脾气(也许不是),却在另一番言论中表现了出来。徐懋庸认为三国时期蜀汉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诸葛亮独力难支,手下匮乏得力干部,事必躬亲,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汉王国也就随着他死亡而溃灭了。我想徐氏的这个言论,虽非独创,但平允公正。谁知,顾准听了却不以为然,几乎是嗤之以鼻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人才,关键还在领导者是否是名伯乐。人才是从来都不会缺乏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一不高兴就将大臣们一个个地拉出去砍头,但人才并未给他杀光。哀叹没有人才的说法,任何时候都是不通之极。”无论从当时年轻的我,还是现在又多了一番阅历和史识的我,令我心折的并非是顾准如何主张,而是他的坦诚和对自己主张的执着。1995年,《顾准文集》面世,在知识界震动不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名之为“顾准的人格精神”,我想大约是指特立独行,不曲学阿世而说的罢。

读《顾准文集》,乃至稍后出

版的《顾准日记》,朋友间议论最多的是他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建立起制衡的机制,即他将美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引进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在我看来,这个大胆的设计,不免仍然会被人讥为唐·吉河德式的梦呓。但对顾准来说,他是认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虽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内涵,会有所不同,具体到某个人,对上面的四句话,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一部《顾准文集》,集中到一点,即在义无反顾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上。不论这位颇具经世之才的学者的设想是否能够行得通,但为中国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料,却是确切无疑的。在我看来,这还并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由《顾准文集》生发出来的“顾准精神”,其实是一个被中断和受损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复活,时代要求的“使命感”已融入了“天命感”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发“顾准精神”,我个人所看重的,正是这“使命”和“天命”的活生生的统一。没有人请顾准担当政治制度的设计师,不论本人处于何种处境,打入另册也罢,被群众专政投入牛棚也罢,他的那颗饱经忧患的心,是不能命令自己不作如是之想的。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是可为和不可为,均不在事前考虑之列,“我行我素”,“虽千万人,我往矣”。甚至著述是否在身后的岁月流逝中湮没,也不在思考之列。庄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其实,对命运的屈从和反抗是包括在命运二字之内的题中之义。

只是,成就一种性格,何况是

悲剧性格,代价不可谓不大,它以不同形式殃及亲人,几乎殆不可避免。顾准在临去世前,因打成右派而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子女回到了他的身边。据悉,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文革”期间双双在家中隔离审查,顾准将一个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的板缝塞了过去,他蛮以为以此能聊胜于无地给夫人一点安慰,以示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勇气。但谁知,在顾准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杀身亡了。还有,也是在社科院公厕相邻的那一间他与李云父女合住的房子里,他指着报纸上一则某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对我说,×××是我的亲戚。我问,你们没有联系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回复到不屑一顾的神态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便再问了,直到顾准去世——我当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才约略弄清,他的子女离他而去之后,一切都是这位姻亲关照呵护的。这特殊年代的非常态的戚谊,不可谓不深。但顾准傲骨如此,我又夫复何言。

我的这篇纪念文字,也属夫复何言之列。因为顾准的命运,最为确切无疑的,是他身前的屈辱和寂寞,他的遗著在身后给他带来自己也决计意想不到的声誉,终于将原本支离破碎的一生聚成了一个完整的结局。我寥寥几笔纵然能够勾勒出这位前辈若干不为世人知悉的面影,但充其量只是二三轶事趣闻而已,距离一本人生大书上的眉批和夹注尚远,更何况性格和命运内外的盲点和暗区在所多有,还是稍安毋躁为要。

(责任编辑 吴思)



# 谁向康生开第一“枪”的

● 林青山

二十多年前，把康生这位党内的大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震动全国的一大快事。

1977年春。康生和曹轶欧一手控制的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仍然寒凝大地。尽管康生在1975年冬死去，康办主任曹轶欧还活着。康生做的很多恶，她都有份。而且康生这块“金字”招牌并没倒。

1977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这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胡耀邦的老部下，在党校哲学教研室搞教学工作的李公天找到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后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道：“我想通过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的罪恶，给揭出来。你看怎样？”韩树英赞成，但又建议他找胡耀邦秘书梁金泉征求意见。

梁金泉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

随后，李公天又找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征求意见，冯文彬也让他们自己决定。此时，韩树英估计，不论是耀邦还是冯文彬，都被康生折磨得不轻。他们会支持的。这是他们想做而又不便于做的事！为了壮大声势，也为了更稳妥起见，韩树英把哲学教研室的吴秉元、卢俊

忠和毛维平等人也找来商量如何写小字报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开第一“枪”的小字报，用不着写更具体的内容，只是画龙点睛式的，点一下要害问题，起个抛砖引玉和打开缺口的作用。他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央党校的形势。康生和曹轶欧，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只要有人带头，捅这个马蜂窝，一些早已义愤填膺和憋足了劲的受害者，都会争先恐后的上阵的。

李公天和韩树英写了小字报，吴秉元自己也写了一篇。

1977年12月8日写完，第二天，即12月9日，在哲学教研室办公地点——16楼一层走廊，用细铁丝把小字报挂上了。小字报的落款是李公天和韩树英。

李公天和韩树英的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同林彪“四人帮”划在了一条线上。

看小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王福、李葆华和杨静仁等高级班学员，也都三三两两地来看小字报。有的白天没有时间，晚上打着手电看。全校的学工人员，几乎都来看小字报。有的还天天来看。渐渐发展到连外单位的人，也来看小字报了。用小字报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罪行的消息，不胫而走，已

经不限在京城，而且传到外省市了。

中央党校里的学、工人员看到李公天和韩树英放第一“枪”的小字报之后，不仅对看小字报有浓厚的兴趣，而且直接参战，争先恐后地写小字报，小字报多了，铺天盖地把五十多米长的走廊两侧通通挂满了，连上楼的楼梯两侧都挂满了。在三楼办公的文史教研室，在三楼开辟了另一“战场”，也贴出了大批小字报。京城很多机关里的干部，坐汽车的，骑自行车的，也都闻讯赶来看小字报。它已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

小字报不仅数量一天比一天地增多，而在内容上也越来越深入，很多鲜为人知的触目惊心的悲剧，也都曝光了。

不久，党校学员正式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一致强烈要求中央严厉地处理康生这个大奸的问题。

1979年初，升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文彬，在总结中央党校1978年工作时说：在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件大事，就是揭发了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责任编辑 吴思）

# 冯玉祥的五个遗嘱

● 郑永彪

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可说是脍炙人口。然而，说起他五写遗嘱的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会多了。

冯玉祥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写过遗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

要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

“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子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



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了以坚决主张抗日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为主要内容的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祥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

“（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冯、蒋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被迫于1946年9月出使美国。不久，内战爆发，冯在美国发表演讲，揭露痛斥美蒋互相勾结杀害中国人的反动罪行。1948年初，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断绝了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

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以上这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海外，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作什么官打独裁的。”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协助下，冯玉祥离美回国。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难。

（责任编辑 吴思）



冯玉祥与夫人李德全

# 章太炎『七被追捕』考略

● 杨法宝

章太炎在1906年7月说过：“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究竟哪七次追捕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翻阅史籍，寻根溯源，梳理出章太炎先后七次被清廷追杀那惊心动魄的史实。

**一捕章太炎** 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春章太炎因十分钦佩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疾呼变法维新，故而赠币16元报名加入强学会。1897年1月，又应梁启超、汪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腐败内政和卖国外交。

同年8月，章太炎回到浙江，与宋恕、陈虬等人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又创刊《经世报》，发表了《变法箴言》、《平等论》等文，表露了他企图组织政党和以武力反清的革命思想，如他在《变法箴言》一文中大声疾呼：“变法者，吾党之责也。”“变法者，非口说也，必躬自行之，躬自行之而不可济，必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积极活跃于维新变法的前台。”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清皇朝下“钩党令”。章太炎因参加强学会和办报极力倡言变法而首次遭到清廷追捕，他

被迫于12月4日携家南渡，避居台湾，后任《台湾日日新报》编辑。期间，章太炎撰写《祭维新六贤文》“维我六贤，直言以抵。宁不惧唾？固忘生死！……孰有不死？天柱峨峨”。热情讴歌了维新志士的斗争精神，表达了自己对六君子的无限敬仰。

**二捕章太炎** 1900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阴谋废黜光绪皇帝。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寓沪绅商及知名人士共1231人急电清廷，表示坚决反对立溥俊为“大阿哥”。慈禧闻讯恼怒万分，下令缉捕经元善、章太炎等“急电”列名者。

**三捕章太炎**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自立会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不成事之理”等观点。

8月3日，章太炎剪去了作为对清皇朝忠顺标记的长辫，还穿上西服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并作《解辫发说》。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见到太炎如此“放恣”，便骂他这个“不争气”的学生“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不忠不孝”的罪名并没有把章太炎吓倒，师生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不久章太炎便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一文，表示坚决走民主革命



的道路。章太炎这一系列的反清行动，得到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全力支持和热烈欢迎。当时的《中国旬报》也发表评论赞颂道：“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这不仅是对清皇朝的示威，也是对唐才常等保皇主义者的挑战。不久，自立会“勤王”失败，唐才常等20多人慷慨就义，章太炎因参加“中国议会”和“割辫易服”，反抗朝廷，成为清廷指名追杀的要犯。

**四捕章太炎** 1901年6月，章太炎在日本的《国民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正仇满论》，文曰：“清朝专制统治已经腐朽，革命之势不得不行……”该文是近代中国批判改良主义的最早的战斗檄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接着又刊刻章太炎的代表作《旭书》，这是一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综合阐明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的专门著作。它凝练精审，条理缜密，文辞渊古，篇幅虽不算很大，容量却异乎寻常；同时也系统地阐明了章太炎的宇宙观、社会观、哲学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点。章太炎言行“狂妄”，清廷恨之入骨，故章太炎再遭缉捕。

**五捕章太炎** 1901年8月，章太炎经吴君遂介绍，任教

于苏州东吴大学。但他继续“言论恣肆”，公开抨击满清统治，倡言革命，号召民众推翻清皇朝。1902年1月，他又发表《李自成胡林翼论》等入木三分的反清文章，惊动了张之洞、刘坤一、恩寿共两名总督、三名巡抚、两名道台等十余位清朝封疆大臣。他们认为，章太炎“屡教不改，应数罪并罚之”，故数位封疆大臣联手追杀章太炎。章太炎在同仁、亲友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下，终于逃脱“清廷魔网”，于1902年2月22日“附日本舟东渡”避难。在日期间，章太炎战斗不息，与秦力山等革命志士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日”，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六捕章太炎** 1902年7月，章太炎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除夕那天回到老家——余杭县仓前镇。清廷鹰犬闻讯追捕至仓前。正当章太炎和妾王氏及两个女儿团聚会餐时，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人来，操一口余姚乡音，慌慌张张地说：“章先生，衙役来抓你了，你得赶快走！”章太炎出逃后躲避在仓前镇镇西龙泉寺，在寺内方丈的帮助下，得以安全脱险。

且说那位余姚人竟被清廷衙役误认为是章太炎，而被捉拿归案，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闹出了捉拿了假章太炎的笑话。后来，章太炎为了怀念有救命之恩的“余姚人”，而一度自

谓“余姚人”。

**七捕章太炎** 1903年6月中旬，章太炎的“忘年交”、自称反清“马前卒”的邹容在上海大街上独自游行高呼反清革命口号，并撰写了《革命军》一书，章为其作序；与此同时，章太炎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恬小丑”，他号召民众革命，并精神百倍地宣告：“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天雄，唐方镇名；大黄，药名。笔者注）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士钊（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主编的上海《苏报》先后摘要刊载邹、章两文，这两篇文章犹如“震以雷霆之声”，对清皇朝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清廷认为，在苏报馆中“以章为最要，邹容最为凶险”。由此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6月30日上午，工部局巡捕到“爱国学社”搜查，章面对危险毫无惧色，挺身而出，神情激昂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表现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章太炎、邹容被捕后，分别被监禁（上海西牢）3年、2年。在监禁中，他俩以诗相勉，筹划组建光复会。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邹容死于牢中），被孙中山、蔡元培派使迎往日本，奔向新的革命征途。

（责任编辑 吴思）

# “弓藏狗烹”探源

● 官伟勋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衍尤”。

“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

这些话在我国民间流传之广，可以说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实际上，从秦汉到明清，天下一统之后，功臣遭忌的现象代代有，大杀功臣的王朝并不多。而杀得最凶的，恰恰是两个来自农村经过农民起义当上皇帝的人。

功臣被杀被迫害是功臣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封建专制时代，是一个不能不产生这种悲剧的时代。

## 杀戮功臣并非封建王朝的普遍现象

秦始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暴君。汉高祖刘邦则一向是许多人心目中“豁达大度”、“从善如流”的明君。然而遗憾的是，在他们当政时期，大杀功臣的恰恰是被农民老爹骂为“无赖，不能治产业”、农村小亭

长出身的刘邦，而不是来自王公贵族的秦始皇。

承认这一点，对于习惯于用所谓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的我们来说，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说实在的，秦始皇不但没有大肆屠杀功臣，相反，他在如何对待和使用功臣名将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王翦是秦国完成统一大业战功卓著的名将。司马迁在《史记》王翦传里开头就说：“王翦者，频阳（今富平东北一带）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统帅军队攻打赵国阨与，拔九城。十八年，统帅军队攻赵，只用一年多就灭了赵国，赵王投降，把赵编为秦国的一个郡。第二年，燕国派荆轲刺秦王，秦王使王翦伐燕，燕王逃往辽东，王翦平定燕蓟。秦王又派王翦的儿子王贲攻楚，打败楚军之后，回过头来又攻打魏国，魏王投降，灭魏。王氏父子都是手握重兵屡立大功的人。

秦灭赵、燕、魏三国（今整个华北地区），数败楚军，又派

李信带几千兵追击燕太子丹，一直追到衍水中，击败残余燕军，活捉燕太子丹。秦始皇认为李信英勇有才，问李信：“我想攻灭楚国，如由将军去完成这一任务，需用多少兵？”楚国是当时最后一个没有遭到沉重打击的国家，也是当时六国中地盘最大人口最多兵力最强大的一个。李信回答说：“不过二十万就够了。”秦始皇回过头来又问王翦需多少兵？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说：“将军老了，为什么这么胆怯呢？李将军果然壮勇，他的意见对！”

秦始皇于是下令由李信和蒙恬带二十万人灭楚。王翦因秦王没采纳他的意见，就请了病假，回频阳养老去了。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楚军。李信又攻鄢郢，攻破之后，引兵往西，准备与蒙恬在城父会师，集中兵力灭楚。没想到，楚军在李信后面悄悄跟进，连续三天三夜不停顿，突然对李信发起攻击，攻入李信蒙恬两军的壁垒，杀了秦军的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去。

秦始皇听到这个消息大



怒，赶紧亲自乘快车驰往频阳去见王翦，向王翦道歉说：“寡人由于不听将军的计策，李信果然让秦军受辱。最新消息说，楚军正天天向西挺进，将军虽病，你能丢着寡人不管吗？”王翦说：“老臣体弱多病，且昏聩无能，请大王还是另择贤将吧！”秦始皇说：“行啦，将军不要再说了！”王翦说：“大王如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说：“我就是为了采纳将军之计才来的嘛！”

于是，王翦统帅六十万大军出发，秦始皇亲自送行送到灞上。王翦在告别时，向秦始皇请求赐予“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说：“将军行啦，你还怕受穷吗？”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再有功也不能封侯，所以趁大王看重我的时候，臣及时为子孙请求些园池。”秦始皇大笑。实际上，老王翦是怕秦始皇把全国的精锐部队全交给他不放心，故意多要好地好房子好园林，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只顾为自己养老和孩子打算。秦始皇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也只有笑而答之而已。

王翦带兵伐楚的消息传到楚国，楚国把全国的兵力动员起来迎战秦军。王翦大军到了战场，却不进攻，反而深沟高垒以坚守。楚军屡屡挑战，秦军硬是不出来应战。王翦让士兵天天洗头洗脚，改善伙食，开展文体活动，还与士兵一起吃饭，密切官兵关系。过了许多天之后，王翦问：“士兵们玩得还好吗？”回

答说：“都在比赛跳远、扔石头。”王翦说：“士兵可用了。”楚军不断挑战，见秦军老不应战，日久天长松懈了，而且长期集中全国兵力于边境，后勤供应也是问题，便决定撤军，当楚军正在陆续东撤之时。王翦突然下令出击，挑选最精壮的士兵打先锋，一鼓作气大破楚军。打到蕲南那个地方，杀了楚军将领项燕。楚军崩溃。秦军乘胜平定整个楚国所有城邑。只用一年多的时间，俘虏楚王负刍，将楚地改成郡县。后，王翦又挥师南下，征服百越。王翦是从东北的燕蓟一直打到如今越南一带的大功臣，而王翦的儿子王贲与李信则率军最后扫荡平定了燕、齐两地的残敌。

秦始皇对老将，有不同意见就当面说。自己错了，就当面做自我批评。对年轻将领也不苛求。李信说了大话，秦始皇能给他改正错误、积累经验的机会，照旧给予信任重用，李信也不负重望，再立新功。秦始皇真正作到了用人不疑，选定了你，就放手让你去干。王翦带去六十万人，到了战场按兵不动，他不催。王翦在攻打赵国时，自行决定“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大规模整编军队，秦始皇也不干预过问。王翦父子都手掌重兵，而且都一再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蒙恬、蒙恬父蒙武、祖父蒙敖，均为名将，皆得信任重用，从没疑忌过谁、整过谁，这是很不容易的。

相比之下，刘邦就大不同



秦始皇像

了。刘邦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诈。韩信一下子打下齐国七十多个城邑，派人来报告说，齐地老百姓诡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又靠着楚国，职位低了镇不住，要求刘邦封他假（代理）齐王。刘邦一听就火了，这不是想反吗！我在这里打了败仗，被项羽包围，盼他来救，他不但不赶快出兵为我解围，反倒想在齐称王！刚要发作，张良、陈平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下，他立即意识到，跟手握百万大军的韩信闹翻的严重后果。立即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要当就当真王，为什么要当假王！”稳住了韩信之后，他赶到韩信的驻地，趁韩信还没起床，一下子把韩信的兵权全夺了过来。刘邦是一个好耍权术的人。

后汉的开国皇帝、皇族出身当过大粮商的刘秀，就没大杀功臣，他采取的是让功臣一律“下岗”，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尽情享受物质文化生活的办法。所以唐明皇李隆基有句名言叫做：“西汉故人，以权贵不

全；东汉故人，以悠闲自保”。

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大杀功臣的记录。史称大唐开国元勋的徐茂公、李靖、秦琼、程咬金、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马周、李孝恭、李道宗等，都得善终。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更为人所称道了。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的第二年，即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匡胤在便殿设宴，请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张彦徽等人与宴。大家都是结义弟兄，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酒兴正浓时，赵匡胤屏退左右，对石守信们说：“我如果没有你们哪能有今天！不过，做皇帝也太难了，远不如当年当节度使时逍遥自在。我自从受禅以来，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石守信等问他还有什么事，那么忧虑？赵匡胤微笑着继续说：“诸位都是故交，不妨直说，这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大伙吓了一跳，赶紧说，天下已定，谁还敢有这样的野心。赵匡胤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有异心，可难保你们手下没有贪图富贵的人，一旦他们像当年你们对我一样，把黄袍加到你们身上，“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们吓坏了，一边哭，一边跪下请求给指条生路。赵匡胤便说：“人生像白驹过隙一样，是非常短促的。什么叫富贵？不就是多积钱财，尽情享受，让子孙不受穷吗？你们为什么不辞去兵权，到外地当个地方大员，多买好房子好地，多

弄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呢？咱们还可以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相猜，上下相安，那有多好。”这确是一条既能解决问题又不伤感情，比“软着陆”还要舒服的路子。众老将自然赶快交出兵权打点上路了。

## “始与俱”与“始与属”大不同

是不是农民起义领袖就天生疑心太重嗜杀成性，贵族公子就天生仁爱大度呢？那倒不是。这是由客观背景而不是由血统决定的。所谓客观背景就是“始与俱”还是“始与属”的问题。

所谓“始与俱”，就是在起兵打天下之初，大家都一样，都是一个锅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一条河里洗澡，平起平坐的哥们儿。所谓“始与属”，即在举兵问鼎之初，彼此已经具有上下尊卑之分的从属关系。这两种由当时现实形成的人际关系，其后的发展与结局是大有区别的。

刘邦手下的功臣，基本上都是“始与俱”的人物。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他的大小同乡，像萧何、曹参、陈平。刘邦与这些人从年轻时，就是在一起称兄道弟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另一类就是彭越、黥布他们，差不多与刘邦同时揭竿而起，靠自己浴血奋战当上王的。还有一个与此相近的，就是

原在项羽手下，嫌不受重用，跳槽投奔刘邦，刘邦根据萧何的建议，设坛拜将，后来当上假齐王的韩信。后面这三位都被刘邦杀了。前面几位，虽未被杀，但也很危险。萧何几次被疑忌，全靠他及时听取门客的主意，“悉以家私财佐军”、“贱贯贷以自污”，故意干了些在老百姓中自毁名声的事，“上乃悦”——才使得刘邦感到高兴，不再担心萧何“收买民心”有野心，才消除了杀萧之意。《伊丽莎白》中有句话：“在他们统治下，盛大的名声比声名狼藉更危险！”封建时代的中外一个样。

刘邦杀了韩信和彭越后，黥布认为轮到自己了，便起兵造反，与刘邦在阵前上遥遥相对时，刘邦问他为什么反？黥布说：“欲为帝耳！”黥布与彭越在反秦战争中，都是有赫赫战功的人。司马迁称：“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黥布“功冠诸侯，用此得王”，都是十分了得的人物。刘邦在彭城打了败仗，是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指项羽）后粮与梁地。”汉五年秋，“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这些人都是在浴血奋战的年代，胜负未见分晓之时，打过大胜仗，为刘邦解过围，救过刘邦命的人，他们怎么能甘心情愿给刘邦下跪喊万岁，自己不想当皇帝呢？

其实，刘邦心中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从吕后的两段

话里可以看出。

汉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刘邦死，过了四天还不发表，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与帝当年都是编户民（登记在册的平头百姓），现北面称臣，心里一直不痛快。今后要让他们侍奉少年皇帝，靠不住，非把他们全部杀光，天下不安！”这是一例。

还有一例：刘邦说彭越要反，逮捕之后，废为庶人，要把彭越从洛阳发配到四川青衣。在发配的路上，恰好遇见从长安回洛阳的吕后，彭越哭着向吕后求情，说自己并未造反，请求不把他发配蜀地青衣，而让他回老家昌邑定居。吕后和颜悦色地答应了他，把他又带回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王是个壮士，把他放到蜀地，是自留后患，不如杀了他。我已经把他带回来了。”刘邦非常赞赏吕后的主意，立即下令将彭越与其整个宗族全部杀光。吕后的思想就是刘邦的思想。

## “同为编户民”——一个难以排解的可怕梦魇

对于刘邦来说，曾经身为“编户民”这一事实，始终是他的一个可怕梦魇。朱元璋出身贫农，当过小行童、小和尚，化过缘，讨过饭，参加红军后，当过郭子兴的九夫长，只相当如今的一个班长。他的社会地位比刘邦还要低。因此，当上皇帝后，怕别人不服，怕被夺权，就像一条毒蛇一样，老在心头蠕

动。而且，权力越大，年事越高，这条蛇就蠕动得越厉害。

为了提高和巩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权威，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凝聚力，他们力争在战略战役治军安民等各方面，作出高人一头的表现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采取种种非常手段，在群众中强化对他们的迷信与崇拜，极力消除人们的不服心态。

捏造和散布怪诞的神话，说他们天生就有帝王之命，是这类领袖人物最常用的一招。

刘邦的传记里说，刘邦的母亲刘媪，在大泽水边睡着了，做了个梦，跟一个神仙好上了。这时，闪电交加风雨大作，刘邦的父亲来找刘媪，见一条蛟龙趴在刘媪身上。过了些日子，刘媪发现怀孕了，后来就生了刘邦。这还不是“真龙天子”吗？还有：刘邦带几个人逃亡时，走在前头的人回来说，回去吧，前边路上有大蛇挡路。刘邦说：“壮士走路，怕什么！”走上前，拔剑将蛇斩成两段。走了几里，刘邦因酒醉睡在路上。后来的人，见斩蛇的地方有个老太婆坐着哭。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有人把她儿子杀了！问为什么被杀？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化为蛇，挡道，今天被赤帝子杀了！”人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刘邦，刘邦暗暗高兴，从此更加自负起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

这些离奇的传说是怎么来的？有的是刘邦的亲信编造的，有些就是刘邦、吕后自己吹

的。传记里说，刘邦为了躲避秦始皇的追捕，藏在大山里，吕后去找他，一找就能找到。刘邦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吕后说：刘邦所呆的地方，上头常有云气，所以一找就能找到。很明显是在为自己的老公造舆论。

朱元璋自然也大有来历了。据《明史·本纪》讲，朱元璋的母亲刚一怀孕，就做梦有个神仙给她一丸药，“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到生产



朱元璋像

的时候，“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赶快去救，到了跟前，又没了。等朱元璋长大了，到皇觉寺当了和尚，去合肥化缘，病倒在路上，忽然出现两个穿紫衣的人来陪伴他，伺候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等他病好了，两个紫衣人忽然不见了。

这个故事模仿刘邦故事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只不过经过宋朝理学的熏陶，已不再愿意说自己的亲娘被蛟龙如何如何了。

为了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诱使人们迷信崇拜自己，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搞过这类名堂。陈胜起义时，用朱砂笔在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装在鱼肚子里，让小卒子买鱼做鱼时无意中发现；又叫吴广到驻地旁的一座破庙里，点上篝火，学着狐狸的声音叫道：“大楚兴，陈胜王！”深更半夜，士兵一片惊慌。第二天，士兵们瞅着陈胜窃窃私语，陈胜的领袖地位，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黄巾起义时不也极力散布“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民谣，以说明张角等的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吗？

在中国，统治阶级的统治人物搞这一套由来久矣！而且是有理论有根据的。《易》里就说过：“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祭义》也讲：“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就是君主，黔首就是老百姓，搞天命搞神意搞

迷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畏服他，拥护他。

但总有人是不相信这一套的，尤其是那些跟刘邦、朱元璋同时起事的被称为开国元勋的人物。他们之间，互相太了解了。要让他们相信一块干了那么多年、什么洋相都出过的、当年的“二流子”、“小和尚”，是什么神生龙种，是不可能的。对这样的人，刘邦、朱元璋们就只好来一个“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

朱元璋刚刚完成统一大业，就向功臣开刀了。先是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即发御林军掩捕，拷掠具状，磔于市，并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皆伏诛，僚属党与凡万五千人，株连甚众。”不久又发生大将凉国公蓝玉“谋不轨”案，“磔于市，夷三族”，“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蔓延过于胡惟庸。”两案共杀四万多人，洪武三年加封的侯爵二十八人，“失侯者二十”，史称“胡蓝之狱”。一个案子就成万成万地杀人，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刘邦、朱元璋们的个人品质。

## 马基雅维里说：“为君者遇功臣必寡恩”

中国封建时代有“狡兔死，走狗烹”、“负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几？”（《通

鉴记事本末·南郡王之叛》）之说。西方古代也有类似的谚语。据《管锥编》记载，古罗马史家在谈到暴君诛杀大将时就说：“臣之功可酬者，则君喜之；苟臣功之大，远非君所能酬，则不喜而反恨矣。”马基雅维里也说：“苟为权首，必受其咎，此理颠扑不破。”又说，为君者遇功臣必寡恩，盖出于疑猜云。

然而，《隋书·梁士彦等传·论》则认为功臣蒙难是因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报者倦矣，施者未厌”，有功者的要求没完没了；而作君主的却早已对功臣的要求感到厌烦了。钱钟书先生认为这一说法比前面的说法“似更鞭辟入里”。

若说被杀的功臣大都有自己方面的原因，这既不是对功臣的苛求，也不是为刘邦朱元璋们的开脱。

有些功臣确实有自己也想弄个皇帝当当的“野心”，彭越、黥布、胡惟庸、蓝玉都难辞其“咎”。

有些功臣原来没有造反之意，但在看到其他功臣陆续被杀之后，也极易产生兔死狐悲的不安之心，从而由不安而萌生反意；有的虽然本无反意，但架不住手下亲信“有欲富贵者”反复挑动，像韩信的部下蒯通、张敖之相贯高那样。而一些大人物的身旁，又总难免有那么一些渴望自己的主子飞龙上天以便跟着飞黄腾达的人物。

有些皇帝本来就对某些功臣，尤其对那些有所谓“不酬之功”的功臣，心怀疑忌，担心他

们不服。而这类功臣又往往长于战术短于权术，城府不深。就像韩信似的，明明知道刘邦嫉妒他的军事才能，却依然锋芒毕露，不知韬晦。当刘邦与他议论诸将带兵打仗的能力时，韩信一一评论后，刘邦问他：“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人。”刘邦又问：“你能带多少？”韩信竟不客气地说：“臣多多益善。”这岂不等于说，刘邦在他这个大元帅手下，只能充当个兵团司令一级的角色。刘皇帝怎么能让这么一个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臣子在身边呢？

而且韩信自从刘邦撤掉他的楚王，把他弄到首都当个无职无权淮阴侯后就“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他曾去看过樊哙将军，樊哙跪着迎送他，韩信却说：“没想到活着竟跟这样的人为伍！”樊哙是何许人？樊哙是在鸿门宴上救过刘邦，屡立大功，娶刘邦的小姨子、吕后之妹为妻，跟刘皇帝是连襟，最受刘邦信任的人，跪着迎送韩信，韩信还不高兴并说这样的话，其不满的程度已经很一般了。刘邦哪能不知道呢？

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功高但不震主，能得善终的大功臣。这大都是那些没有所谓“野心”，而且阅历丰富城府很深的人，唐朝的郭子仪就是典型的一位。

郭子仪是安史之乱时，在河北击败史思明，后又配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几乎可以

说是再造大唐的人物。他的职务是“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他的儿子郭暖娶升平公主为妻，小两口吵架，郭暖说：“你不就是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想当那个天子呢！”公主哭着找唐代宗告状去了。代宗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他说的对，如果他爹要当天子，这天下哪里还是你家的呢？”把女儿劝慰一番，让她回去了。郭子仪知道后，把儿子捆起来送进宫，并请求处分。代宗说：“鄙谚说的是，‘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足听也！”

代宗连这样的“大逆不道”之言都不计较，与郭子仪一向谨慎小心有关。当郭子仪发现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妒忌他，说他坏话时，曾多次主动提出减免自己的职务与待遇。有一次，他在汾阳，奏请任命一个县官，朝廷不批，手下人说：“以公之勋德，报个县官都不批，朝廷对您也太不尊重了！”郭子仪却说：“自从兴兵以来，方镇武臣大都很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屈从之，这不说明别的，正说明对他们有怀疑。今天我奏事，皇上以为不可而不批，正说明皇上不把我当武臣看待，是对我亲厚的表现，诸位应该祝贺才是，为什么反而见怪呢？”

又一件表现在京畿观察使卢杞来“问疾”这件事上。郭子

仪每次会见宾客，都有很多漂亮的侍女在旁，惟独卢杞来时，郭把侍女都打发掉，独自一个人凭几而坐。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卢杞这人，貌陋（卢蓝脸，很丑，但很有口才，受皇帝赏识）而心险，女人见了他必然要笑，卢杞必然怀恨在心，他日得志，我家的人都就活不成了！”郭子仪用心之细可见一般。

史书称赞郭子仪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一而终。”并不是过誉之言。

郭子仪是否就没遭过皇帝的猜忌呢？当然不是。《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就记载说：郭子仪“权任既重，功名复大”、“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可见，当皇帝的，对功劳大而又确实能干的人，总是疑神疑鬼想暗算的。只不过因为当时内忧外患深重，还要用他，所以没有动他。待局势稍一安定，代宗立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明升暗降，把实权全剥夺了。郭子仪是全靠他的谄熟帝王心理而得以终其天年的。

相比之下，汉朝的周亚夫就不同了。

周亚夫是名将周勃的儿子，七国叛乱时，“上乃拜周亚夫为太尉”，平定了七国之乱。周亚夫是安定刘汉天下的大功臣，也是抵御匈奴的名将。他在细柳驻军时，还留下一段千古

佳话。

汉文帝带大臣到细柳劳军。侍从先去通报说皇帝来了，快开营门接驾。军门都尉说：“将军有令，在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知道有什么天子诏。”不开门。文帝到了，派使持节再次通报皇帝的说话说：“要进营劳军。”周亚夫才下令开门。值班官又告诉文帝，将军有令，营内不准驰马。皇帝只好按辔缓缓而行。周亚夫见皇帝时，手执兵器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周亚夫的手下也一个个手执刀枪，箭上弦，全副武装。汉文帝进了这样的军营能不胆战心惊吗？他当时虽然称赞了一句：“嗟乎，此真将军矣！”其实，他心里却记了周亚夫一笔帐。

汉景帝即位，在宫中设宴招待周亚夫，故意给周上了一块大肉，但又不给他刀子筷子。周亚夫很不高兴，向侍宴的官员要筷子。退席时，迈着快步走了。汉景帝瞅着迅速走过的周亚夫说：“这样不满，不是可以侍奉少主之臣。”没几天，便找了个理由，把周亚夫抓进监狱，严刑拷打搜集罪名。鲁迅先生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三闲集》）结果，在内战外战中均有大功当过太尉（即今之国防部长）的周亚夫，不愿忍受没完没了的残酷折磨，自杀而死。

岳飞之死显然也跟他有“不酬之功”有关。赵宋皇帝把长江以北大半个中国都丢了，

岳飞屡败强寇，挥师北进。敌人一再声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还一再表示要把被俘的宋钦宗宋徽宗救回来。国内已经有个皇帝宋高宗了，你再弄回两个皇帝来，这对宋高宗意味着什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赵家把天下丢了，岳飞给恢复了，这天下还能姓赵吗？所以，即使没有秦桧，宋高宗也不会放过岳飞的。这不是为秦桧开脱，秦桧有秦桧的责任，但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应是宋高宗。

## 谁之过？

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我们的当权者不喜欢你呢？”答曰：“因为掌权者从来不喜欢那些比他们聪明的人——这是所有统治者的性格特征。”英国的诺斯古德·帕金森在他所著的《官场病》里也说过：“当官的人需要补充的是下属而不是对手。”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有句更深刻的警句，叫做：“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枕席的”。

后人往往“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为韩信们鸣不平。其实大可不必。一是这些人确有谋反之意。如果为争帝位再打起来，又是一场残酷的冻炭生灵的“楚汉”战争，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二是这些人假若造反成功当了皇帝，会不会对功臣也来个大开杀戒，是很难说的。

实际上，也不能说刘邦、朱元璋们就天生的刻薄寡恩嗜杀成性。客观地讲，他们的性格特征乃是当时的制度造成的。只要帝王享有无限特权，他们就总难免猜测这个要“弑君”，怀疑那个要“夺权”。

《风流女皇》中有句话讲得很透彻：“在政治事务上，或是遵循人类共同的准则，或是根据利害关系行事”，他们的原则是：“宁要一个不道德的成功，也不要一个无用的问心无愧！”中外比较强悍的君主，大都是这么干的。

是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呢？倒也不能这么说。一般说来，在考虑利害关系时，能把人民或国家利益作为主要成分、或成分之一的，应算是比较好的；若只考虑对个人绝对权威的影响，就是比较差的。后人对杀过功臣的君主，有的能予以谅解，有的难以谅解，原因在此。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了，但它的思想影响还会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已被刹车的历史车轮，受惯性的驱动，还会继续向前冲一阵子。在“惯性”的作用下，有大功于国于民的人，仍有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因为它已不是发生在悲剧时代，而是发生在本来可以避免发生这种悲剧的时代。

（责任编辑 致中）



# 炎黄春秋

台湾国语运动发起人范寿康 ■

谁向康生开第一「枪」的 ■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的前前后后 ■

章太炎七被迫捕考略 ■

冯玉祥的五个遗嘱 ■



章太炎



右起：费孝通、谈家桢、叶笃义、刘延东、冯之俊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4 >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